健康常樂

熊宗仁◎著

何应钦的晚年岁月

他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望尘莫及的

HEYINGQIN DE WANNIAN SUIYUE

团结出版社

何应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首脑。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他因追随蒋介石反共而飞黄腾达，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过程中，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内战及蒋介石中央系兼并异己的混战中，他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望尘莫及的。



何应钦的晚年岁月

熊宗仁◎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何应钦的晚年岁月 / 熊宗仁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26-0902-0

Ⅰ. ①何… Ⅱ. ①熊… Ⅲ. ①何应钦（1890～1987）—评传 Ⅳ.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213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31 千字
印　数：6000
版　次：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0902-0/K・749
定　价：28.00 元

导　言

何应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首脑。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他因追随蒋介石反共而飞黄腾达，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过程中，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内战及蒋介石中央系兼并异己的混战中，他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望尘莫及的。何应钦从夜郎故地的深山中脱颖而出；在民国初年南北军阀割据混战的夹缝中平步青云；在派系林立、矛盾倾轧几无宁日的国民党官场中，能游离于旋涡之外，或虽偶有卷入却能化险为夷；他辅佐心性专断、急躁、多疑的蒋介石，虽曾抗争也备受猜忌、冷落，但终能荣损与共；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恐日、妥协、谋和与抗日的矛盾困惑中挣扎转换；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幻想挽狂澜于既倒，替蒋介石组阁，负隅顽抗；去台湾以后，虽然失势但却未失宠，连续在蒋介石、蒋经国两个时代享誉不绝且有所作为；他在军事上的“才干”、官场中的“武甘草”功能、“何婆婆”性格以及生活中的清心寡欲、人格魅力、长寿秘诀……其间的因果是非，不唯研究者关注，一般人也津津乐道。

去台湾以后，他是台日条约的重要牵线人。他曾积极拼凑“东北亚反共联盟”，妄图依靠日本右翼势力，实现“反共抗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他却又对日本朝野有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一切努力，对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大肆抨击，俨然又成了台湾岛上“反日”的带头人。其前后表现虽异，但实质一样。何应钦对日观的主旨，既有感情、立场、功利方面的因素，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需要。这

将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明晰。

去台以后，何应钦在“反共复国”的主旨下，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努力。特别是他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阴谋。虽然他顽固地坚持极不现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强调中国应该统一，却是与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前提相吻合的，也是为所有炎黄子孙所欢迎的。

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何应钦长期把反共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为之宣传鼓动、践履笃行。何应钦始终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但他与真正爱国并且能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共戴天。实践已经证明，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他真诚的爱国动机，必须同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道路是统一的。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所选择的爱国方式和救国之路，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但是，何应钦所标榜的“爱国”，同他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历史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一条民族自弱自戕的绝路，而他却至死未悔。何应钦所为之拼命的这条道路，延缓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使历史倒退；在抗日战争中，它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使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不应付出的沉重代价。

国共之间的战争早已结束，一切爱国者都希望结束两党的对峙，使祖国尽快统一、富强。但何应钦生前固于一党之私及个人之利，不肯放弃早被实践证明既违背时代，也违背人心的反共的政治信仰。把“爱国”等同于反共，这是他个人及同类人物的历史悲剧，也是国民党制造的我们民族在20世纪的一大悲剧。

制造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结束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成为历史上的英雄。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以三代元戎、两朝老将的姿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移之蒋经国身上，“忠臣”“良将”兼而有之。除了感情的延续外，仍是为“正统”信仰和个人操守所驱动。

何应钦对社会、官场的普遍适应性与他个人生活作风、个性品格之间

的矛盾，如果机械地套用模型分析方法，似乎这矛盾的提出本身就因矛盾对立而不能成立。

这对矛盾的表象，是受周围的人推崇备至的宽厚的处事待人之道和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他的严于克己的生活作风和某些深含儒家中和之道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个性，既是蒋何关系的润滑剂，又是在权力角逐中不易成为众矢之的的护身符。何应钦外在的优柔寡断、诚挚和内心的深含不露、工于心计能相辅相成。他在官场上和政治斗争中的世故圆滑、礼让谦退，与他不大肆聚敛挥霍、洁身自守颇不协调。他没有恶习嗜好，但对周围的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狂嫖滥赌、巧取豪夺等现象虽有不满，却无可奈何，有时还故意放纵，以免结怨。这种社会环境与他个人崇奉的道德原则的冲突十分激烈，他要真正坚持个人认可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自保并求得发展，他不能不表现出政治道德与生活道德的矛盾、对人对己矛盾的双重人格。他追随蒋介石反共起家，一切皆以反共利害为依归。在蒋介石面前，他一味顺从逢迎，很少立异执言；即使追权逐势，只想巧取不敢豪夺，故能侥幸避祸，保全禄位；而他对上谦恭，对左右和气，对朋友颇礼貌，对部下、学生均无架子，人缘颇好，亦能使部下替他卖力。他办事缜密，工作勤奋，循章依矩，不越雷池。有时亦身先士卒，能作表率。他追随蒋介石，“从一而终”。在CC系、复兴社、政学系之间，取超然之势，尽量回避冲撞。去台后，他对“大陆派”与“土著派”，亦双双结缘联谊。即使受到排挤，也能委曲求全，终能旋伏旋起，解怨释嫌，永享尊荣。

何应钦已经逝世十多年。台湾今日之国民党也非何应钦在世时之国民党。自祖国改革开放和台湾调整大陆政策以来，两岸史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或取长补短，或初有共识，或求同存异。但由于何应钦研究中造成的盲区、误区甚至雷区的历史原因的延续，以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旨趣的差异，即使在信息时代，史料资源已可共享的今天，对何应钦其人其事的研究和评价各执一端者非仅一二。

复杂的政治、历史、人文背景，造就了复杂的历史人物。何应钦作为

近代中国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军事人物，其所作所为自有他无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或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实践尚在进行之时，自然不能盖棺定论。而当何应钦作为历史人物进入研究者视野时，肯定其历史合理性或指陈它们的历史必然性，便有了可能与必要。因此，笔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把何应钦研究作为从事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切入点，也曾发表过引起争议的“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在何应钦研究中影响面最大的问题，大约是“攘外安内”、“何梅协定”、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主战动机、亲日派等最为关键。现提出探讨，以期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目录

Contents

一、“福将”之星的陨落

金陵春梦破　梦破人未醒

（一）

1949 年 4 月 1 日 10 时半，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3 个小时后，南京当局指使反动军警特务对给这个代表团送行的要求真正和平的 6000 爱国学生行凶。据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迄 2 日黄昏止，学生已死 1 人、伤 11 人、轻伤 88 人。而另据法新社 2 日报道，学生死 2 人，12 名濒于死亡，55 名重伤，50 余人失踪，并有数名学生被捆起来投入河中。

南京惨案这血写的事实，把何应钦等人骗人的和谈“诚意”冲刷得一干二净。4 月 3 日，新华社在《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的社论中指出，南京惨案更进一步说明了李宗仁、何应钦政府的和平“诚意”是什么。自这届政府上台以来，“做了一件确实有利于和平谈判的事情没有呢？没有，一件也没有”。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一个战争罪犯的毫毛也没有损伤过，但是逮捕和屠杀争取真正和平的人民的事情，却仍然在全国民党统治区层出不穷，南京惨案达到了这一时期公开残杀人民的顶点”。

在和谈问题上，何应钦与李宗仁是略有区别的。李宗仁对和谈的“诚意”似乎比何应钦要多一些。但他把心思和努力集中到如何“划江而治”和寻求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援助上，以便真正取蒋而代之。诚如张治中所言：“实在说，李的主和虽然目的在倒蒋，要是不问动机如何，他到底是想和的；可惜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的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的行动[①]。”而何应钦的“诚意”并不止于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是要想在“划江而治”的基础上，恢复

---

①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社 1980 年版，第 138 页。

昔日国民党对全国的一统天下。

蒋介石虽在溪口，貌似野鹤闲云，但却有 7 部电台与外间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越过李宗仁、何应钦任意撤调封疆大吏；参谋总长顾祝同要调一兵一卒，都得向溪口请示。对蒋介石这种垂帘听政的太后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往往“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但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却不敢在行动上有丝毫拂逆蒋意。一旦他冷静之后，而李宗仁还在大骂蒋介石，何应钦反来劝说李宗仁，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对何应钦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矛盾言行，李宗仁深感诧异。但何应钦私下据实告诉李宗仁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①]!”说得李宗仁也不寒而栗。因为有人也曾经警告过他，就是你这代总统身边的侍卫，也全是蒋先生的人；只要蒋先生需要，随时可置你于死地。何应钦、李宗仁认为，要避免蒋介石在背后掣肘，唯一的办法是动员他出国。他们曾经请张治中等人委婉相劝，晓以利弊，都是白费口舌。因此只能听之任之，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国民政府原本就没有诚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而何应钦充当了国民政府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那股特别顽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言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何应钦又一次为了蒋介石集团和个人的私利，甘受举国口诛笔伐的历史罪责。

4 月 20 日，已经是国民政府表明态度的最后期限了。以李宗仁、何应钦为首的“和谈最高指导委员会”最后集会通过答复中共中央的电文，并由力主拒绝的何应钦向立法院“分析”中共代表团所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报告答复中共电文之内容。何应钦认为，“此项和平协定方案，充满了征服与接收的姿态，毫无对等谈判意味”。他向立法院所作的“分析”，可概括为六点：“第一，这个共方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事管理方案’”；“第二，就精神上说，根本不是和平的精神，更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精神。如果说是降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 958 ~ 963 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0 年印行。

书，比我们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文件苛刻得多”；第三，对国民政府理所当然要承担的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何应钦认为，“就政府的负担说，实在也担当不下来”；第四，对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军事独占是对付征服异族的方式、“报复的方式”，因而“不能接受”；第五，“关于军队的改编，当然十分严重……共军不仅一点儿也不改编，同时政府所属陆、海、空、宪警、地方武力，以及一切军事机构、学校、工厂、后勤单位，均一律改编为‘共军’”；“第六，所谓由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政府也是毫无地位……政府在未来政治上，可以说丝毫没有地位。”[①]

何应钦与李宗仁两人联名致国民政府代表团并转中共代表团的电文中，对《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全盘否定。该电文说：“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势，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为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企图再度延缓解放军的渡江战役。

（二）

1949年4月20日午夜至21日，早已把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过长江天堑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地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同一天，何应钦、李宗仁召集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慨叹何为？据李宗仁说：“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

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等一帮高级将领分乘3架飞机前往杭州，蒋介石早已焦急地在笕桥航校等待。当李宗仁向蒋表示，和谈既已告失败，请蒋总统复职。蒋当即表示：此次会议不涉人事变动，只为求内部团结，共同反共。会上决定在国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10～1013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台北印行。当这份电报送达中共代表团手中时，和平谈判即宣告彻底破裂。

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决策，先由“非常委员会”通过，再由政府执行。于是，蒋介石公开抛弃“引退”外衣，直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凌驾于政府之上。他要亲自指挥与共产党的“最后一战”。什么代总统、行政院长，名正言顺都得听他指挥了。在这次会上，还形成了四项决定：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部署，总统府和行政院必须立即迁往广州。以加强国民党内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但凡涉及代总统及政府方面的具体权力方面事情，只要李宗仁一启齿，蒋介石都顺着他的意思，满口应承，完全支持，并支持到底。何应钦、李宗仁原已准备好的一肚子牢骚、计划、建议都只能吞回肚里。李宗仁到底拉不下情面，何应钦却因蒋又再次表示对他的重用，名义上有了统一指挥三军之权，仿佛西方的战时总统一般，哪能再有异词?

当夜，何应钦返回南京，命新闻局发表公报，把和谈破裂的责任全推给共产党，安排各部尽速完成向广州撤退事宜。深夜，四郊炮声隆隆，枪声密集。何应钦乘车返回斗鸡闸4号，叫司机在南京的主要街道绕行一遍，以示告别。往昔的夫子庙、花牌楼、新街口，目迷五色的繁华景象已无影无踪，除了呼啸而过的军用车辆和巡逻士兵之外，行人寥寥无几。从鼓楼到挹江门的新区，过去车水马龙，那些鳞次栉比的洋楼别墅，早已十室九空，偶尔有几洞窗口的窗帘里隐隐透出昏暗的灯光……

23 日上午 8 时，在越来越近的枪炮轰鸣声中，何应钦匆匆登上飞机，前往上海。飞机从南京上空飞过，尽管长江如练，城阙依旧，但何应钦两眼茫然，眼空无物，从内心发出“别时容易见时难”的万千感慨。

羊城旧侣拆墙　败将尽忠赴台

(一)

1949 年 4 月 23 日，就在何应钦的座机离去后 8 小时，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黄埔路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被降了下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欢呼声中升起来了。盘踞在南京整整 22 年的

蒋家王朝宣告灭亡。

在这苍黄翻覆的历史性时刻，何应钦、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集中现有兵力保卫上海。在杭州，蒋介石宣布改组“国防部”，不仅让何应钦统一指挥三军，而且将过去奉“总统”之命执行军令的参谋总长归属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似乎何应钦有职也有权了。但“蒋总裁”正准备由幕后走到前台，汤恩伯也没有把何应钦放在眼中，对淞沪防务依然秉承蒋介石之意，我行我素。因此，何应钦实际上对军事无从插手，权充当所谓“政府发言人”。他这时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

> ……共产党此次乘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致狄港、江阴、扬中等地相继弃守，首都陷入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宜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策源地，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自由，继续奋斗[①]……

何应钦在以他名义发表的这篇对蒋家王朝的祭文中，居然还以“爱国者”自居，称他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挣扎“终必胜利”，就连蒋家王朝的群臣也不会相信此番诺言了。

上海有蒋介石坐镇，45 万坚守孤岛的国民党军又是汤恩伯的禁脔。何应钦自感多余，于 23 日南下广州，去主持尚属于他的“行政院”的第 56 次会议。

李宗仁意识到与蒋介石公开摊牌，要他不再干预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使自己“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决难做到”，就是蒋真肯放手，李也“毫无把握”。他离开南京后径飞桂林。在桂林，他陷于是做“降将军”，还是做“断头将军”的两难抉择之中，不愿到广州视事。

历史真会嘲弄人。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或给历史抹黑的形形色色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21 ~ 1022 页。

的人物，便是它嘲弄的对象。何应钦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飞黄腾达，始于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后来追随蒋介石反共，由广州到南京，登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生涯的巅峰。然而，22年之后，他却由南京又回到广州。去时辉煌，回时凄惶。这一来一往之间，何应钦由一名参加国民革命的“福将”，成了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共反人民的败将。

他一飞回广州，下榻之所尚未安顿，便紧急召开了“行政院”第56次会议。为了给先后撤至广州的阁员们鼓劲充气，何应钦重复着他在离开上海时对报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把国共和谈破裂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并声称南京的失守，纯属主动的战略撤退。他说：“共产党此次趁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首都陷于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应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源地……继续奋斗。”他还声称，这奋斗定会如22年前的东征、北伐一样，取得胜利①。

何应钦主持的这次“行政院”会议的收获，是通过了两项实属多余的决议：一、撤销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其实，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等该代表团的成员，均已弃暗投明，留在北平，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共同建设新中国。之所以明令撤销，是何应钦借以表示，今后上述诸人的一切活动，均与他的政府无关了。二、尚在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区域，一律停止对解放区的邮电汇兑。这道命令，似乎是给何应钦的五弟何纵炎下达的。当时何纵炎在广州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副局长兼储金汇业局局长，由于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辞职未获批准，称病在家，何纵炎事实上行使了局长的权力，冻结向解放区的邮电汇兑，除表明政府与中共势不两立之外，实际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钱流散，以解决政府财政的断炊之虞。

这两项决议虽无补于时艰，但毕竟还是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仍以“正统”自居的政治表态，也是何应钦尚存权力的佐证。

何应钦独自在广州，虽撑起“政府”的门面，却几乎陷于当年南明永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0～1021页。

历皇帝朱由榔由广西流落到贵州安龙时，“除扈从之外，无一兵一卒为王所有”的那种窘境。



何应钦之五弟何纵炎（曾任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

身处覆巢之下，蒋介石依然故我。4月27日，他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文告，幻想乞求“友邦”神来之手，让22年前的历史重演，并硬撑面皮，自欺欺人地说：“11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在这篇文告中，蒋介石左一个“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右一个“所望我全国军民，一致接受李代总统的领导，全体将士，绝对服从何兼部长的指挥……达到成功的境域”[①]。这种意在言外的表态，何应钦也明白，是蒋介石要正式出山前的序曲。

（二）

南京解放以后，本已激化了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李宗仁闲居桂林，与拥兵华中的白崇禧谋划如何保存桂系精锐，另谋出路。蒋介石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着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嫡系部队，妄想将政府南移，固守西南、西北、华中，绝路中寻一转机。他虽然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和政府职员，“一致接受李代总统领导”，“绝对服从何兼部长的指挥”，但实际上他对内心想与共产党谋和的李宗仁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何应钦这位心腹干将反共的能耐和对他的忠诚已大为怀疑。但工于权术、心计的蒋介石，一方面仍要顾及“法理”，既不能骤然罢黜代总统李宗仁，还想利用桂系的数十万军队为他做最后的一拼；另一方面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2页。

面对“赤焰滔天，挽救乏术，人心迷惘，莫可穷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的乱局[1]，何应钦这位“武甘草”似能起一些调和功能。犹如甘草不能单独治疗顽症痼疾一样，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无一官一员可供驱使的何应钦，纵然费尽移山心力，也只能徒张空拳替蒋介石呐喊。

擅长夤缘时会，随机应变，常常脚踏两只船而能左右逢源的阎锡山，在国民党江河日下、四分五裂之时，毅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充当调和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巨头之间矛盾的说客，企图拉拢国民党各派系，支持残局。他两次飞往上海，向躲在太康兵舰上随时可以逃跑的蒋介石请示机宜，又两次飞到桂林向李宗仁劝驾，希望总裁、代总统能负起统驭、督导之责，帮助何应钦，挽救国民党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危机。

早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何应钦替蒋操戈，纵横捭阖，瓦解了冯阎同盟，分而击之，使蒋终获胜利。他对山西土皇帝的文韬武略并不欣赏。但处此燕巢危幕、命在旦夕的绝境中，能有阎锡山这样的人在充当“激流中的勇夫”，自然倾心相与，委以重任。何应钦希望阎锡山设法劝说李宗仁回广州，以便凭借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从经济入手，延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何应钦深知李宗仁为人宽厚、顾全大局、好合作，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声望，如能请其坐镇广州，指挥白崇禧手中的几十万精锐，号召云、贵、川、康，这小半壁河山尚可撑持些时日。况且，何应钦之所以临危组阁，跳下了火坑，导源于李宗仁的推荐。于是，何应钦函电如飞雪般发给李宗仁，希望他能这时出面，一起共度时艰。但李宗仁却不置一词。5 月 2 日，何应钦只好央求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偕同桂系实权在握的白崇禧亲赴桂林，并带去何应钦给李宗仁的一封亲笔密函，迎劝李到广州视事。李宗仁阅罢何应钦的情切意深且旨趣与己相投的信后，向阎锡山说，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他立即恢复视事。阎表示他尽力周旋。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

①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 133 页，转引自《阎锡山评传》第 47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三、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调遣。五、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这六项要求，虽由李宗仁之口提出，实际上表达的是何应钦与李宗仁的共同意愿。

上述六项要求，以《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的公文形式，作为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先决条件。阎锡山自告奋勇，亲自携带此件前往上海面呈蒋介石，居正等人同时将内容电告何应钦。何应钦阅后，心虽纳之，对外却面显难色，不置可否。他深知与蒋争权，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情急势紧之中，只能出此下策。

5月4日，阎锡山的专机抵达上海，在太康兵舰上与蒋介石作了三次长谈，听取了蒋对李、何的要求。素以狡诈而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旋伏旋起的阎锡山也十分惊讶，对李宗仁这般无理的要挟，蒋介石表态之爽快、态度之真切实在令人感动。蒋说："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并拍着胸脯表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当然，最后却又补充了一句：请李宗仁姑念他此时此境已无颜面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其以在野身份居留台湾①。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犹如鹰隼临死前的悲鸣，其声虽哀，然其心未改。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蒋介石亲自下令用专机将他的答复送往广州面交何应钦，其中有"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之句。蒋还委托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3人再次赴桂林敦请李宗仁速返广州。蒋介石有如此令人感动之举，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虽多次领教了蒋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这次再也找不到托词，又碍于何应钦这位老朋友的苦苦央求，只好勉为其难，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与何应钦共同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当何应钦以为有了蒋介石不再掣肘的许诺，又得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依靠，可以有所作为时，解放军的前锋已深入福建境内，追击国民党溃军的速度一昼夜高达100公里，而国民党军逃跑的速度亦与之相当。面对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何应钦的精锐之师，不是被全歼，便是缴械投降；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落荒而逃。身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虽三申军令，坚守待援，但前方将领置若罔闻，依旧全力向南逃命，而且边退边电催军火接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80页。

济和催发欠饷。何应钦几次向蒋介石去电告急，希望火速由台湾运来一些黄金、白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告急电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

5月10日，何应钦列席立法院会议，并在大会后的秘密会议上，向有关立法委员报告与中共谈判破裂的经过及政府撤退广州的经过，以推卸责任。他在秘密报告中特别郑重声明："和谈破裂系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并下总攻令，大举渡江，所以共党对和谈破裂应负完全责任。"为了表示他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以来，所作所为莫不"益励忠贞，悉力以赴，绝不敢瞻顾徘徊，稍卸其应负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和谈的经过、江防崩溃的情形，尤其是如数家珍地报告他主持实施的政府迁穗及南京大撤退的功劳。

就组织实施大撤退而言，何应钦真可谓全力以赴了。从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之时起，到23日的20多个小时内，何应钦指挥调动飞机32架次，运出"党国"要员11300余人；调集火车3列，载运700余人到上海。自24日至27日止，又使用飞机51架次，飞台北、重庆、广州，共撤退1349人；动用"景兴"、"秋瑾"两艘轮船，载运人员2250名及政府各种各类办公物资安抵广州；"永兴"号轮船亦载人1200名到台北，等等。

为了让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立法委员们吃定心丸，何应钦在报告他们最为关心的军事形势时，不着边际，故弄玄虚。他详尽而具体地分析了解放军大举渡江的战略意图，认为是意欲孤立上海，牵制华中，进出浙南、闽北，威胁福州、厦门，并进窥南昌，尔后才犯粤境。而对西北方面之胡宗南所部，似亦有所行动，而"国军"方面已早有准备。当与会者询问他应如何指挥国民党军进行抵抗时，他说："国民党军队今后的具体的军事计划，不便宣布，但原则上可以奉告，即坚决执行持久作战，以争取最后之胜利①。"

其实，何应钦心里十分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的防御计划，蒋介石根本不屑一顾。他与顾祝同等提出的"守长江而不守上海"，因与蒋介石、汤恩伯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意图针锋相对而被否决。蒋介石是习惯于几千里以外凭想象指挥前线的将领。他这个国防部长有职无权，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9页。

补天乏术。但他也有自己的金蝉脱壳之计：他向那些立法委员，也等于向世人介绍了被他自己认为是"自杀政策"的上海防卫的意义及情况，认为上海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太大，必须竭力固守，非至已无战略价值时，不能考虑撤退。那些对军事并不十分在行的立法委员们，也认为守上海无疑是正确的。何兼部长已告诉他们，汤总司令可资调遣的部队达45万人，早已制订了固守上海的计划。听报告的人们未必都听得出何应钦话中之话：上海守得住与否，与他这空头国防部长毫无关系。

已经是进退失据的何应钦，他那矛盾惶遽的心情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他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道："应钦痛感事与愿违，本应退避贤路，唯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心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现在李代总统已于前日莅临政府所在地之广州，贵院暨监察院亦均已在穗集会，对于救亡图存之大计，必有贤明之决策，应钦遵循有自，当可减少过失，共赴事功。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德一心，群策群力'八个字，并且求改革，求进步，不动摇，不屈服，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①。"

何应钦所说的"最后胜利"的前提早已不存在，这种胜利的期许，不过是对死者临终前的安慰；或许是明知前途凶多吉少，为不使自己中途折返而发出的自欺欺人的豪言壮语罢了。

眼前的财政危机，何应钦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缓解。蒋介石虽有"无不竭诚"之类的许诺，而李宗仁的六项要求中关于财政金融的要求十分具体而明确，《谈话记录》是这样写的："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②。"然而，多次电催，未见分文运来。深知蒋介石为人言而无信但却常对蒋抱有幻想的何应钦，于捉襟见肘的拮据之时，竟然请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到台北，面见蒋介石，希望能调用一点储存于台湾的银元、黄金或美元，以安定金融，并应急需。岂料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30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79页。

蒋介石竟断然拒绝。

5月16日，为了解决危急如焚的军粮、金融、地方财政等难题，何应钦电召国民党尚能控制地区的各省政府主席、财政厅长、田赋粮食管理处长、省参议会议长赴广州开会，商讨挽救对策。应到会的不少人都借故不到。开会时，何应钦所提各项应急措施都难得多数人附议。尤其是为了筹措军饷和军粮，他提议恢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所实行的“征实征借”政策。何应钦做梦也没想到，带头反对他的竟然是他家乡的守土长官、担任过国民政府粮食部长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紧跟其后，贵州省财政厅长潘锡元、省议会副议长杜叔玑及贵州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谢伯元等，也联合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一起反对，致使何应钦的提议未获通过。此时的何应钦，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5月19日至20日，李宗仁出面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陈济棠、台湾军政长官陈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联勤总司令郭忏、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谷正伦、王陵基以及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的代表刘任等人再次召开会议。会上，不管何应钦如何晓以“党国”存亡利害，还是动以部属朋友之情，谈到要钱要粮，与会者都说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能普济时艰？商量来商量去，终无结果。

何应钦又找来财政部长刘攻芸、中央银行总裁徐堪、被称作“航运大王”的太平洋轮船公司的经理卢作孚和掌握川康银行总管理处的刘航琛等财政和运输业的首脑，让他们充当说客，使那些执迷不悟的军政首脑、参议会议长们有所醒悟。然而，依然是白费唇舌。何应钦就商于五弟何纵炎，想将他手中所支配的储金汇业局的公款100余万美元挪出应急。何纵炎虽想助兄一臂之力，但没有蒋介石的指示，他也不敢挪用。何应钦在财政上已无路可走了。

至于军事方面，在李宗仁抵穗视事以后，何应钦即配合白崇禧拟具计划，意欲将国民党军自宁夏、甘肃、陕西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一线做通盘的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解放军持久作战，等待美援的到来。

解放军全方位的攻势压迫于外，蒋介石掣肘于内，国民党军的嫡系都想保存实力，跟随蒋介石退保台湾。何应钦计划中的这一字长蛇阵便出现

了薄弱环节和裂隙。按照何应钦的计划，拟把江西划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然而蒋介石的私心在作怪，偏令何应钦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远驻台北的陈诚任军政长官，并把江西划归其指挥。对于江西战场的国民党军，陈诚虽鞭长莫及，但同样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却可以任意遥控。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疾速南进时，皖南一带几成真空。解放军自浙西、赣东南下，浙赣路即将被截断。何应钦、白崇禧分别以国防部长和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同时致电驻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令其如上饶不守，可伺机撤往赣江上游地区，与白崇禧所部会同据险防守。何应钦还通电各军政长官，令胡琏兵团拨归白崇禧指挥。然而胡琏所部两个军约 5 万之众，却直接奉蒋介石之命，不战而取道杭州、汀州，直退广东的潮州、汕头，尽可能保存实力。原驻青岛的刘安琪兵团，不听何应钦令其北上的命令，径直撤退到海南岛。原驻河南的张轸兵团撤往湘北后，便开始酝酿起义。5 月 17 日，当武汉被攻克后，张轸兵团起义，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序列，回戈反击白崇禧，迫使白崇禧将华中长官公署迁至长沙。而驻守湖南的程潜所部也已开始有起义的迹象。

在何应钦的计划中，蒋介石的嫡系宋希濂部十余万人，武器精良，左可凭借湘西大山，右可依靠八百里洞庭湖，以迟滞解放军的攻势。当何应钦下令要其死守湘西至岳阳一线时，宋竟置军令于不顾，擅自将部队撤至鄂、川边界的恩施一带，致使芷江、常德一线门户洞开，白崇禧所部将有被解放军包围之虞。何应钦只得再次通过长途电话下达命令，要宋希濂务须遵令率部迅速赶至指定防区。不料宋在电话中同何顶起牛来。何指责宋违抗军令，宋则说他撤往恩施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共军，你去那里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听了大吼起来：“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将电话挂断了。

一向以韧、忍二性而著称的何应钦，被宋希濂的傲慢无理气得面孔发紫、浑身颤抖。他对李宗仁说道：“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

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①]!”

何应钦的军事计划，就国民党军内部来说，首挫于胡琏的南撤，再坏于宋希濂的抗命，三由于程潜、陈明仁“密谋”起义，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的席卷之势。原企图仰赖作为广州政府屏障的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何应钦在行政院主持召开的解决政治、经济、军粮、军饷问题的一揽子会议不得要领；军事上的指挥因蒋介石的作怪而无法实现；财政上的巨头们人人作壁上观。与其坐待军事上一败再败，经济全面崩溃、政治散摊烂架而当替罪羊，不如趁早辞职避祸。

5月7日夜，何应钦既负气又焦虑地连夜草就辞呈，次日一早便递交给李宗仁。

何应钦在辞呈中感激李宗仁约他组阁的厚意殷眷，历数了他所提出的要挽救时局的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和谈问题、经济问题、军队革新问题、立法院问题、外交问题等，除立法院这一空洞无物的改革建议获得全体立法委员的支持外，其余实际问题，事实与他的愿望有天壤之别。他痛心地申述道：“乃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全国官兵公教人员之生活，不能有合理之维持，民众疾苦，愈益加深，长此以往，恐将陷于万劫不复境地。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名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②]。”

李宗仁虽体谅他的苦衷，但仍诚挚挽留。就个人关系而言，何应钦与他最易相处。何应钦一走，他更是孤掌难鸣。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们也群起挽留吁恳，要何打消辞意。

何应钦虽然感动，但辞意益坚，几乎是声泪俱下，以极沉痛的语调对李宗仁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话已说绝，于公谊私情，李宗仁都不能再强人所难了。

5月30日，李宗仁在事先征得了由居正继任行政院长的许诺后，遂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议，接受何应钦内阁全体总辞职。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何应钦辞职的隐衷是显而易见的。但蒋介石及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99~900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43页。

其支持者悉诿过于李宗仁，李宗仁又全推给蒋介石。何应钦虽委婉曲折地有所倾吐，但言犹未尽，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愿归咎于李宗仁。

何应钦在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的沉重打击下，被蒋介石、李宗仁的斗法逼下了台。而李宗仁所提名的行政院长的继任人居正却遭到CC系和黄埔系的反对，立法院也不支持，结果被选掉了。此时李宗仁如梦初醒，才意识到阎锡山如此卖劲地周旋于蒋、李、何之间，并非无所图；而蒋的旨意一度由阎宣达，足见蒋早胸有成竹，于是提名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长。6月2日再度举行选举时，以200票赞成，50票反对获得通过。

阎锡山成为继何应钦之后“跳火坑”的败军之将。从心理上说，起初他确实感激蒋介石终于让他过了一下内阁的官瘾。不多久，他就体会到这“战时内阁”的处境，连何应钦内阁也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何应钦卸任之后，身子闲了，心却更乱。他以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而深感惶恐。他自组阁以来，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功过是非评说就不一致。他扪心自问，是按照蒋介石敦促他组阁的亲笔函的旨意去办的。

1949年3月12日是何应钦的六十大寿。何因规避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偕夫人到杭州“避寿”。3月10日，张治中在溪口面见蒋介石，陈说何应钦不愿组阁的苦衷。蒋听后，便写了寿轴和一封亲笔函，托张至杭州交给何应钦，以祝寿之名，实则迫何就范。张治中到南京后，邀约上顾祝同、白崇禧赴杭州给何祝寿。

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寿轴是：

敬之同志
六秩大庆
安危同仗
甘苦共尝[1]
中正敬祝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亲笔函写道：

① 倪抟九：《何应钦上将》所附图片。

> 敬之吾兄勋鉴：礼卿、文白二兄来奉，关于大局与个人之出处，均已详讨甚切。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乱，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亦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余托礼卿、文白二兄面详一切，恕不赘述。顺颂时祉！中正手启。[①]

何应钦无时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意志。在反共的意志之下，以何应钦稳健的性格和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他永远也摸不准性格多变，几乎让人以为没有固定性格的蒋介石的“意志”，反而贻人以他与李宗仁私交尚属不错，可能又一次助李反蒋的口实，使他无法自辩。

蒋介石明令下野的何应钦必须火速到台湾，并随时为他备有专机相送。何应钦眼见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国民党要人在此危难之际竞相“自我放逐”，或逃亡海外或滞留香港。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被陈诚取代以后，逃亡到巴西；政学系的要人熊式辉和曾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也都不顾蒋介石的盛情邀请，滞留香港；国民党中最有钱的宋子文更是退步抽身早，在蒋介石尚未退守台湾前，即辞去区区广东省长一职，去美国当金融家去了；孔祥熙于1948年同蒋介石闹翻了脸，负气到美国经营他自己的银行；非嫡系的张发奎、龙云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怕去台后遭蒋介石暗算，索性举家迁居香港，望定风向后再作打算。更有许多何应钦所熟悉的国民党要人，如鸟兽散，踪迹难觅。

非嫡系者视何应钦为蒋介石的嫡系；真嫡系者又与何应钦有种种隔膜。蒋介石对待何应钦，爱则加诸膝，恶则投诸渊。何应钦思前想后，还是听从蒋的召唤，飞到台湾。一者表明自己对“党国”确实忠贞不贰，二者愿为重建台湾反共基地再竭绵薄之力。

正值寿终正寝的国民政府还利用西南一隅，在重庆、成都做垂死挣扎之时，何应钦虽五内俱焚，可疲惫不堪的身子却得了宽余。

东方明珠的香港，令世人向往，何应钦也不例外。当时，许多由大陆

---

① 函中“礼卿”指吴忠信、“文白”指张治中。

赴台或移居国外的达官贵人，多以香港为中转地。已经卸任后的何应钦也趁尚未赴台之暇，渡海到香港观光。他在大陆时，虽不事张扬，出行时轻车简从，但随处都感到他的显赫威仪带给别人的红眼钦羡。到了香港，虽不乏要人朋友相伴，却像置身异国他乡，满街灯红酒绿、珠光宝气，触目却尽皆陌路之人。他不似某些国民党要人腰缠万贯，到香港的花花世界是享受纸醉金迷、抢购套购的，他只不过是散心解闷。尽管是落魄之人，威仪依旧，尤其是胡须，必须每日剃得干干净净。他用的剃须刀是美国货，但剃须刷子虽也是舶来品，因年代久了，早已脱毛，需要更换。一日，他带随从副官着便装到一外国人开的百货公司购买獾毛剃须刷子，看到货架上摆着这种刷子，副官便叫那一脸傲气的混血儿售货员，请其拿出一把来看看。谁知这位售货员小姐看他俩西装陈旧，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似乎是说：谅你们买不起，何必多此一举，但又不得不拿给他俩看一看。副官哪受得了这等白眼，故意掏出一张 1000 元的港币给她找钱。她当时很窘，找不出钱来，不得不到大柜台上去调换零钱。副官便对她说：“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吗？现在你连钱都找不出来！”这位售货员满脸通红，连话也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何应钦始终没说一句话，离开柜台后才说：“你给她的教训很对！”当解放军挥师南下，直逼广州之时，何应钦才乘专机不无留恋与感慨地向茫茫海天中的台湾岛飞去。

老臣蛰居避祸　顺民投石问路

（一）

1949 年的台湾，地理位置极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偏安困守。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已打下了较坚实的工业、交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美国在蒋介石败逃之际，一度想撒手不管，但对美国来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又不容忽视。蒋介石退保台湾前后，始终没有放弃争取美援的努力。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曾说过：“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奈我何！”

何应钦辞职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仍然在广州。从政治上考虑，蒋介石不能不过问，但对何应钦个人，他却无暇顾及了。何应钦举家迁台后，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况，连找一套像样的私邸也无

人过问。所幸何应钦得势之时，对部属虽无金钱、权力的赏赐，但宽厚谦和，颇得部属的好感。当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纽先铭，念及老上司的好处，遂将自己使用的原产权归台湾省物资局的一幢小楼让给何应钦居住。这幢位于台北牯岭街上的不甚起眼的小楼，虽无官邸的气派，也无别墅的优雅，但在当时的台北，也算得上能安居乐业之所了。

久历戎行、宦海风波的何应钦一旦无权，亦无人过问，虽自称"闭门思过"，但心气难平，常是铁马冰河入梦来。何应钦青少年时代养成的"退后一步天地宽"的思想，常在逆境中帮他排忧解难。此时的他，当然不愿与自己明里暗里较量过的红得发紫的陈诚相比，这种比较会令他心灰意冷，无地自容，唯一的心理平衡是冷眼旁观自己的后继者阎锡山如何坐在火山口上支撑残局。

何应钦下台，阎锡山继任，都是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结果。当国民党残余势力行将在大陆灭亡之际，蒋、李矛盾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蒋介石令国民政府迁重庆，幻想借抗战时的陪都沾一点胜利的灵气，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李宗仁却拒绝随政府迁渝，径自由广州到南宁。当蒋介石请他赴渝共筹全局保卫大西南时，李宗仁却在南宁公开宣称即将赴美治病，把"中枢军政事宜"交阎锡山负责，不久便去了香港。蒋介石又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4人，带上他的亲笔函赴香港劝驾，还特意嘱何应钦从旁规劝，要李宗仁赴渝。尽管蒋介石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掌握。何应钦对于李宗仁犹恐避之不及，岂敢再次沾上？推说自己与李宗仁嫌隙已深，不便介入。不管蒋介石怎么许诺，殷鉴在前，李宗仁岂肯再上当受骗。阎锡山一日数电相催，反倒促使李宗仁一走了之。12月5日，李宗仁毅然离港赴美，把一个被蒋介石搞烂了的摊子交还给了蒋介石。

阎锡山在国民政府迁渝后，虽面见蒋介石，得到尚方宝剑，仍如何应钦一样，只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表面上，他比何应钦"完成总体战"与解放军对抗到底的决心大，但他所遭遇的困难，又远较何应钦更甚。阎锡山在重庆立足未稳，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已由湘黔边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威逼重庆。国民政府于11月26日迁至成都。李宗仁已托付阎全权处理中枢军政事宜，蒋介石也积极为他调兵遣将，但他所梦想一鸣惊人的"大西南保卫战"也只不过是纸上空文。

在这些煎熬人心的日子里，在台湾的何应钦每天将所搜集到的战报汇总，独自为“大西南保卫战”设计各种方案，替双方的指挥者调动兵马，总结得失。当时的西南局势，远比何应钦想象的更糟。胡宗南的3个兵团已被解放军所包围，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都正在酝酿起义。蒋介石曾亲往成都部署，也无法理顺这纷乱如麻的局面。

12月5日，何应钦收到台湾当局发给的一份请柬，邀他于12月7日台湾当局参加“总统府”的挂牌仪式。他明白，国民党在大陆的抵抗已经完全失败。

在12月7日台湾当局的“总统府”挂牌仪式上，何应钦与所有参加者一样，并不是怀着对新生儿洗礼的欢欣，而是怀着对一位死者入殓的悲哀去应景。在昔日台湾总督府的门前，“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新招牌虽赫然显目，但既没有“总统”，也没有“代总统”露面，越发使这挂牌仪式显得不伦不类了。

12月8日，台北各报正式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台办公。但仍在部署善后的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直到12月10日才由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怀着怆然悲戚之情，俯视着云层下的大陆河山，向孤岛台湾飞去。蒋介石、阎锡山的失败，对何应钦反倒是一种宽慰和解脱，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非战之罪，在天意也”！

客观上替何应钦临危组阁少有建树推卸责任，也可以冲淡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角矛盾的重大事件，是美国政府决定抛弃蒋介石。

事件发生在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以推卸责任为目的，公开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的某些内幕[①]。但美国政府的招供，却对蒋介石大为不利。白皮书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失败，并非美国援助不力的责任，而在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军事首领“指挥不当”，军队“缺乏斗志”，绝不是“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美国要抛弃扶不起的国民党，台湾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令何应钦不寒而栗；但美国的自供状，却也减轻了蒋介石向何应钦等部属卸责诿过的压力，增加了他们共同为台湾的生存而斗争的凝聚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被抛弃的忧虑与日俱增。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现在台湾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①]"与杜鲁门讲话的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湾撤侨。美国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最高级的武官，只是一位随时准备奉命撤退的中校。美国的宣言及行动，犹如地震一般，使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要人们人人自危。为了稳固动荡的政局、人心，蒋介石频频召集会议，也想到了息影在家的何应钦，要他献计献策，团结部属，动员武装保卫台湾。

何应钦本已无心亦无能过问政事，一旦蒙蒋介石眷顾，又不免雄心复萌。但这点火星却被当头一瓢冷水浇熄。他无意间从亲信处得知蒋介石始终对他存有戒心。就在前不久南京解放前夕，张君劢向蒋介石进言，希望蒋能改以往放职不放权、给名不给实的作风，将军事指挥权真正交给何应钦。不料蒋介石却冷冰冰地对张君劢说："你不识敬之的为人。"张虽不明白此话的全部含义，但自知造次，连说："是的，是的！"

此时，何应钦听到这一信息，顿时矮了一截。他害怕已崛起的蒋经国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以此更加冷落他，因而，对台湾时局的变化格外敏感，格外小心。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表白自己与蒋介石从来就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对华政策的次日，台湾陷于一片惶恐的时候，美国《新闻观察》记者坦斯瑞前往寓所访问何应钦，探询这位国民党军界元老对目前军事、政治有何见解。何应钦虽心急火燎，但却故作坦然、超然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于军政的权衡，瞬息万变，完全要以综合时序发展的各要素，给予当机适宜的处断。本人久荒膺命，斯项事务已非余所应问。"坦斯瑞深知这位久历宦海风云的老将是有意回避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转而探询其个人今后的打算。洞明世事的何应钦依然给他以恬淡洒脱的回答："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衷愿说，从政时冀不负为国家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2）第6~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①。"何应钦的此番表白，与其说是讲给坦斯瑞听的，不如说是向蒋介石表白自己无意重当权臣的心迹。

到台湾后的何应钦，较之黔军时代的何应钦，犹如一块棱角分明的坚硬岩石，被时代的山洪从小溪中冲出山外，再卷入时代的江河。经过国民党官场明礁暗滩的撞击，波涛激流的冲刷，内心依然那么紧硬，但外表已经变得无棱无角，浑圆玉润了。

（二）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 年 12 月 12 日，国民党"监察院"为了替蒋的"复职"制造"法理"上的依据，提请台湾"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何应钦是大陆时期由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自然要在"国民大会"上有所贡献。对弹劾李宗仁案，他心虽有异词，但不能不表现出比别的人更积极的态度。2 月 23 日，何应钦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战战兢兢地听取蒋介石大骂李宗仁的报告。蒋指责李"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居留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②

面对余怒难平的蒋介石，何应钦恭敬如仪地起立发言，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谴责李宗仁的不忠不义。次日，台湾当局"立法院"开会，虽不是法定人数，但与会的 331 名"立法委员"一致通过决议，电请蒋介石"俯顺舆情"，恢复视事。

在所有过场走完之后，蒋介石既不理会台湾国民党内对他复任"总统"的褒贬，也不理睬在美国的李宗仁的抨击，更不顾及依台湾当局"宪法"可以代行"总统"职权的"行政院长"阎锡山的不悦，于 1950 年 3 月 1 日正式复出登台。何应钦应邀参加了蒋介石的"就职"仪式。看着身穿戎装的蒋介石挥舞军帽，向拥戴他的民众致意时，何应钦心中涌起一阵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40 页。

②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99 页，台湾《中央日报》全译本。

阵说不出滋味的激动。蒋在他的《复职文告》中宣称：“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当此危急存亡之日……已无推诿之可能”，“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①]。蒋介石这一复出的气球，并没能使笼罩在台湾岛上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安定下来。

1925年3月13日，是第一次东征中最关键的棉湖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日子，也是何应钦与蒋介石结下生死之交的纪念日。1950年的3月13日，何应钦与蒋介石这对因反共而心心相印的老搭档在台北此唱彼和，为沮丧的军心士气鼓劲。

何应钦主持了纪念棉湖之役二十五周年酒会，当年参加过棉湖之役的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黄埔系的将领出席了酒会。自从退到台湾后，何应钦是首次春风得意，他举杯为黄埔精神干杯，并发表了《棉湖之战感言》的演说。他回顾了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各位袍泽的当年之勇后，转入了应时的正题，他说：“今天革命事业虽已遭受顿挫，而我们现存的军事力量，则千百倍于（民国）14年东征时期。只要我们能够接受过去的教训，效法总理的两大决策，一方面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从棉湖之战看当前反共抗俄战争，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最后一定成功[②]。”说此番话的何应钦十分清楚，在大陆时，800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广大的回旋空间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尚且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败退台湾。而由大陆撤退来的20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已经使台湾岛面临人口爆炸，“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住房奇紧，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境地，那“反共抗俄”的“光明前途”，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宗旨自然是给由大陆来的官兵部属鼓劲。他说：“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按计划完成……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③]。”蒋介石没有发现他这篇文章的矛盾之处：既然“中华民国”尚未“恢复”，他怎么竟当起这“中华民国”的“总统”来了？

---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三）。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41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0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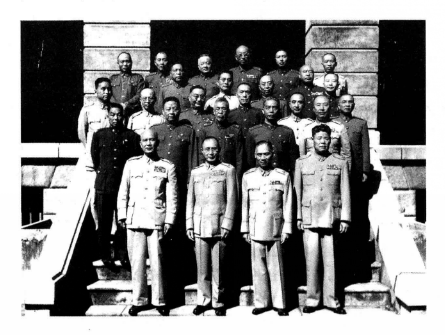
蒋介石“复职”后的第一步，便是进行台湾当局的权力再分配，使过去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真正成为蒋家天下。号称“小委员长”，又是蒋介石干女婿，甚至有人谣传与蒋介石是弟兄的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副院长为张厉生、“内政部长”余井塘、“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郭寄峤、“财政部长”严家淦、“教育部长”程天放、“司法行政院长”林彬、“经济部长”郑道儒、“交通部长”贺衷寒。这些人无一能再自成派系，与蒋分庭抗礼。蒋介石为了向撒手台湾不管的美国作出亲善姿态，选择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的吴国桢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由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抗日战争入缅作战中颇受美方看中的孙立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周至柔不仅任“空军总司令”，还兼任参谋总长。蒋经国则被任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了一切党政特务机构。而忠心耿耿追随其多年的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则以年事已高为由，再也不能染指军政权力了。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自己“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身上转送给了何应钦。所谓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安置被罢黜了的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这一机构成立于1947年4月1日，当时蒋介石就已决定将主任的头衔给何应钦。但何应钦当时正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无法分身履任。于是，主任这一职务便由被蒋介石以军事手段夺了兵权的龙云暂代。1948年何应钦由美国离任归国，因东北战场惨败，亟须有人收拾，所以蒋介石也未提及这一任命。

“战略顾问委员会”虽说没有什么实权，但既有“顾问”之名，官样文章就少不了，日常行政事务更因委员个个都资深年迈而显得人少事多。何应钦多方物色一办公室主任，作为自己的助手甚至代行代拆者。他想到了贵州安顺人韩文源。韩与何既有乡谊，又是他的部属、学生，曾追随他多年，文韬武略、应上对下、办事风格均为何所赏识。于是，何派人去找韩，一连三次均不见踪影。原来，韩文源被杨森等人邀约，到台南游山玩水去了。韩回到台北后，知何应钦官邸已三次派人来找，便立即赶赴牯岭街公馆。何告诉韩，蒋介石催促他务必在5月1日就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职，请韩任办公室主任。韩因在大陆时曾在郑州指挥军队与人民

解放军作战三年，自认为“每一战役都很清楚，稳操胜算，但结果统帅部直接越级指挥，每每与敌人机会，战场总司令碍手碍脚，眼见失败而无法挽回”，从大陆败退后窝了一肚子气。便对何应钦说：“我在海南岛下飞机后，把军衣都烧了，不想再当军人!”何只好对其抚慰有加，并说：“军衣烧了，拿我的去穿。”如此亲切厚爱，韩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不敢再说，又重新穿上军装，随何应钦去上任了①。

1950 年 5 月 1 日，何应钦正式就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他领导下的机构更是蒋介石安抚军队老将的“特级冷衙门”。其时，曾经代理主任的龙云，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由香港赴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蒋介石所给予何应钦的职务，不过是龙云早已弃如敝屣的东西。但对于在官场中尚无立锥之地的何应钦，毕竟有了公职。



1950 年何应钦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与全体委员合影。

---

① 韩文源：《何上将敬公之伟大》，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何应钦上将纪念集》1988 年台北印行，第 325～326 页。

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何应钦借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建校26周年之机，发表演说：要全体黄埔同学，“坚定必胜信念”，“实行战时生活”，“贯彻大会决议”，“以内心的真诚和不怕牺牲的力行，信守誓言，服从领袖，重振黄埔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①。

“改造”中失势　“顾委”里获宠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似乎冷却了的美台关系以死灰复燃的机会。次日，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同时，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中国的危机》的演说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时，指明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环球群岛到菲律宾，台湾成了这一防线中被割断了的环节。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虽不满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但却不能不再度正视台湾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必要时准备启用全球战略中远东的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台湾的态度，曾经笼罩在孤岛上的被遗弃的悲哀孤独开始消散。

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重新获得美国支持，实现反共抗俄的良机。无论是在国民党的会上，还是在他领导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何应钦都献计献策，力主台湾直接出兵“制裁”北朝鲜。6月29日，蒋介石正式向美国政府提议，台湾愿派遣3.3万名陆军精锐参加朝鲜战争。蒋介石、何应钦等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打败朝鲜，借美军之力，攻下东北易如反掌，以东北作基地，“反攻大陆”也就有了希望。无奈的是，杜鲁门总统并不看中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要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准派一兵一卒入朝作战，更不准轻举妄动，趁机“反攻大陆”。美国虽没赏脸，但美台关系却开始热闹起来。美国的第七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无异于替台湾增强了海上防卫，阻碍了人民解放军向台湾发动进攻。台湾在惊惧中镇定下来。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42页。

为了摆脱败退台湾之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困境，也为了清除异己，重振反共的“革命”精神，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发动了改造国民党的运动。

在台湾当局刮起的总结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的反省风中，何应钦内心也不能不承认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所指出的：国民党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实由于“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①]，并非夸大其词。

1950 年 7 月 22 日，国民党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了《本党改造之措施及程序》案。这是 1949 年 7 月 18 日蒋介石在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上所提的《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的具体实施。当时，由于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逃命唯恐不及，哪里能坐下来“改造”？一年之后，“改造”之事才得以重提。

国民党改造的措施及程序首先是停止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推选 15 ~ 25 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同时，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理改造工作。

为了表示对这次事关“党国”存亡和自己命运的“改造运动”的竭诚拥护，7 月 10 日，何应钦在纪念北伐誓师二十四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除重提他过去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率领东路北伐军进攻福建取得永定、松口之役的胜利外，特别阐述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意义。他说：“蒋总统”“要我们对过去在大陆的失败、反省自责，改正我们的错误，特别是本党彻底改造。今天参加纪念的各位，大多数是本党的同志，我们大家如果仔细检讨一下，一定可以知道过去北伐的成功，绝不是纯军事的成功；今天‘剿匪’的失败，也绝不是纯军事的失败。我们站在本党的立场，应该坦白承认，这是我们本党的失败，也是本党全体党员的失败。本来，关于本党改造问题，自去年 7 月，蒋‘总统’将本党改造方案提交常委会后，曾经颁发各地党部督率党内同志研讨，再将意见汇交中常会。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一年，尚未见诸实施……我以为今天来谈改造本党，应该不再是

① 转引自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第 14 页，台湾中国出版公司 1978 年 5 月版。

理论问题，而是实施问题。因此我希望这个改造方案，能早日见诸实施”[①]。

为了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率先垂范，何应钦以他在生活上一贯严谨、不尚奢侈的作风，像当年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号召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实行“战时生活”。他不仅自己做到节俭、勤奋、遵纪，当然客观环境也迫使他必须这么做，而且还四处宣传他的这种主张。他说：“所谓战时生活，从我个人的解释，不仅是指节约消费而言；我以为战时生活，应该进一步的适合于战争需要，即是生活的条件与战争的条件要趋一致。现在我们在台湾，可以说已经到了反共抗俄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固然要力改过去浪费、奢侈、怠惰、骄纵、弛缓、松懈、推延的习惯，同时更要勤劳、热烈、乐观、锻炼、学习、负责任、守纪律，以随时完成我们的战斗准备……去争取我们未交锋以前的胜利[②]。”

过“战时生活”，对何应钦本人倒无所谓，因为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养生之道中就特别注重“勤”、“俭”二字。去台湾以后，依然保持早睡早起，饮食清淡，不嗜烟、酒，热心体育运动的良好生活习惯。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要一下子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他们所过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改变过来，的确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改造。

7 月 26 日，蒋介石宣布陈诚、谷正纲、蒋经国、张其昀等 16 人为中央改造委员，何应钦、吴稚晖、居正、于右任等 25 人为中央评议委员。

从 1950 年 8 月至 1952 年 10 月在台湾当局开展了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而且，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咎于国民党自身的失败。何应钦更从组阁拒和、负隅顽抗到被迫辞职的短短几个月中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派系分歧、利害摩擦，形同散沙，终致不堪一击。而且，他还意识到，自己既属“改造”对象，因为他曾与李宗仁合作，被一些人误解有“毁弃革命领袖”之嫌；同时，他又还必须充当“改造”别人的工具，以表明自己没有“曲解三民主义”、“毁弃革命领袖”[③]。当然，作为改造运动的发动者、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1984 年台北印行，第 193 页。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187 页。

③ 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中国现代史）》第 934 页，台北三民书局 1981 年 9 月版。

主持者，蒋介石之所以要改造自己手中的国民党这个玩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反省既往，湔雪错误，改正作风，强固领导；二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清除异己；三是开脱自己的罪责，把党务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主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头上，寻找替罪羊。何应钦暗自庆幸，自己虽有偏袒桂系之嫌，但却无结党营私之事。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他还是蒋介石的亲信，而且与党务毫不沾边。所谓改造运动，大抵只能冶炼其心，无伤其身，所以他渐渐放开胆子，投入这一运动，并切实负起监督之责。

一年一度的9月9日，是何应钦最引以为自豪的日子。想当年，他代表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了举世瞩目的对日受降大典。5年后的这天，他借纪念抗战胜利之机，在台北的中央电台发表了《从抗战胜利展望反共抗俄战争前途》的演说，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正义与真理终必战胜强权与暴力”。如以这个认识来从事“反共抗俄”战争，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他论述这前途“光明”的道理时说：“今天我们反共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就个人言，是为理性而战。”“换句话说，反共抗俄战争，是全人类的思想战、主义战、生活战，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只有自由奴役的分野。就我们中国来说，不论在大陆，在海外，凡和我们持共同反共抗俄信念的，就是黄帝的子孙，反之，就是汉奸卖国贼”[①]。



何应钦在电台发表演讲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63～264页。

何应钦挥舞起蒋介石铸造的“反共抗俄”这把毒剑，企图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以是否赞同“反共抗俄”来作为划分是否炎黄子孙的界限，足见其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是如何竭忠尽智了。

1950 年 11 月，台湾当局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减少了解放军直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何应钦工作的重心，又从鼓吹备战转到国民党的改造上来，并获得了蒋介石给予的一种殊荣：当国民党台湾当局直属“立法委员”党部和“监察委员”党部改造委员会就职时，何应钦奉命以评议委员资格前去监督。他身着崭新的戎装，以标准的军人风仪登上主席台，带领那帮新当选的改造委员们宣誓，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已经数不清重复过多少遍的改造运动的目的，要宣誓效忠者坚信，只要改造成功，“反共抗俄”就会胜利。他要求这两个中央直属的党部，通过改造而成为全台湾的模范党部。他要求各改造委员“加强思想领导”，“充实反攻准备”，“恪遵总裁训示，保证改造成功”①。

何应钦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氏父子“清理门户”、争取台湾政局稳定的重大举措。初步改造的结果，是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其他派系统统被挤出了决策圈，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军政显要人物阎锡山、孙科、白崇禧、翁文灏等没有一个再与权力结缘，而国民党内原有的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 CC 系，因主持党务不力，导致全党涣散，以致统治惨败而成了蒋介石大张挞伐的替罪羊；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孔宋系，因孔、宋二人早已退步抽身去美国当了大亨而不复存在；以张群、吴鼎昌、吴铁城等为首的政学系，因吴鼎昌 1949 年病逝于香港，张群、吴铁城都因当了“总统府”资政，遂自行瓦解；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在大陆时期是常与蒋介石、何应钦为首的中央系即黄埔系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由于李宗仁去了美国，又遭弹劾而成了台湾权贵们的众矢之的。白崇禧虽然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但多年的隔膜和摩擦，使蒋、白之间疑忌丛生。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不知是蒋介石出于前嫌未释，还是考虑到白崇禧的资历、才识，将他与“五虎上将”之一的顾祝同都安排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何应钦的助手，形成了去台以后何应钦与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46 页。

桂系又一次合作的戏剧性安排。至于在大陆上曾经多多少少在政治上产生过影响的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更被改造运动排斥于权力之外。台湾当局的国民党政权真正成了“清一色”。在这新的权力分配中，年方不惑的蒋经国可以无所顾忌地进入决策圈内。他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台湾情治机构的负责人，又是台湾“青年救国团”的头目。到国民党七大时，蒋经国便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事实上掌握了台湾党、政、军的实权。蒋氏父子的权力过渡在改造运动时就奠定了平稳的基础。

(二)

何应钦去台后，仍与咄咄逼人的陈诚有些过不去。去台后，陈诚的抓兵、抓人、抓事、抓权、抓机会的“五抓”和用心、用力、用人、用势、用诡术的“五用”，依然本性难移，使他在同何应钦的明争暗斗中节节获胜。何应钦看不起陈诚，但陈诚却同时得蒋氏父子的信任，通过改造运动正步入权力的巅峰，他担任“行政院长”，主持“土地改革”，声名大噪，对何应钦是一种刺激。一向能忍让的何应钦对陈诚的得势，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醋意和妒忌，而是处处支持陈诚，谦恭谨慎，反而博得了心高气傲的陈诚和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党的敬重。何应钦的为人更获称道。

1954 年，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接近尾声，何应钦也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新形象。在国民党建党六十周年之际，何应钦又为蒋介石的“改造”大唱赞歌。他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固然是苏联支持中共的结果，“然而我们深自反省，何尝又不是我们本身革命精神的不能坚持，本党优良传统的失坠……总裁看出这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故决心从事党的改造工作，由党的改造达到党的重建”。他还断言：“每经过一次失败，党便有一次改组，革命事业也跟着必然能有一次新的开展。”这次的“改造”，便是“总裁重建本党以完成‘反攻复国’大业的愿望”①。

台湾当局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何应钦晚年命运的蓝图也被蒋介石设计出来了。他被挤出了台湾当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是没有决策权的台湾当局“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政治上他大大贬值了。作为国民党军的元老和黄埔系的第二号首脑，他虽然有了一项虚光耀目的台湾当局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277 ~ 279 页。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荣衔，实际上与台湾的军事决策毫不沾边。昔日国民党军的“福将”之星，被蒋介石高高地悬在冷宫之中，再也不能对外闪耀诱人的权力之光了。但他毕竟是蒋的心腹，去台以后确实表现了“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必要的时候，蒋介石对他仍然是要利用，因而也要表示尊重的。何应钦虽然失势了，但却没有失宠。

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任上，何应钦确实能为台湾决策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献计献策，也能安抚手下那些曾经为蒋家王朝拼死卖命却落得坐冷板凳的顾问们。随着年龄的老迈和台湾政局的稳定，这些顾问们过了时的战略对台湾当局的作用也日益减少。

1972 年 7 月 7 日，由于要精简机构，整个“总统府顾问委员会”就被裁撤了。但一直到 8 月 12 日，台湾《联合报》才正式对外披露：“蒋介石‘总统府’直辖的‘国家安全会议’，人事要简化，组成人员中，本来列有战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简化后把这项规定删改了[①]。”主任何应钦、副主任顾祝同（白崇禧已于 1966 年死去）已然被排斥于“国家安全会议”之外了，他俩也都识相，表示因年老申请“自退”。于是，自愿也罢，不自愿也罢，1973 年台北出版的所谓“中华民国年鉴”便没有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副主任顾祝同的名字了。何应钦的头衔便简化成“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何应钦在战略顾问委员会办公室

① 郭桐：《何应钦的中年与晚年》，香港广角镜人物丛书《国共风云录》。

何应钦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20多年间，究竟“顾问”了些什么呢？据台湾当局“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对他任职期间的评价是：“除襄助枢机外，更以其迭访欧美所见，发表高瞻远瞩之精辟言论，对建设台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贡献至巨[①]。”

由于何应钦在争权夺利中较有自知之明和“宠辱皆忘”的雅量，蒋介石在阵脚稳定后，却也能顾及何应钦的面子，使他感到荣宠依然。如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依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因此，便召开了被台湾舆论讥为“万年国大”的选举。“总统”一职，没有人敢同蒋介石竞选，但“副总统”一职，蒋早已圈定了陈诚，但却要虚晃一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何应钦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②]。从此，这位曾被何应钦视为逞能而又无能的“希文儿”[③] 就一直连任“副总统”到死。

20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的“总统”选举，不仅在美国、日本方引起关注，而且连中共中央高层也曾有所议论。为了坚持一个中国，排除一切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毛泽东也属意于蒋介石继续当“总统”。由于蒋在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方面所表现出的毫不含糊与妥协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首次谈到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不久，他又妙语惊人地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在国际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④]……”蒋介石在岛内外有如此的人望，“总统”自然非他莫属。至于何应钦，连“副总统”候选人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1964年，台湾当局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因陈诚患肝癌医治无效而死去，“副总统”的继任人便成了这场政治闹剧的核心。台湾舆论界一直认为“副总统”人选，无非何应钦、张群、孙科这三人中之一人。因为“宪法”中关于“副总统”地位之规定，是属备补性质。如遇“宪法”上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序》，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印行。

② 江南：《蒋经国传》第26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 陈诚之父字希文，故对陈诚不满者私下称其为“希文儿”。

④ 《党史信息报》（上海）1999年9月15日。

所规定的“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须由“副总统”继任或代行其职。因此，“副总统”候选人的“才干”和“德行”必须是对称的，至代行或代理“总统”时，方能应付局面，安定人心，维护“法统”与“国本”。环顾全岛，具备此种条件者，非何、张、孙三人莫属。但在人事安排上总是扑朔迷离、让人莫测高深的蒋介石，在3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中透露：希望国民党要尽一切可能来奖励新进人才，只有新的人才，踵武相接，才可以使“党国”的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按此意思，何应钦等元老自然不是“新进”，无需再作候选人了，但蒋介石话锋一转，接着说道：新领导层中，也需要“德才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才能孚众望，担重任。这是单指他自己呢，还是别有所指？谁也摸不透。其实，蒋介石这么说，是想让这些“老同志”作为他标榜的“政治民主”的装饰和选举时的陪衬。蒋介石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又暗示，“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宜在60—70岁之间。这无疑是明说“副总统”人选应在何、张、孙之外去物色。因为当时的何应钦已75岁，张群76岁，孙科也已73岁。

当确定“副总统”候选人时，为了使自己心目中“新进”与“老同志”之间能和衷共济，也能平衡舆论，蒋介石私下召见张群，希望他能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群并不糊涂，赶紧推说年事已高，建议“副总统”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对于名为心腹，实又不甚放心，但可像面团一样任蒋捏扁搓圆的何应钦，蒋介石索性不再征求他的意见了，径直授意中央社同时发表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4张照片备用。当时的严家淦才刚进60岁，既属“新进”，又不会妨碍蒋经国子承父业。这虽是强拉上何应钦等人作为严家淦的陪衬，但却也表示在蒋介石和一般台湾权贵心目中，并没有忘记何应钦等人的资历、能力也堪作为“副总统”。这种荣耀无疑也是一种感情上的安慰与笼络，也正是他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效命几十年所修成的“正果”。

借童子军还魂　当老司令发威

（一）

1950年1月，一封来自童子军国际办事处的信函辗转送达何应钦手上。这是一纸给各国童子军总会的通告，其中特别提到了何应钦所领导的

中国童子军。通告说："中国童子军训练15年来，似具备军事预备训练之浓厚特质，已有一年余与本会失去联络，现在因不敢断定其训练之宗旨、原则、制度及方法，是否继续维持，故决定暂行停止承认其会员之资格，以至情况明了后，再行考虑恢复其承认①。"

这最后通牒式的公告，既是警告，却也是启示。"中国童子军总会"与童子军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的一年多，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多，也是何应钦人生旅途的巨大转折的一年多。何应钦虽然是"中国童子军"的总司令，但他哪有闲心去履行职责，于是才造成与国际办事处中断联络的事情发生。在一般人看来，何应钦在权力的搏斗中，已是一匹疲惫得不堪驰驱的驽马，事实上他仍然精力充沛，对蒋介石忠心不改，反共之志也愈老弥坚，大有伏枥老骥之慨。这份通告使他心中闪现了一幅恢复"中国童子军"的蓝图。

童子军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儿童进行社会军事教育的产物。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军官贝登堡。贝登堡早年曾在南非活动，他训练当地儿童充当警探颇有成效。1908年，在他的倡议下创设了童子军。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武昌文华书院也成立了中国童子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利用这一组织，对儿童施行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野营等训练，以期为民国造就一代新人。1920年，在伦敦设立了童子军国际局，联络和协调各国的童子军运动。

1929年底，国民政府为了强化自己对全国儿童的影响，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总司令部，统一对全国儿童进行军事训练，并任命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颇有勋绩的何应钦为总司令。当时，何应钦正马不停蹄地为蒋介石平息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无暇履任。

1930年1月8日，何应钦顶风冒雪，亲率蒋介石的嫡系在驻马店一举打败反蒋的唐生智，迫使唐部缴械投降，接受改编。为了庆祝讨唐战役的胜利，1月10日，何应钦宣布就任中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戴上童子军的圆形礼帽，穿上为他特制的童子军制服，系上领巾，亲自对武汉地区的童子军进行训练检阅。

1934年，为适应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适逢童子军国际

---

① 何应钦：《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25周年纪念致词》，1952年2月25日。

局要求各会员国成立童子军总会，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童子军总会，由蒋介石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表示中国童子军也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当时，中国童子军总会发布命令，在全国推行童子军训练，所有初中均设童子军课，推行童子军管理。但由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童子军运动自然不可能普及开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的童子军运动借助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政府对民众进行战时组训而得以活跃，成为对儿童进行军事教育训练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实绩并不大。

中国童子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为何应钦、蒋介石增添过光彩。1942 年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特别反对蒋介石重用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低能的高级将领，与蒋介石、何应钦的矛盾已经激化。史迪威向美国陆军部状告国民党把美援物资不是用于抗战，而是准备打内战。1942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到重庆考察。蒋介石、何应钦想利用威尔基访华之机，要求撤换史迪威。何应钦除精心地导演了各种宴会、军事训练和演习、参观外，还特意把重庆的童子军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欢迎仪式的训练表演。那位沉湎于阿谀奉承和美酒佳肴中的威尔基，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参观、应酬中，看到男女童子军着装整齐，摇晃着美国和中国的国旗在他所到之处列队欢迎，并为他作了童子军操练表演后，对陪同他的何应钦竖起大拇指，连声“OK! OK”！蒋介石对何应钦利用童子军成功地充当了欢迎威尔基的道具，掩盖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现象，表示十分赞赏，偶尔还向童子军发表训词，以示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国民党日益走向独裁和反动，童子军运动也成了何应钦替蒋介石推行反共奴化教育的工具。何应钦在积极投身反共内战时，因为童子军对于挽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何应钦便不再兼顾它了。

收到童子军国际办事处的通告后，何应钦才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中国童子军总会”副会长兼总司令，这一职位，蒋介石既没有免除，也无人与他争抢。于是，他决定在台湾恢复“中国童子军”，以配合国民党总结统治失败的教训，加强对学校控制的措施。当时，台湾当局认为在大陆失败的诸多原因中，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成为反蒋民主运动的主流是一个重要原

因。蒋介石也曾痛切地指出："最重要的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此次全面失败的主因。"至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失败只是一面和一时的，唯有教育的失败则影响巨大，且非短时间所能补救"①。因此，在国民党改造运动开始之前，台湾就开始了对教育的整顿，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和对学生的军事训练管理。整顿教育，自应从儿童教育抓起。何应钦恢复童子军运动的打算，正好配合了台湾当局对教育的整顿。

何应钦请示总会长蒋介石同意，又获得台湾当局"教育部"的支持后，便以台湾当局"中国童子军总会"名义致函童子军国际办事处，说明童子军运动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委婉地申诉了与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并非由于对童子军事业的轻视，实在是因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国民党节节失利而心有余力不足所致。信中表示，他自己和总会长蒋介石都极愿在台湾重振童子军，恳求国际办事处仍承认"中国童子军"的会员资格。

童子军国际办事处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国际组织，加之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在收到何应钦的信后，便作出决定，取消暂停承认"中国童子军"会员资格的决定。何应钦既争得了台湾童子军取代"中国童子军"的名义，又使其继续作为童子军国际组织的一员，还替无所事事的自己找到了一份虽无实惠却也荣耀的差事，多少能慰藉失势后的寂寞。

（二）

1950年9月19日，何应钦在台北主持召开了台湾当局"中国童子军全国理事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使已经夭折了的童子军运动在台湾复活。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台湾尚无童子军的组织。会后才决定在全台湾成立童子军，并在11月1日召开了台湾第一次童子军大会。从此以后，台湾的童子军既是台湾的童子军，也是"中国童子军"，何应钦这20年一贯制的老司令又重现"风采"。

何应钦对事实上由他所主持的童子军在大陆时期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① 《"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年鉴》第6页、第10页，台北中正书局1957年版。

他说：“我们中国童子军，十几年来，在量的扩展和外形的讲求上都已有相当的成就。而在质的改造，亦即在实现童子军的宗旨上，则显然不够需求……而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中国童子军，是徒有其表①。”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童子军“虚有其表”倒也如实，而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童子军之“表”也没有，只好由何应钦来“重建”。

有鉴于过去的疏忽和失职，何应钦对今后如何改进台湾童子军的教育训练，设想了一些原则：（1）童子军的领导人，必须具有高尚品格；（2）童子军的团体不能过分庞大；（3）童子军教育的目的，在于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4）童子军的活动，该利用儿童的休闲时间等。为了使“中国童子军”在台湾岛上起死回生，并实现总会长蒋介石所训示的要“与世界各国的童子军并驾齐驱”的目标，何应钦对今后台湾童子军工作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童子军的名义，应力求名实相符。”因过去滥用童子军名义，“甚至世界童子军人士认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童子军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如果作遽然的变更，事实上必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目前初级中学的童子军组织和他们的童子军一般训练，都暂维现状，另在各初级中学内，设一童子军实践团。这个团的编制、训练、制服、徽章等，一定要完全依照中国童子军法规的规定，确实施行；凡没有加入这个实践团的童子军，最好不用领巾，改用领带，或领巾领带都不用，以便与真正的童子军有所区别。在这个实践团里，所有童子军，一定要依照世界童子军的标准，严格要求，务使每名童子军，在道德素养和行为上都能有充分高尚的表现才好”。

“第二，要延揽专门人才，对有关童子军教育的各种书刊，应该大量编印，一方面对社会做广大宣传，使社会人士，认识童子军教育的真义和特质，来共同协助其发展；一方面充实童子军教育的资料，提高童子军教育的水准。另一方面应该改用以品德为重的设计，培养优良的领导人才，这不妨仿效欧美各国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②。”他还具体要求仿效欧美建立“童子军教育保健营场”，用野外露营之类的实际生活以培养童子军骨干。此外，诸如尽量避免流于形式的集体宣誓；童子军运动须广泛向社会推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98页。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01~202页。

进，但又不可速成；以台湾为童子军运动的实验场，取得“经验”，待“反攻复国”之后，在大陆推而广之等，何应钦都有所筹划和建议。何应钦办事的缜密和思前想后的风格，于此又可见一斑。



1956 年 10 月 31 日，任台湾童子军总司令的何应钦
为蒋介石 70 岁生日祝寿，举行童子军露营活动

1952 年 2 月 25 日，是“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在台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会，凡建立了童子军的学校均组队参加，既庆祝童子军运动的“中兴”，也使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与“反攻大陆”、“反共抗俄”这些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能获成功的渺茫希望联系起来，并为之培养人才。他援引蒋介石 1941 年元旦在重庆检阅童子军时所说的“忠勇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作为台湾童子军的思想言行规范。他还要求台湾的童子军，对自己，努力充实知能；对社会，尽到互助合作的责任；对“国家”，发挥爱国热忱；对世界，要达成服务人类的志愿。如此，便能在家庭，做一个克家的子弟，在社会，做一个见义勇为的青年；在“国家”，做一个忠诚的“未来国民”。

1958 年，童子军国际办事处更名为国际局，由伦敦迁移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办公。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一度“中兴”之后，并未随着台湾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开始复苏而掀起高潮。只不过作为儿童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

偶尔热闹一番。

何应钦重操童子军的旧业，虽于事无补，但却有虚声可扬。每逢“中国童子军”成立的纪念日或外国童子军组织访问台湾这类场合，他便能以老司令的资格出台亮相，发表一通演说，借以证实童子军组织的存在。

从1957年开始，每隔两年就要举行一次童子军远东区的国际会议。何应钦曾先后派出台湾童子军代表团参加在菲律宾、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一至第四届远东区国际会议。1966年10月，世界童子军远东区的国际会议在台北举行，何应钦作为东道主，再次扮演了当年在重庆迷惑美国特使威尔基的角色，调动台北童子军，组成规模可观的仪仗队，表演了各种童子军的训练项目，展示了十多年他苦心经营的成就。由于何应钦的资历、声望都是别国童子军代表团团长望尘莫及的，人人都对他尊崇有加，而他更以老前辈的身份，对各国童子军运动提出一些既冠冕堂皇，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远大目标。他说：

> 我们要找出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停止人类的纷争，消弭所有存在世界上的偏见和矛盾，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友谊和博爱的世界当中。只有在我们下一代的心里，播种下仁爱的种子，这个目的才能达成，这正是我们童子军工作者在过去六十年来所做的，今后我们仍然将继续努力地做下去①。

然而，何应钦的所作所为，与他所推崇的目标相反，他把台湾童子军运动也纳入了“反共抗俄”的政治轨道，他希望别人在儿童心灵里播种仁爱，而他却在台湾儿童的心田里撒播对共产党的仇恨和疑惧。

1966年11月15日，为了贯彻远东区第五届国际会议精神，何应钦借题发挥，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大加抨击，并特别在高雄的澄清湖畔举行台湾童子军第六次全省大露营，各项活动的主题都离不开“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他企图把童子军这种西方介绍来的儿童教育训练方式尽可能台湾化和政治化。他解释这次大露营活动为什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主题时说：“文化复兴的含义，是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来加速我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11页。

们国家的现代化；是要使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也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和世界其他优秀民族共同负责，使全人类都能懂得幸福的生活和辉煌的发展。”他希望台湾童子军运动能配合台湾当局发动的针对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承担起先锋队的任务”[①]。

随着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台湾童子军参与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的喧腾也偃旗息鼓。何应钦附加给童子军运动的反共的政治动力，对一般的儿童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但台湾各地童子军集会、训练、露营一度成风，确实得何应钦倡导主持之力。有人讥讽道：“如今难统胡子兵，委屈训练童子军。”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童子军运动的思想体系和训练方式日益显得陈旧落后，加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何应钦有了更加繁巨的工作，童子军运动便不值得他再倾注大量心力了。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32页。

二、“道德重整”中的领袖梦

隔岸结反共姻缘　居后获再起希望

（一）

“机遇”这命运的精灵，在替何应钦制造不少辉煌荣耀的同时，也替他制造了许多悲剧和历史的笑柄。古代哲人老子所说的“祸福相倚”，在何应钦的一生中屡屡应验。

当何应钦注定要在台湾坐一辈子政治冷板凳的时候，幸运之神的手指又轻轻叩响了他寂寞已久的窗棂。



何应钦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起人卜克曼合影

1955 年 5 月 20 日，海外飞鸿向何应钦传来了美国“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负责人士乔的一个信息：“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约 150 人的代表团，在美国的麦金诺岛开完会以后，将应邀赴日本、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访问。这个“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对台湾

的状况极为关切，对致力于反共的何将军钦慕已久，希望他能与台湾当局联系，邀请这个代表团在访问日本之后，顺道在台湾作 4 天访问，扩大这一运动对台湾的影响。

这封信使何应钦无比激动，令他回忆起出使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时，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卜克曼举行会谈、相互投缘的那段美好回忆。

1947 年 1 月 3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上，正被联合国军如何组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弄得唇焦舌敝的何应钦，收到“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学博士佛兰克·卜克曼的邀请，赴加拿大尼亚加拉出席该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何应钦原本将此次赴会当作松弛神经的观光旅游，不料在会上却被这一组织的宗旨和纲领所打动，倾心相与了。

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个简称为“MRA”的团体，就何应钦当时的认识来说，是卜克曼这位持独身主义而又以反共为职志的先生偶然受上帝的启示而创立的。1938 年初夏，卜克曼旅居德国东部的小城福劳顿斯特时，怀抱《圣经》独自在黑松林中散步，虔诚地祈求上帝挽救人类的命运。于是上帝“显灵”，他在冥冥之中得到启示：“人类必须彻底净化个人生活，才能挽救厄运，以绝对的道德生活标准来战胜物质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①]。”1938 年 6 月 4 日，卜克曼在伦敦东区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来实践这一启示。这一运动宣称将以实现“四大目标”来免遭“赤化”厄运，以“道德”的智慧和力量，打击并摧毁唯物主义思想。它的“四大目标”就是“绝对的诚实，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就是这四个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绝对”深深地打动了何应钦的心。他大有卜克曼“先获我心”之慨，就兴之所至、慷慨激昂地在会上作了《消除误解建立信心》的演讲。他认为“MRA”的“四大目标”，“与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可以说旨趣是完全一致的……也与我们中国孔子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极其相似的。而这一切，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企图

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 1 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4 年 4 月印行。

彻底推翻的东西”[1]。他在演讲中还说：“自从上一个世纪我们开始与西方接触以来，世界上军事力量强过我们的国家，都在想攫取我们的土地及经济特权，独占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不知何应钦是基于“外交”上考虑，还是有意讨好美国，这么一个“例外”，便轻巧地把一部美国侵华史抹掉了。他还针对中共对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有力驳斥，以及当时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独裁、腐败的不满辩解道：“共产党的宣传技巧，把国民党表现成为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党。这种不合事实的宣传，使得许多人相信中国是在实行一党专政，目前的纷乱是由于国民党想要肃清共产党所致。”他还认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便足以证明“国民党把政权交还人民了”。他在演说中还鼓吹“共产党绝不是一个政党”，但“我们政府曾三番四次的邀请——不，简直是恳求——他们来参加政府，但是都没有结果”。因而，“妨碍中国民主化进展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他们自己”[2]。

何应钦对“MRA”的推崇和他坚决的反共态度，在1947年1月尼亚加拉的会议上就博得了与会反共人士的喝彩，何应钦将军的名气，也在“MRA”中鹊起。

会议结束后的1月12日，何应钦在致于右任、戴季陶、张群、居正、孙科等人的信中，还抑制不住这扬扬得意的心情。他夸耀道：“会中钦曾就我国道德及诚、正、修、齐、治、平之政治哲学，详加阐扬，闻者莫不赞美吾国道德文化之高深，极为感动[3]。”何应钦在美国时，曾收到一个名叫鲁意斯的美国人的来信及他所写的小册子。鲁意斯因倾慕卜克曼、何应钦所鼓吹的“道德重整”的威力，便引发了他的奇想，写了《战争之替代物》的小册子，并自己掏钱印刷问世。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介绍了自己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说他“主张成立国际垒球联盟，使各国人民及领袖由游戏而忘记战争，其成就当较联合国尤大”。何应钦对这位神经似乎有些不正常的垒球迷十分赏识，郑重其事地给他回信，赞扬他“关心世界和平之热忱”，并与其探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良策。

此后，何应钦在美国又参加了麦金诺岛和弗吉尼亚州举行的两次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73页、177页。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73页、177页。
③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910页。

"MRA"的国际大会，发表了崇尚道德可挽救一切和以道德反共的演讲。

1948 年 3 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回国后，便集中精力参与指挥数百万国民党军与共产党打内战，一心想用枪炮去挽回败局，暂时忘却用了"道德"的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学说，但卜克曼却始终没有忘记利用何应钦在中国推行自己的政治宗教。

退居台湾以后，何应钦又开始与"MRA"有所交往。1951 年 2 月，何应钦旅日期间，应日本"道德重整会"负责人栗山的邀请，在小田原"道德重整"中心发表了《中日道德合作》的演讲，希望与日本右翼势力在思想上进一步结盟，利用"道德"战胜共产党。1953 年夏，何应钦因治疗眼疾赴菲律宾，又应当地"道德重整"会的邀请，发表演讲。

这次土乔来信要求访台，何应钦认为既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是将代表团拉拢过来从事"反共抗俄"的"一支国际友军"的好机会，便将土乔的来函及自己的建议呈交"副总统"陈诚转蒋介石核实。蒋介石夫妇对卜克曼及其所从事的事业不甚了解，何应钦便把卜克曼创立"MRA"的经过及其宗旨详细地向蒋介石夫妇作了说明，还特别介绍了卜克曼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卜克曼中年时曾两次到中国访问，并在庐山上潜心研究过辜鸿铭翻译成英文的《大学》《中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坚信人类只要笃信上帝与孔子，就能把被共产党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被共产党赶到海岛上终日抱恨的蒋介石夫妇，听了何应钦的介绍十分高兴，认为"MRA"不仅与"反共抗俄"的目标相符，也与他们曾经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相通，表示欢迎这个访问团到台湾。

为郑重起见，蒋介石通过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致函何应钦，大意是说，"MRA"访问团访台一事，已由"行政院"出面邀请，又以为宜敦请负有国际众望且熟悉该会情形之人士负责，所以请何应钦具体筹划接待事宜。

1955 年 6 月 7 日，何应钦邀请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决定由"行政院"聘请张道藩、黄国书、陶希圣、李士英、查良钊、桑锡菁、洪兰友、沈昌焕等 24 人成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接待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下设总务、招待、节目及宣传四个组，分别准备接待事宜。

6 月 18 日，何应钦在台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以《介绍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题发表文章，说明"MRA"的宗旨与概况。他向记

者们介绍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不是一个组织，它无所谓会员，也无所谓条规，可是它能使现有的组织获得新的精神，因此，有许多人视它是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信奉四个绝对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和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四维八德，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这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战中，无疑的是民主自由国家对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种挑战"。①

6月20日，何应钦又以《在发展中的一支国际友军》为题，著文在台北各报介绍"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他要人们相信："在我们今日反共战争中，无疑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我们一支有力的国际友军②。"

6月22日，"MRA"访问团一行188人，分三批由东京抵达台北。这个访问团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国会议员、财团负责人及反共人士，还有鼓吹"道德重整运动"的歌剧《永恒之岛》的演职人员。当晚，何应钦在空军新生社设宴欢迎访问团全体成员，并请他们观看评剧。

次日，何应钦陪同蒋介石夫妇在台北宾馆接见了访问团。蒋介石在致词中谓诸位嘉宾的翩然莅临，使他深感"吾道不孤"。宋美龄笑容可掬地与访问团的头面人物一一握手，一会儿用"国语"寒暄，一会儿用英语问候，并赞扬他们都是"为上帝工作的人"，"MRA"无疑"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何应钦听后也大受感动和启发，决心在台湾致力于这项"上帝"所喜欢的运动。从6月23日至25日，"MRA"访问团的剧组，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歌剧《永恒之岛》。何应钦观看了演出后，对访问团所期许的"台湾将成为世界命运的锁钥"这句过分的吹捧之词极感兴趣，并表示他自己和台湾都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这次"MRA"访问团访台受到台湾当局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MRA"的成员。1956年5月，"MRA"的又一个访问团到台湾访问，何应钦轻车熟路，照料得十分周到。他致函卜克曼，要充分利用这两个访问团的影响，使"MRA"的斗争继续，直到胜利。

1956年7月，何应钦获台湾当局批准，率领台湾"道德重整"代表团赴瑞士柯峰参加"MRA"的国际大会，在西欧和北欧诸国游历了三个月后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109~1110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111页。

才返台。回台后，何应钦除了在台湾当局“立法院”报告他的欧游观感之外，还应《自由谈》杂志之约，发表《欧游杂记》，畅谈他对18个国家游览的观感。虽不是文人的何应钦，却以散文笔调，写出热带亚洲的风情，古都罗马的神奇，瑞士世界公园的绮丽，莱茵河流域的风光，北欧诸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花都”巴黎的繁华，马德里“法西斯的精神”，里斯本的明媚和饶有情趣的民俗，古希腊文明的辉煌以及奥斯曼王朝的故乡土耳其、西亚各国的衣食住行……读了这篇游记，谁人不羡慕何应钦所从事的“道德重整”呢？

1957年，何应钦不仅率代表团参加了在菲律宾碧瑶举行的“MRA”第一届亚洲区域会议，还应卜克曼之邀，于7月间赴美国参加麦金诺岛举行的“MRA”国际会议。既然是高规格的会议，何应钦所率领的代表团规格也相应提高。代表有唐纵、谢东闵、谢然之、查良钊、郭克悌、余梦燕、谢高屏、钱用和等人。

在这次会上，卜克曼慨然向台湾当局发出邀请，要台湾选派100名优秀青年前往麦金诺岛参加大会并接受生活训练。这100人往返的机票，均由“MRA”赠送。台湾当局遂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中挑选100人，成立“中华民国”代表团，由沈铸任团长，李焕为主任秘书，前往麦金诺岛。这一下何应钦的声势大增。

这个青年代表团结束了在麦金诺岛的训练以后，在返回台湾前，在美国各大城市演出民族歌舞及反共的歌曲，颂扬“道德重整”。此后，但凡“MRA”的国际会议或区域性会议，几乎都是何应钦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也无需任何人册封，何应钦顺理成章地成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在麦金诺岛会议厅中悬挂的“道德重整”领导人物的巨幅油画中，身着戎装的何应钦站立在第一排的左起第一位。他自己也俨然以“中国道德重整会”的旗帜而招摇于市。

（二）

由土乔所率领的“MRA”访问团在台湾所受到的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要把“MRA”推进到世界各地的卜克曼。他于1956年初到台湾访问，与何应钦畅谈了以“道德重整”来“反共抗俄”是如何重要和有效。卜克曼访台的高潮，自然是会见蒋介石夫妇。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卜克曼感

受不到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谈起“反共抗俄”，便显得情绪激昂，是一个介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捉摸不定的人物。他曾听西方人将蒋介石比作拿破仑和希特勒，但他觉得并不像。至于那位曾经使马歇尔认为是“他所遭遇的对手中”的“最有力的鼓吹者的蒋夫人”，这位持独身主义的卜克曼博士也被她的风韵才华迷住了。谈起基督教教义和中西文化，她口齿伶俐，如吐珠玑。而相形之下，何应钦则显得笨嘴拙舌、木手木脚。当他们起身闲聊、准备合影留念之时，卜克曼想起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文章中所描绘的宋美龄：“她眼睛如点漆，清澈澄明，好似夜半的池塘；她牙齿是口语建筑的视觉上的交响曲；她的手好像是在夏天微风中摆动的荷叶[①]。”她可以成为视觉观赏的艺术，但不可能成为他所标榜的“四个绝对”的实践者。相反，何应钦的严谨沉稳，才是卜克曼所欣赏的。台湾的“道德重整”要发展，并不能依靠当权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只能靠自己的好朋友何应钦。

蒋介石对卜克曼的赏识，利用和应付的成分要大于依靠和信任。但不善于演戏的何应钦误以为蒋介石对“MRA”会高度重视，为他推进这一事业提供人力、物力和资金的保证。在送走了卜克曼之后，何应钦乘兴建议蒋介石在台北建立“道德重整”中心。无奈蒋虽欣赏“MRA”的反共宗旨，可引为奥援，但深知要反对气势磅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非那对玩政治的人来说不屑一顾的“道德”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蒋介石对何应钦政治上的执著但缺乏敏感早已领教，趁机教训他，要实现“反共抗俄”目标，主要靠积累起足够强大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综合国力”，“道德”方面的反共宣传，虽不可或缺，终究是“偏师”而非主力。为了不扫何应钦的兴，蒋介石勉强同意由何应钦牵头成立一民间性质的台湾“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让何应钦当会长。

联谊会虽然立起了门户，但在经费上得不到官方的保证，主要靠向各有关人士化缘来维持开支，但它毕竟成了何应钦从事反共活动和社会交往、国际交往的一块领地。从1956年至1961年间，何应钦先后10次组织台湾的“道德重整”人士，到瑞士、菲律宾、美国、日本、挪威、丹麦、联邦德国等国，出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道德重整”会议，除了共同宣扬

① 杰克·贝尔登：《蒋介石的性格》，台湾《自由时代系列丛书》第4号。

反共的意识形态之外，还帮助台湾推进所谓的“国民外交”工作。对于“MRA”，何应钦身心都十分投入，但台湾当局对之仍不愿升温，在经费上也十分悭吝，到海外赴会时，每月每人只给15～30美元的生活补助，其余开支，主要仰给于卜克曼的资助和在台湾巨富中寻救赞助。所幸的是卜克曼对何应钦的处境十分同情，既引以为知己和战友，为了“上帝”，他特别慷慨大方。

频繁的出访，使何应钦广泛接触了东西方沉溺于反共的“MRA”的各类人物，对“MRA”这一介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运动的理论、实践有了较深的领悟，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状况增长了见识，减少了他思想上许多陈旧落后的观念，触类旁通，使他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提出不少切合时宜或者超前意识的建议。

政治上失意、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能巧妙地将他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狂热的反共政治信仰和脱俗般的个人生活作风上的相对清廉俭朴融会贯通，而且迎合了台湾当局不断变换口号的反共政治需要。这种主观精神追求与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此吻合，个人所崇奉的生活道德向社会政治道德的转换，使曾经一度黯然了的何应钦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世界反共营垒中重新折射出一抹微光。这种客观情势将何应钦托上了虎背，主宰了他的思维走向。昔日曾指挥调动千军万马“剿共”而屡战屡败的何应钦，今日手中虽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但却不无真诚地操起“道德重整”的精神武器，幻想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军事政治之外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与中共和国际共运再作一次殊死的较量。

请上帝反共　抬孔子助威

（一）

1958年6月4日，适逢卜克曼80岁诞辰，又是他创立“MRA”20周年，何应钦和世界上35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人士约1000人络绎不绝地飞往“MRA”在美国的活动基地麦金诺岛，向这位反共“上帝”的化身祝寿，并交流各自国家和地区“道德重整”的心得体会。许多敌视和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元首还致电祝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报刊、电台亦刊载或广播卜克曼的事迹和介绍"MRA"的情况，掀起一股弥漫全球的反共逆流。卷入这一热浪中的何应钦，自然对卜克曼本人和"MRA"有了更多理性的认识。偶然得知1922年卜克曼在广州，曾见过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十分推崇，认为他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使何应钦如获至宝，由此而发掘出"MRA"与他所献身的"国民革命"的历史渊源。而卜克曼创立"MRA"之前又到庐山避暑，并有机会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为他创立"MRA"打下了一定基础，体会到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上帝所倡导的东西，实在有许多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一直没人对之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卜克曼认为这是他心中的一大憾事。从这些交谈中，何应钦受到了启示，决心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嫁接中国传统文化于"MRA"之中的使命。

何应钦所接触到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会的负责人中，经他统计，出生或生长在中国的，竟有20人以上，与中国有一定血缘关系或曾经学习过中国文化的，那自然就更多了。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流传着"MRA"所标榜的"四个绝对"的因果？在何应钦看来，自然是前世注定的因果，所以他犹如修行者顿悟得出这样的结论："MRA"所提倡的"四个绝对"与"实践方法"，"与我们固有的道德精神一相比较，毫无疑义，我们更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道德标准与实践方法，和我们古圣先贤所讲人生哲学的道理，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如果说，卜克曼博士之所以倡导这个运动，是受了中国固有道德精神的影响极大；甚或就说这个运动的一切主张与实践方法，大部分是以中国文化为其渊源；我想这种说法是并不为过的。[①]"当时，何应钦这种不避"掠人之美"嫌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豪的观念，对风靡台湾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思潮，倒有一定意义的匡正。当然，何应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又是一种适用主义的、非理性的全盘肯定。

他为了实现其反共的政治理想及全盘恢复封建的固有道德，让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与基督耶稣攀亲结缘，甚至合而为一，着实下过一番工夫，且有了略具雏形的"理论"。大半生戎马颠沛的何应钦，能在做

---

① 何应钦：《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1958年10月5日在台湾人生哲学研究会上的讲话。

学问的冷板凳上磨炼自己的心性，并有所领悟，发为宏论，实在难为了他。他的研究成果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一次关于“四项道德标准”的演讲中。

何应钦认为，所谓“诚实”，在一般欧美人士来说，自然是不欺骗他人，不妄求作证。我国古圣先贤对于“诚”字，原有一套极深的道理。《大学》上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是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种“慎独”的功夫正是绝对诚实的境地。他认为要学到“诚”字是十分难得的。宋朝的刘安世跟司马温公学习了整整七个年头，可谓学富五车，不过只学到一个“诚”字。温公教他“诚”字的着手方法，要从“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也正是“绝对诚实”的功夫。于此可见，卜克曼所说的“绝对诚实”，和我国古圣先贤所谓“诚”，是完全一致的了。刘安世力行七年，才做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何应钦说，“纯洁”两个字，在外国人看来，虽然大多是指夫妇的关系而言，有时候也包括廉洁的意思，这也许在我们看来，似乎比较狭隘，其实这和我们古圣先贤所讲的“敬”字，可以说意义是一样的。他援引程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熹的“主一只是心专一，不以他念动之”，若动时，收敛心神，在一事上不胡思乱想，便是主一。这“不胡思乱想”，正是“绝对纯洁”的主要功夫。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不胡思乱想”的地步，那就男女关系而言，自然不会有不纯洁的思想；就金钱关系而言，也自然不会有不廉洁的打算了。

在何应钦看来，“无私”两个字，在东西方人生哲学思想上，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宇宙原来是大公无私的。所以我国古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正是大公无私的自然表现。《礼运·大同》篇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绝对的无私”。可见“公”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他认为“MRA”的“四项道德标准”完全实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了宣传他的这一观点，他还将林语堂翻译的《礼运·大同》篇的原文，印刷以后分赠给外国“MRA”的信仰者，颇获得他们的同感。

对于“仁爱”二字，何应钦认为中国古代的墨家讲兼爱，儒家讲推爱，耶稣讲博爱。说法虽各有不同，都是以“爱人”为主旨，而尤以儒家推己及人的爱，以一个“仁”字为出发点，为我们所推崇。这种推爱的主张，推而至其极点，则正如朱熹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

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正是仁爱的极致。何应钦肯定“MRA”所主张的“绝对的仁爱”，与儒家推爱的主张，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上述关于阐释“仁爱”的观点，虽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惯性思维作怪，使他作了自我否定，把信仰与他不同的人当做仇人。何应钦说：“今日共产主义者所以把这个运动看作他们思想上的敌人，正因为这个运动仁爱的精神，克服了他们资以煽动阶级仇恨，也冲淡了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不平之感，从根本上消灭了共产主义产生的社会因素[①]。”何应钦还为卜克曼把“四项道德标准”都冠以“绝对的”这种形而上学和不切实际的说法加以辩解，认为这只不过是卜克曼要求人们对此应该做到最高的境界，绝不可以小得而自满。

对于卜克曼所主张的“实践方法”，何应钦也有相当的体认，并把它“中国化”。

他认为卜克曼主张“静思反省”。参加这一运动的每个人在每天清晨，要有一段静思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人要做反省的功夫，接受上帝的启示。这所谓上帝的启示，其实就是反省的心得，因为要从自己的心灵上反省得来，所以他们认为是上帝的启示。做这种解释的何应钦被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他心目中，并不承认有上帝。或者说，此刻的他，又受了“我即佛，佛即我”的佛家思想的影响。何应钦规定了反省的依据，就是四项“绝对的道德标准”；反省的结果，要写在一本小册子上，他们叫做启示录，即以此为自己一切新生改造的依据。他认为，我国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反省的标准与“启示录”虽不同，而反省的办法则是完全一样的。何应钦还说他与蒋介石几十年来，都采取这种自省的办法，获益匪浅。

卜克曼主张“公开道歉”。每日反省的心得，可以在自由、公开的原则下，与别人交换上帝的启示。如果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自己觉得有抱歉或错误的地方，最好的改正方法，就是向这个人公开道歉，或对这件事公开认错。此种方法，何应钦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如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即一例。他还认为对别人可以“隐恶扬善”，而对自己则应该做到“不矜善，不蔽过”。由此可见，如果走出反共的死胡同，何应钦的待人处事之道，无论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还是用现代的公共关系标准，都有某些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357页。

可取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涵养了如此的待人处事之道，才在国民党内极其复杂的宦海政潮中免于灭顶之灾。

何应钦认为卜克曼主张“一切从自己做起”，是最现实的实现“四个绝对”的起点。他说：“假如各个人都要先看别人革新，似是各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手起。假若你想为今日的世界求得解决的办法，最好的发动地位，就是你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认为这与中国古今一以贯之的修齐治平的道理，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完全一样。

为了宣传“MRA”提倡的“一切从自己做起”的主张，何应钦还写了一首《指头歌》，在麦金诺岛上录了音，带回台湾，让“道德重整”联谊会的人们唱。歌词中有“一个指头朝着人，三个指头朝自己”，其意大约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

（二）

何应钦以为“MRA”的各项重要主张，大部分渊源于中国文化。当然，他也承认“MRA”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毕竟有若干不同的地方，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第一，他们重视宗教的信仰，并且以宗教的精神来推动这个运动。不过他们的宗教观念，与一般所谓宗教不同，他们不重视宗教仪式，而只有一个中心信仰，那就是上帝。他们认为你只要相信上帝，那上帝便会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所谓上帝……就是我们所谓‘天’。第二，他们重视力行的精神，不讲空洞的理论。”何应钦认为西方的“道德重整”者并不注重去探究“四项绝对的道德标准”究竟包含些什么高深理论，而注重实践经验的传播。在这里，何应钦又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种“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术，希望人们对“MRA”的信条不必怀疑，只需照着去做。他还以西方的“道德重整”者们如何反共为例，提倡“做就是一切”。他说：“即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而论，他们并不重视他们自己有一个比共产主义更高超的意识形态，最主要的，还在他们有比共产主义者更苦干的实践精神。因此，他们在世界上，训练有数以万计的‘反共’斗士，在他们中间，很多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摒弃了夫妇关系，而献身为这个运动奋斗[1]。”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359页。

面对台湾当局“反共抗俄”的政治目标，何应钦不可能成为理论家，他只能去干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面对台湾“国民”道德衰退的现实，何应钦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匡世救时的理论体系，所以他只能倡导去力行古圣先贤早已规定了的道德规范。如果说何应钦从事“MRA”几十年有什么“理论”建树的话，那就是他把“MRA”的“四项道德标准”和“实践精神”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和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之中。

自幼便深受孔孟思想影响的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似乎忽略了可以取代一切、摧毁一切、建设一切的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而是在反共失败、政治上遭受冷遇之后，痛定思痛，通过“道德重整”而发现了孔孟思想与反共事业之间的关系。他曾写有一篇《一人公平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文章，系统阐述他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早在两千多年孔子就已提出，而历朝历代古圣先贤所为之奋斗的大同世界的崇高政治理想。他认为今后世界纷乱的根源，是“民主政治的思想”与“集权统治思想”的对立。而要解决中国和世界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所有的人都致力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

由于何应钦的大力鼓吹和身体力行，更主要是“MRA”的宗旨是利用“上帝”和“道德”的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经过何应钦的诠释、嫁接、改造后，与中国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了几乎一致的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道德重整”也配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提倡孔孟学说，支持成立孔孟学会，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各种主张，因而得到台湾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

上将周游列国　《龙》剧流毒欧美

（一）

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年代，当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何应钦为配

合台湾当局发动的“反攻复国”的政治攻势，把“道德重整”活动搞得异常活跃，出现了他和台湾当局都自以为辉煌的经历。

1960 年 8 月，“MRA”在瑞士柯峰总部召开大会。“MRA”的总部是一座绿荫环绕的典雅而庄重的建筑群。主体是带尖顶的五层楼房，会议厅为半圆形，突出于主楼之外，连同周围的花园、草坪和附属建筑，足可供上千人起居游乐。

何应钦每到这个总部，就如同得到上帝的荫庇，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充分体现。他和卜克曼像亲兄弟一般商讨如何把“MRA”向全球扩展。

1960 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探索的困难时期，但为了援助非洲等国家，仍派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疗队前往受援国家。卜克曼深恐非洲被“赤化”，想出了“以华制华”的妙计，建议何应钦在台湾选派 500 名“优秀”青年，到柯峰总部接受思想和生活训练，然后派往非洲从事“道德重整”工作，以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的影响，所需费用，全部由卜克曼承担。

会议结束后，何应钦立即返台向“行政院”作了详细汇报，并动员“道德重整”联谊会的同仁向各方游说，希望能实现卜克曼的计划。台湾当局对以“道德”力量反共所抱的希望原本就不大，而许多有识的青年对放弃自己的学业或去非洲工作并不感兴趣。何应钦多方疏通，大力鼓吹，终因 500 人的选拔不易而使计划搁浅。为了履行自己对卜克曼的承诺，何应钦几经周折，只选派了滕永康、邱创寿两人为代表，先期到柯峰考察联系，再考虑下一步。

滕、邱两人抵达柯峰后，卜克曼亲自接见。听了两人的汇报后，仍寄希望于何应钦努力争取台湾当局的支持，完成选派青年到柯峰受训的计划。当时，即使台湾当局全力支持，选派这么多青年的计划委实也难以完成。何应钦多次通过函电向卜克曼申述自己的困难。结果是双方达成妥协，卜克曼同意台湾选派受训的青年不再派往非洲，只需留在“MRA”总部效命；何应钦经过努力，也只选派了 50 名台湾青年组团到柯峰参加活动。

1961 年夏天的柯峰，聚集在那里从事“道德重整”的各国和各地区的老少男女的热情，远比盛夏的温度更高，“MRA”总部内外，充满了一片“反共”的喧嚣。电影、戏剧、歌曲等艺术形式，都变成了“MRA”“反

共”的武器。台湾派出了以何应钦为首席代表，董显光为代表，胡轨为代表兼团长的“道德重整”代表团。何应钦一行50余人抵达柯峰后，立即被那里升腾弥漫的反共声浪所感染。在反共戏剧大汇演中，何应钦等人观看了南美的《鹰》剧、日本的《虎》剧、印度的《象》剧以后，既有愧疚又受启发，但还拿不定主意以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共意志和经验。短短几天中，何应钦会见了除卜克曼本人之外的各国在柯峰的“MRA”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卜克曼的秘书、麦金诺大学教务长、英国牛津大学神学博士毛瑞斯·马丁；“MRA”的策划者兼经济资助者、荷兰电器巨头菲利浦的女婿、加拿大的外科医生保罗·甘拜尔；美国“道德重整”青年合唱团团长布兰敦·白克；麦金诺大学校长、美国科学家道格拉斯·康乃尔；印度圣雄甘地之孙瑞基谟罕·甘地及日本“道德重整”会负责人涩泽雅英等，何应钦的反共经历之长，反共经验之丰富，令那些人“肃然起敬”。

（二）

何应钦在柯峰观看了别人的演出后，从《鹰》、《虎》、《象》的寓意中受到启示，认为龙的形象和寓意正好代表中国，何不编演一出《龙》剧，加入这反共戏剧的大汇演中？他找自己的副手董显光商量，董立即表示赞同。董显光被台湾称为蒋介石的喉舌，他曾担任过台湾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文采韬光远在何应钦之上。于是，何应钦、董显光、胡轨、王素珍等人凑在一起，共同构思，最后推定由应酬较少而又有编剧特长的王素珍执笔，完成使何应钦扬名一时的《龙》剧初稿。何应钦聘请加拿大籍的雷诺担任导演。雷诺阅读剧本后，又根据西方人对于话剧的欣赏习惯，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定型成两幕十场的剧本。在创作和修改剧本期间，董显光一显身手，边翻译成英文，边缮写、打印，使中、英文本同时出来，定稿后，为适应到各国作巡回演出，董又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本翻译打印出来，使《龙》剧可以在通行上述语种的地区演出。

这部由何应钦主持编演的《龙》剧，采用了全面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恣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进行诬蔑，达到诋毁新中国、吹捧台湾当局自欺欺人的目的。《龙》剧显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它的政治价值和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却超出了何应钦的预期。据说自国民党

退守台湾以来，当局曾想方设法“丑化共产党”，但宣传效果均大不满意。在台湾当局看来，“《龙》剧承担了这个工作，同时《龙》剧也为观众指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改变腐败和没有目的生活，是击败共产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①]。

《龙》剧的剧情梗概是这样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王强的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感到精神苦闷，虽有建设中国的一腔热忱，却不知从何处着手，于是由于“幼稚盲从”、“不满社会现状”、“迷惑于共产主义可以拯救国家”，遂被“诱惑”参加了共产党，参与了推翻国民党统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王强亲自清算其祖父，祖父被枪毙，祖母被扫地出门，不久也就死去”。其后，直至“人民公社”运动，王强都积极参加。最后，王强因“彻底觉悟，冒死逃到台湾，决心以道德为武器，从自己做起，净化个人和家庭生活，负起改变社会挽救国家的责任”。这出话剧颠倒黑白，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黑暗腐败的统治和一败涂地的真相完全掩盖了，并把大陆“人民公社”等“左”的失误无限夸大、借题发挥，肆意诬蔑。这出剧据说“完全达到了何将军的愿望，把中国人和共产党作战的惨痛经验，实实在在地搬上舞台”，因而引起了“MRA”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排练，《龙》剧于 1961 的 8 月 7 日在柯峰“MRA”总部举行首演式，引起在场 800 多“道德重整”人士的喝彩。卜克曼的副手彼得·霍华德亲自到后台祝贺，并兴奋地说：“这样的戏剧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上演!”

《龙》剧的首演，仿佛是卜克曼和他所从事的“MRA”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这位反共“上帝”的宠儿的绝妙讽刺。演出的次日，“MRA”总部便宣布，83 岁的卜克曼死去了。这位面对十字架就会说“我信仰你，永不后退”的“勇士”，这位借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散布仇恨的反共狂人，这位经常对人叨念“耶稣为我舍了生命，我能为他做些什么”的神学家，临终时却悲观地留下遗言：“为什么不让上帝领导的人来治理世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硬塞进反对共产主义的私货，把耶稣也乔装打扮成反共旗手的卜克曼先生逝世的地点，正巧是他获得“上帝”启示、创立“道德重整”运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4 年印行，第 16 页。

动的德国黑松林的福劳顿斯特。何应钦将这一惊人的巧合解释为卜克曼为“上帝”建立了殊勋，如今是蒙主恩召，去天堂与“上帝”长相厮守了。

卜克曼的逝世，打乱了何应钦的计划。他原拟待《龙》剧演出后，便返回台湾。家中有病妻需要照料，蒋介石在积极准备窜犯大陆，必定会有许多战略问题需要他顾问。但卜克曼的突然死去，对他是一种损失，也蒙眬地闪烁着希望。他从卜克曼的临终遗言中又得到某种启示，决心要充当那“上帝领导的人”。他取消了回台计划，并获台湾当局的恩准，与董显光、查良钊随同各国代表130余人去福劳顿斯特吊唁卜克曼，并伴送卜克曼的灵柩回美国。蒋介石夫妇和张群都与卜克曼有交往，视他为殊途同归的反共政治家，惊悉卜克曼逝世，都致电“MRA”总部，深表哀悼。何应钦赶到福劳顿斯特卜克曼生前居住的房里时，见那里陈列出的遗物，只是一把手杖、一双旧皮鞋、一本圣经、一件破毛衣，以显示这位“现代政治家”和“上帝”的宠儿克己厚人的“风范”。为了表示对卜克曼的缅怀之情和哀悼之思，何应钦写作了一首《卜克曼博士纪念歌》，请董显光译成英文发表。原歌词为：

> 卜克曼博士！卜克曼博士！先知先觉。卜克曼博士，重整道德，天下风从；诚实纯洁，无私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大同！你是中国的友人，你是人类的救星；你给世界唯一答案，你给人类希望光明；继续努力，团结精诚！重整世界，改变人生，把神的使命完成①！

与其说何应钦对“道德重整”有虔诚的信仰，不如说他是对卜克曼选择用意识形态的手段反共的钦佩。因为“道德重整”的信徒们，永远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胜利者”，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构筑作战的战场，那胜利的场面也可以在脑海中虚拟，不会像何应钦当年在大陆反共那样，因一败涂地而几乎选择自杀。或者说，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已经饱尝了失败的痛苦，如今想从这灵与肉的折磨中解脱出来，所以迷恋“道德重整”，就像吸毒者得到了麻醉的刺激，陷入一种半神半仙半人半鬼的迷幻境界。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203页。

在参加卜克曼的葬礼时，何应钦的追思礼拜致词，充分反映了他对卜克曼和“MRA”的痴迷，对自己多年反共失败的痛悔。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爱伦城的教堂中，幽暗的烛光摇曳着忧伤，何应钦像那证道的牧师一般庄重，以他浓重的贵州乡音低声地念道：

> 过去，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曾经实行道德重整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沦于中共之手的。我是一名军人，我相信只靠战争是不能解决世界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一个超越的意识形态中，找出一个答案。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卜克曼博士40余年来，已经把它带给世界各国人们的道德重整运动。基于卜克曼博士的邀请，我已经带领50位中国青年男女到瑞士柯峰参加意识形态的训练，同时决心和各位并肩作战，我坚决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①]。

在美国逗留期间，何应钦拜会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詹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对作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并不陌生，会见时彼此畅谈甚欢。何应钦向艾森豪威尔和詹森介绍了卜克曼及他所创立的“MRA”的情况，使对方也有了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艾森豪威尔对何应钦说，他过去认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不过是一个和平团体，现在才知道是一种最反共的思想形态，他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何应钦简直受宠若惊，乘兴又发表了当前应如何反共的高论。当他说到反共必须“手中要有枪，胸中要有思想，心中要有答案”时[②]，詹森以为是“至理名言”，赶紧叮嘱他的秘书把这句话认真记录在案，以便日后资政。何应钦简直以为自己成了超度众生的上帝，得意之至，难以言状。

(三)

何应钦回到瑞士柯峰后，为《龙》剧赴各国演出的募捐也有了结果，一瑞士富翁捐赠了25万瑞士法郎，香港前圣保罗学校校长胡素贞捐赠4.5万美元，意大利菲利浦电器制造公司老板菲利浦之子又为《龙》剧拍成纪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204页。

② 何应钦：《龙剧的成就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新发展》，1962年2月16日在台湾“监察院”的讲话。

录片提供全部制作费用，使得《龙》剧可以喧腾一时。

有了这笔资金作后盾，何应钦俨然以卜克曼的继承者自居，率领着包括《龙》剧组在内的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人，组成了"MRA"的"国际部队"，开始作巡回演出。

每到一地，何应钦都身着四星上将的戎装，走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下，充当这支"国际部队"司令官。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举着34个国家旗帜的国旗队，其后便是由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中选出来的《龙》剧剧组人员。他们全都是台湾显要人士的子女，用何应钦的话来说，是一伙一贯"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们"。剧组之后，便是充当保镖的各国的"道德重整"的信徒们。这支队伍选择通衢闹市游行一番，散发传单，招徕人群，宣扬以"道德重整"来反对共产主义，向围观的人群分发《龙》剧的入场券。不过，大多数围观者是看热闹，而前往观看《龙》剧演出的人，则是被当地"道德重整"的人士免费送票请来的。这些人或出于拥护反共，或出于礼貌和盛情难却，或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试想一下，当人们知道那走在"国际部队"前面的，就是那位曾经指挥过800万国民党军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退守孤岛的何应钦将军，如今竟要凭几十面旗帜、一个话剧、两三百号人"反攻"大陆，进而在世界上消灭共产主义，谁人不想一睹其"风采"？况且，西方人是极富好奇心和幽默感的，即便只是为了何应钦那堂吉诃德式的勇敢精神和骑士风度，也会报之以掌声和喝彩的。《龙》剧所表现的故事姑且无论真假，但毕竟是那块充满神秘色彩令西方人向往的东方古国的故事。

何应钦说：

> 每次龙剧演出的时候，都由我首先代表30几个国家的朋友，向观众作一个介绍，大意说明：今天整个世界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赫鲁晓夫扬言其在1980年即可完成赤化世界的计划，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主义利用人性的弱点，以地位、酒色、金钱，来诱惑道德沦丧的人，而加以控制，以遂其渗透颠覆的阴谋……最后，我在介绍中共在大陆的暴政后，并特别介绍台湾虽只有1100万人口，60万精锐军队，但我们有……1500万华侨和大陆上99%的人

民内心拥护我们，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思想形态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①。

何应钦讲完话之后，演出《龙》剧。演出结束后，何应钦更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请来自各地的“道德重整”骨干登台，诉说自己个人或自己国家反共的经历或认识。

《龙》剧演出的第一站是瑞士的工业城市鲁森，只能容纳2000余观众的昆珊斯剧院显然满足不了众多好奇者观剧的欲望。况且，一向中立的自由空气使瑞士人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对立，既然有戏白看，何不前往消闲作乐？《龙》剧连续三场都爆满，只好移到体育馆内演出，但体育馆也只能容纳6000观众，依然有许多人看不到演出。最后搬到可容纳2万余人的露天足球场去演出。

对瑞士政府允许《龙》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公开造谣、诬蔑，中国政府曾向瑞士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但瑞士当局以瑞士是“民主自由”国家为由，继续让其在圣·加仑市演出。

10月中旬，欧洲的初冬已经来临。《龙》剧剧组的演职人员随身携带的衣服是准备前往非洲时穿戴的单衣，早晚冻得发抖。所幸圣·加仑市“道德重整”人士慷慨相助，指定一家百货公司，让剧组的人员自己去挑选御寒的冬装。何应钦和剧组人员的帽子、大衣、毛衣、内衣、厚袜子、手套、围巾等都是免费得来的。随后剧组前往联邦德国的福劳顿斯特、道特蒙演出。

《龙》剧在道特蒙演出，伦敦的“道德重整”会正筹备演出《梯子》一剧，听说何应钦主持《龙》剧的演出颇为成功，更想借重何应钦个人的名望，使观看《梯子》的观众能看到这位来自台湾的大人物，便盛情邀请何应钦赴伦敦主持首演式。何应钦正为自己作为贵宾前往伦敦而喜不自胜，岂料英国外交部要审查他的讲话稿，要求删改掉那些露骨的、歪曲事实的话，否则不准其入境。何不得已，只好按英国外交部的要求删改。而他的入境签证手续，是下了飞机后在伦敦机场才办妥的。何应钦并没有意识到，反共的“上帝”虽然欢迎他，但并不是所有信奉上帝的人都喜欢他。

---

① 何应钦：《龙剧的成就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新发展》。



何应钦出访欧洲

何应钦率领“国际部队”到达瑞典时，由于瑞典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提前做了宣传，何应钦的到来就缺少了在瑞士时的轰动。尽管瑞典的“道德重整”组织在一个月前就大张旗鼓地为《龙》剧作广泛宣传，报纸还以《龙》剧为题发表社论：说什么台湾的“黄龙”，“表现中国的正统文化，因为黄色代表了正义、真理、和平和安详”，而大陆所惯用的红色，“却是流血、残暴和饥饿的象征，瑞典应该欢迎龙剧来访问”①。如此的宣传，并没有招徕多少观众。《龙》剧演出在即，但许多票还分送不出去。何应钦只得动员他手下二三百号人，三五人一组，带着他的讲演文稿、《龙》剧的说明书和戏票，顶风冒雪，挨家挨户地劝说人们来看他们的演出。据何应钦说，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先后往 1.8 万个家庭送了戏票，加上瑞典“道德重整”的协助，总算完成了演出的日程。

何应钦怎么也预料不到，他的北欧之行会每况愈下。

在挪威演出第一场时，当地一些青年向台上和观众席中扔小白鼠，一时秩序混乱，演出受到影响，使何应钦大为扫兴。以后演出时，何应钦便动用了他的“国际部队”的人充当保镖，在每个进出口和舞台前后都布置

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 25 页。

人站岗，第二场总算平安演完。不料，第三天演出时，幕刚开启，还没容何应钦登台讲话，台下便响起了一片《国际歌》声。何应钦见状十分心虚，不敢上台致介绍词，只好请本是国民党军上校的周中勋改穿西服替他上台作剧情介绍。何应钦躲在后台不敢露面，还找了"国际部队"中几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在远近侍卫。当《龙》剧演至何应钦认为观众应该感动甚至哭泣时，台下的观众席上竟然响起一片口哨声、踏脚声、喝倒彩声。继而，台下秩序大乱，演出被迫停止。当地的"道德重整"人士更紧张得要命，赶忙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疏散观众。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演出时，正好是1962年的元旦。演出刚至一半，忽然台下喧声四起，秩序大乱。舞台周围的保镖与起身抗议的观众发生冲突。"接着叫喊声、踏脚声，完全遮盖了台词的声音，同时传单纷飞，上面画着两根长骨头和一个骷髅头，标题是：'道德重整滚出丹麦去！道德重整是纳粹死灰复燃！'楼上栏杆上，也挂出了大幅的白布标语，上面写着：'何应钦是中国的艾克曼！''何应钦是杀人凶手[①]'！"在丹麦的第三场演出，情况更令何应钦沮丧。事前，在舞台附近及所有的出入口，都由丹麦的"道德重整"会派出了身强力壮的人把守。但演出时舞台上仍遭到臭气弹的袭击，一片乌烟瘴气，以示《龙》剧臭不可闻。事后，何应钦把丹麦观众的这些自发性抗议，说成是北欧共产党有组织的活动，他担心还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未待预定的演出计划完成，就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连夜收拾行装，天不亮就赶火车离开丹麦到达联邦德国。

在联邦德国访问演出期间，何应钦享受到"国宾"的待遇。联邦德国国防部为何应钦举行了鸣礼炮、升"国旗"、"奏国歌"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欢迎仪式。《龙》剧在波恩等地演出的间隙，何应钦会见了联邦德国三军总司令福奇上将。更令何应钦感到荣耀的是联邦德国总理欧哈德接见了他，与他共同商讨当前反共情势及该国与台湾的关系。

何应钦一行在欧洲出尽了风头也出尽了丑。为了给何应钦等人打气，蒋介石、宋美龄特函电慰勉，台湾当局"国民大会"致电祝贺，"立法院"则由"立法委员"陶锭、邓公玄、谢澄宇、刘健群等190人联名致函表示敬意。自到台湾以后，何应钦是第一次获得这么多当权者的这么高的赞誉。

---

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43页。艾克曼是德国纳粹头目，曾杀死犹太人达数十万。

《龙》剧结束了在联邦德国的演出后，返回瑞士柯峰，与日本赴美洲演出的《虎》剧组汇合。何应钦则趁此空隙返回台湾汇报，并寻求接替《龙》剧剧组的人员。



何应钦接受西德记者布瑞采访

1962年2月8日，离开台湾达半年之久的何应钦“载誉”回到台北。蒋介石夫妇在台湾当局“总统府”宴请这位劳苦功高的老将。何应钦专拣好听的向蒋汇报；而蒋对何的努力慰勉有加。在返台期间，何应钦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过，他曾先后在台湾当局“监察院”、“国民代表”联谊会、中国国民党产业党部、“立法院外交内政委员会”、台北工业专科学校、“考试院”、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内政部”及“总统府”等地举行报告演讲会，报告《龙》剧演出的情况以及他与各国“道德重整”领导人交流的反共心得。一时间，台湾上下“掀起了对《龙》剧向往的热潮”[1]，何应钦似乎在国民党内又再现了昔日的“辉煌”。

3月31日，在美国“道德重整”会的函电交催之下，何应钦偕同夫人飞抵洛杉矶，《龙》剧剧组也到达该市进行演出。4月2日首场演出结束后，美国“道德重整”组织负责人彼得·霍德华为了赞扬何应钦，也为了标榜自

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52页。

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推崇何将军对中国的贡献，可和美国的华盛顿相比”[1]。

4月14日，是何应钦夫妇结婚45周年纪念日。各国“道德重整”人士早有准备，要为“MRA”的这两位“家长”举行庆贺。在晚会上，何夫人王文湘异常活跃，与《龙》剧剧组成员和各国“道德重整”人士娓娓闲话当年与何应钦相识的经过，他们数十年如何共同患难、相敬相爱的情况。尤其是说到她与何应钦如何笃信基督，在台湾时，每星期四都要查经礼拜，十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更使与会诸人心中感佩。之后，何应钦又率领他的《龙》剧在美国巡回演出，直至6月底。



1961年，何应钦率台湾《龙》剧在欧洲巡演，
并亲自上台参与演出的剧照。

从1961年8月至1962年6月底的近一年时间里，何应钦率领《龙》剧剧组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联邦德国和美国演出185场。据何应钦统计，直接观众约35万人，电视观众在2000万人以上，他们所散发的传单有700万份，真可谓“勋绩崇隆”。

何应钦如此执著于《龙》剧的演出，除了他坚定不移地反共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外在的有为与内心的无为。何应钦训斥张群女婿的故事可作一注释：张群的一个女婿，20世纪60年代曾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此

①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55页。

公皈依基督甚笃，在任所早间上班前，定要全体工作人员做礼拜祷告。此事被一些知情者传为笑话。何应钦在台湾演《龙》剧时，此公也前往观看。事后对《龙》剧大加称赞。何应钦便训诫道：“游戏人生，何必认真!”此话一语双关，听者当然心领神会。



1962 年，何应钦夫妇与于右任在台北观看《龙》剧汇报演出。

“MRA”门庭冷落　“文化复兴”旧调新弹

(一)

蒋介石对何应钦是既用又疑，有放有收，总不让他的才干和忠诚得以发挥到极致。这也是蒋介石的用人驭势之术。

正当何应钦在美国处处受到礼遇，俨然是台湾官方的代表，又是参观海军基地、火箭基地，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宴会之时，蒋介石将他召回台湾。

按原定计划，《龙》剧将继续作环球演出，而且由“MRA”总部出资 50 万美元拍成电影。何应钦被召回台湾，《龙》剧剧组便滞留美国麦金诺岛休整。当初，台湾当局在“青年救国团”中挑选 50 人随何应钦赴柯峰时，真是百里挑一，选中者备感荣耀，于是不顾学业和工作，跟着何应钦

作反共工具。天长日久，《龙》剧剧组内部也日渐不稳，不少青年对《龙》剧浓得不能再浓的政治色彩和极尽歪曲诬蔑的情节也腻烦了，有的想回台湾继续学业或重操旧业，有的干脆想留在美国，谋职或深造。何应钦本想返台后，重新组织一批新人，取代《龙》剧剧组，但台湾的男性青年按规定都应服兵役，如此长期在外，似有逃避兵役之嫌，怎肯再派人出去。何应钦无法再维持《龙》剧的演出了。

在卜克曼逝世后，彼得·霍德华事实上成了“MRA”领袖。他原先以为何应钦和剧组的全体成员，都是受了“上帝”的感召，志愿为“道德重整”献身，殊不知他们全都奉命于台湾当局，带有“官派”性质，大为不解。何应钦返回台北不久，《龙》剧剧组便奉命集体返台，这更使“MRA”总部诧异，并为他们花费在《龙》剧上的大笔美元感到吃亏上当。何应钦虽一再解释所谓“受命于政府”是“误会”，但怎能让“MRA”总部相信呢。

1963 年 4 月，“MRA”在日本小田原召开国际会议，霍德华仍邀请何应钦和《龙》剧与会，然而台湾当局却没让何应钦去，而是派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率领台湾代表团与会，似乎这民间的“道德重整”也不让何应钦专美。

1963 年 5 月 20 日，由台湾大学发起，很快就获得全岛各大专和中专学校响应，并在台湾社会引起一定反响的“五二〇自觉运动”。发起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以挽救台湾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世风日下。何应钦抓住这一机遇，为“道德重整”在台湾的发展忙碌起来。他发表讲话，支持“五二〇自觉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的内容“是我们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恢复与发扬；这和三十几年前，蒋‘总统’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近几年，蒋‘总统’所发出的‘革新、战斗、动员’的号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样，“其实也都是在谋求我们固有道德精神的弘扬”[①]。他要求台湾青年学生要谨依蒋介石 1954 年讲述所谓“革命教育基础”的时候所说的：“我们要革命必先革心，要革心就要先祛除私心、偏心、欺心、疑心的四大恶德。”他还进一步说：“这四大恶德，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而尤以私心为其唯一的根源。

① 何应钦：《自省与力行》，1963 年 5 月 31 日在台湾大学学生代联会上的讲话。

所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揭橥的四大生活标准……也正是对付私心、偏心、欺心、疑心的最好途径，这些也都是我们中国固有道德的精髓。”他号召参加“五二〇自觉运动”的青年，要认真自省，要身体力行，最好能加入宗教的信仰与精神，并且说，宗教与伦理、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四大支柱，它不仅是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何应钦甚至还预言，这个与孔孟之道、与“MRA”、与“新生活运动”及“反共抗俄”使命一脉相承的“五二〇自觉运动”，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相媲美[①]。

沉溺于“道德重整”迷梦中的何应钦，对“精神战胜一切”的痴情，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依恋，对“MRA”的狂热与反共偏见，都在他写作的以下两首歌词中得到体现。他在《麦金诺岛》的歌词中写道：

> 麦金诺岛，麦金诺岛，暮鼓晨钟，麦金诺岛。重整道德，天下风从，诚实纯洁，无私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大同。不分种族与国籍，不问宗教同不同，一切须从自身做起，根除唯物主义劣性，共同努力，日新又新，世界康乐太平[②]……

他在《中华儿女歌》的歌词中写道：

> 维尔中华，炎黄帝胄，五千年历史与文化，雄视东亚。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等待我们来参加。道德须重整，善恶系一心，诚实人之本，纯洁性之真，无私自公正，仁爱在助入；起来吧，中华儿女们！六万万同胞待拯救，赶快重整道德，拯救受难的人群；起来吧，中华儿女们！人性要改变，自己先力行，标准要绝对，妥协绝不成，人人有道德，天下才太平。起来吧，中华儿女们！胜利的曙光在闪耀，赶快重整道德，巩固自由与和平，起来中华儿女们[③]！

《龙》剧在美国演出时，何应钦就趁机在华侨中搞募捐，希望有钱在

---

① 何应钦：《自省与力行》，1963年5月31日在台湾大学学生代联会上的讲话。
②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96页。
③ 《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97页。

台湾建立一个“道德重整”中心，无奈捐款有限，不能派上大用场，只能作为专项经费储存在台湾“道德重整”联谊会名下。何应钦作为这个联谊会的“家长”，既为反共的“上帝”做了许多宣传，也表达了自己对台湾的“上帝”——蒋介石——极尽忠心。台湾联谊会利用有限的经费，尽力在台湾岛上传播“MRA”的主张，在国民党军中和学校中放映反共意识形态的影片《崇高的经验》，编演歌颂台湾当局的话剧《万象更新》。台湾的新闻界和戏剧界纷纷发表评论捧场，“MRA”总部也发表专电以示祝贺。但这出戏只在台北演出了 8 场，便因经费困难，无法再演下去。何应钦原打算作一次环岛演出，但演员和服务人员都各有职业，不能离职，加之经费无着，只好作罢。

何应钦虽然费尽了移山心力，想使台湾的“道德重整”有更大发展，但因他毕竟只是失势的老将，他的联谊会又是民间组织，在“反共抗俄”中成不了大气候。1966 年末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次年 7 月 28 日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这一运动与何应钦所主持的“道德重整”运动相比，虽然同样是为台湾当局偏安海隅寻找精神支柱，符合台湾当局的反共需要，但因其后台更硬，范围更广泛，并且还因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被台湾当局利用来加剧反共而显得更富“针对性”，一定程度上又挤占了何应钦的地盘。

从 1947 年何应钦参加“MRA”起，到他去世为止的 40 年间，由于他的发动，“MRA”在台湾有过一度的辉煌；《龙》剧的演出，是何应钦对“MRA”和台湾当局的最大贡献。为了使这一运动能维持下去，何应钦费尽周折，终于成立了一个财团法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基金会”，先后由罗时宾、查良钊任董事长。有了经费的保证，台湾的联谊会可以同各国的“MRA”保持联系。为了培养“道德重整”的后继人，从 1965 年到 1981 年间，何应钦先后派出孙怀南、何弗国、汪咏雪、洪金冠、黄美惠、蔡贵珠等人前往瑞士、印度、澳大利亚接受“道德重整”训练，回台后充当联谊会的骨干。

在抓青年工作方面，由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冲击，何应钦另辟新路。从 1967 年起，何应钦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合唱团”，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青年，共同成立了亚洲

青年合唱团，前往美国参加“道德重整”大会及旅行演唱。在台湾岛上，由“道德重整”联谊会所组织的青年合唱团共13个，在岛上巡回演唱，宣扬“道德重整”。

联谊会还在台湾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交换各国从“上帝”那儿所获得的启示和反共的经验。一位英国的“道德重整”人士参加了一次台湾的青年“道德重整”座谈会以后赞叹不已地说：“除了在台湾，任何地区都没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么多青年人决定坚守道德武器的信念和付出他们的代价。在台湾的这一潜在力量，确是一个新的开始[①]。”这个“新的开始”，其实也是“MRA”的没落。

（二）

何应钦在“道德重整”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发表了不少关于“文化”的讲话和文章。如果剔除其中对大陆和共产主义的极端敌视、极端的偏见和极端的短视，他不因迭遭惨败的强烈报复心理而急功近利，从而把“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那么，他对文化的某些观点，却也不乏独到的见地。如早在1951年6月5日，他在东京日华文化协会发表的《东西文化与世界新文化之关系》中，就曾这样说过：“文化不是一种装饰品或应酬品，而浸透于各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感情，以形成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与性格，文化的真诚合作，是人与人、国与国间精神性格的融合统一，才能超出于经济政治的现实利害的计较之上。”他还说：“东方有东方的生活历史，所以东方有东方文化的特别成就，不能用‘落后’两字一概抹杀，今日不是文化由西向东的问题，而是东方人如何发挥东方文化的精髓使其与西方文化取得合理的融合，以创造世界更高的新文化的时候[②]。”其中的某些观点，确有一些理论价值，在近些年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仍能寻得见类似的影子。但这类见解毕竟是凤毛麟角。

1965年12月15日，何应钦在东京日本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发表了《中日关系与王道文化》的演讲，其中他认为在世界的文化体系中，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

---

① 台湾“道德重整”联谊会：《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在台湾》（1981年6月）。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67页。

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是要人怀德，不要人畏威”。而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它的特质，是“重物质，尚功利，因此发展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以飞机大炮为中心，以武力征服为手段的侵略行动”。他还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屡遭异族的侵略，仍然能屹立于东亚，正是由于这种王道文化的传统，所以能历久”[①]。以“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来区分东、西方文化固然失之偏颇，何应钦的“剿共”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哪有什么“王道文化”的影子？中华民族久被侵略而不亡，屡遭劫难而不衰，并不是由于用“仁义道德”去“感化”了侵略者，而是针锋相对地浴血奋战才赢得了胜利。



1965年何应钦访问日本时被东京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后致词。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73～474页。

一贯推行"化敌为友"和"王道"、"中庸"的何应钦，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的却是化亲为仇，企图以霸道取而代之。何应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矛盾，也正是"MRA"自身的矛盾。这一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风靡一时，是由于它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总的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MRA"运动的自生自灭趋势便明显地表现出来。

何应钦对"道德重整"如此顶礼膜拜，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许从反共的政治需要上考虑得要多一些，到后来，他所憧憬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越来越渺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曲折坎坷的峡谷，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已使何应钦往日的诋毁之词再无置喙余地。于是，他也从把"MRA"当作反共工具，转到把它当做自我修身养性的信条及类似宗教理想的追求，从政治需要转向精神需要。这也反映了何应钦和"MRA"都在应时而变。

1981年，已经92岁高龄的何应钦，作为"MRA"所推崇的老一辈名人，像朝圣者一般虔诚，最后一次到曾使他充满活力和幻想的瑞士柯峰，参加门庭冷落的"MRA"会议，以图用夏天的回忆来冲淡冬天的寒冷。

三、“国民外交”的马前卒

受降主官访日　头号战犯洒泪

（一）

台湾当局虽然自我宣称仍承袭着“中华民国”的“法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台湾当局的“中华民国”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蒋介石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就必须维持台湾政权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名义；支撑这一名义的“中华民国”的所谓“法统”，因新中国的诞生而成了历史的陈述。台湾当局以早就不复存在的“法统”来处理内外事务，势必陷入极端的矛盾之中。台湾当局要维护“反攻复国”的内政，就必须坚持其所谓“法统”；而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面以及海峡两岸关系上，其所谓的“法统”已走入了死胡同。

国民党政权退保台湾之初，“对外关系”在台湾当局的各种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何应钦在政治、军事上失势后难以效力，但在拓展台湾的“对外关系”上却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初，“对外关系”依附于美国在亚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围堵政策。它的“法统”和“对外关系”都建立在美国支持它作为“中国政府”的基础之上，并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仍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支柱。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台湾当局事实上早就有了终将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预感。因此，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的支持及“外交”承认，就成了台湾“对外关系”的两大命脉。同美国人打交道，究非何应钦所长。而与日本朝野来往，何应钦却是得天独厚，轻车熟路。为了寻求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与支持，何应钦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为维持台湾当局仍代表"中国政府"的地位，拼命拉住日本，将其视为举足轻重的一个筹码。

在抗日战争前后，何应钦在国民政府内部，始终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乃至国际舆论视为"亲日派"的巨头。他虽然最终追随蒋介石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使他的历史有了八年抗战的一篇。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遵循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几乎一夜之间，何应钦便化敌为友，化友为敌，成了国民党当权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推进联日反共政策急速转变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何应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前侵华势力的残余中享有别人无与伦比的威望，成了日本战后反共反华势力心目中的大恩人。

去台湾后，蒋介石在拓展对日关系上重新起用何应钦这匹识途老马，的确煞费苦心。何应钦已被摒除于台湾新的权力结构之外，不能给予他任何官方的名义开始对日"外交"攻势，只能让他以私人资格或利用"MRA"的名义发展台日关系。这种名为私人或民间、实则官方意志的做法，便是在台湾当局不断调整的"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有一席地位的"国民外交"。它较之官方的"外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是台湾当局维持其统治的一种革新尝试。何应钦是堪称有"首创"之功的扛大梁之人。

1951 年 1 月 4 日，何应钦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乘便替夫人诊治癌症。

既属"私人资格"，台湾当局自不便有所张扬，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反映当然也不可能热烈，这使何应钦在日本度过一段受冷落的日子。对于关心中国国民党命运的日本人来说，何应钦毕竟是知名度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他的访日，迟早会激起政治上的波澜。而首先掀起欢迎何应钦访日热潮的人，便是得了何应钦救命之恩的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

逃脱了审判回到日本后的冈村宁次，成了日本前军界人物组成的战友会副会长，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对救命恩人何应钦的到来，自然要诚心报答。

（二）

何应钦夫妇抵达日本的消息传到冈村耳中时，冈村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得知日本朝野对何应钦访日态度冷淡，使何感到难堪，便不由得愤从中

来，联络起战友会中的一批人，要认真感激这位救命恩人，迫使日本朝野重视何应钦的访问。冈村说，何应钦将军首次访日，而“我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后的国家，仍属遗憾之至”①。

1 月 16 日，冈村宁次偕同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南京的日军陆、海军及大使馆的代表，以日军战友会的名义举行感谢会并设宴款待何应钦。冈村宁次在席间致词说：“何将军在我国被称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但本人仍然不能不忆起被日本世人所知的事情，来证明何将军之如何爱护日本。”使冈村宁次感触最深，也是何应钦曾引以为荣的事情，是在原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所流传的所谓何应钦的“预言”。冈村说：“记得十六七年前，当满洲事变方殷之时，何将军曾向本人及同事，屡次说明这样的话：‘中日两国一旦扩大冲突的范围，而且超过现在的程度，则中国共产党必将趁机激增势力，此事固成为中国将来的祸根，而日本亦势必蒙受其祸。因此，中日两国必须防止武力冲突，使不致超过现在的范围以上……’不幸的是，何将军此项预言，竟尔言中。眼前赤浪滔滔，正袭来日本，无论日本政治或思想，似乎都在动摇。”当然，最令冈村感激涕零的，是何应钦对他个人及侵华日军处理过程中的“恩德”。



何应钦偕夫人出访日本时与迎宾者合影。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49 页。

冈村说：“蒋介石总统阁下，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发表‘对于日本人，应以德报怨’的著名声明……而事实上担任接收及遣返200万日本军民的处置者，实在是当时任总司令的何应钦将军。经常想到在旅外的500万军民中，占着200万在中国的日本同胞，所以能于短短的两年间，差不多平安的，甚至允许携带私人的物品及铺盖返国，是多亏了谁？再想到南洋各区域的遣返状况，及现在依然被羁留在西伯利亚与中共地区的数十万同胞，我们日本国民，从当时的中国领袖——尤其是何将军，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冈村还特别强调说：“依照国际惯例，军官与士兵应分别羁留，当时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处理，在中国的外国军事顾问也当然如此主张，何将军却毅然表示反对，并主张：依照日本人的精神与气质，使他们保持原有指挥系统直到最后，较为方便，因此，直至200万军民遣返完毕，本人的指挥，仍然获得承认，而且所需一切通信器材、飞机、汽车及脚踏车等，都在接收后同时获得贷与，并无俘虏营的设置，一直保持着军队的体系[①]。”致词中，冈村宁次激动得声泪俱下，何应钦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对老朋友吃着日本菜，喝着日本酒，重温了一番昔日的友情。

由于冈村宁次等人的鼓动和牵线搭桥，何应钦此番对日本的访问开始升温。一些日本政界、经济、文化界负责人，均将何应钦的私人访问当做代表台湾当局谋求台日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阶梯，纷纷举行招待会、演讲会。何应钦借着这些机会，开始穿针引线，谋求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和平条约”，以维持台蒋“中华民国”仍代表“中国政府”的虚假状况。

2月14日，在“日华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何应钦的酒会上，冈村宁次起立致词，感谢何应钦对他的大恩厚德，中途过于激动，竟致痛哭失声，讲不下去。许多曾受过何应钦庇护的前日军将领，也热泪涟涟。

1952年9月，何应钦收到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为《话》的杂志。这本杂志上刊登了冈村宁次写的《徒手官兵》的文章，对何应钦在处理日本投降及遣返日俘日侨中的宽大政策感激不尽。何应钦读着冈村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心底洋溢着春种秋收的喜悦。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47～1049页。

（三）

1955 年 7 月，何应钦又陪同夫人前往东京诊治癌症，顺便治疗自己的倒睫眼疾，预计在日本将逗留 3 个月。岂料一去竟达半年多，直到次年 3 月才返回台北。在日期间，除了治病之外，依然没忘记从事“国民外交”，谋求日本对台湾的更大支持。

在逗留日本期间，何应钦又与冈村宁次会面。这次会面的性质虽然属于老友叙旧，谈话随意，但《文艺春秋》杂志闻讯后，即向何应钦和冈村约稿，希望通过他们两人的回忆，重现中日关系中鲜为人知的历史，并替曾是交战双方主要将领的何应钦和冈村宁次树立新形象。

会面是在没有人插话的情况下进行的，冈村与何应钦彼此寒暄后，即按照日本人的风俗，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享受日本的茶道，一边开怀畅谈。冈村毕竟是向何应钦缴械投降过的总司令官，多少有些局促不安。还是何应钦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把冈村带回了那段使他春风得意的历史回忆之中。

“我初次遇到冈村先生，好像是 1933 年，在北平进行《塘沽协定》谈判的时候吧？”

“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参谋副长，您是中国的军政部长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记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就此罢手了，如果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 20 年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

“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例如当日方提出的《塘沽协定》方案，曾有一项‘日军概撤退至长城之线’等。我当时恐怕这个‘概’字可能产生各种不同解释而发生新冲突，认为应该取消这个‘概’字，那时您也具有同样看法，认为应当取消。”谈到“概”字时，何应钦还用日语强调，中文的‘概’即日文的“概权”。

“我是全权代表，那提案是由关东军草拟的，所以原稿有这个‘概’字，不过，我为两国将来着想才毅然擅自将这个字取消了。”

“当时您的参谋喜多大佐等都很反对吧？”

“大家都反对[①]”。

“就是说我们又变成冤家对头了？”

“是呀！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奇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人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

“都是我的部下干的。”

“多谢多谢！”（笑）

“日皇的停战敕语您听了没有？”冈村提起了另外的话题。

“有，是在南宁听到的。我们总司令部每日24小时都在收听贵国广播。”

“距离太远，听不清楚吧？”

“听得很清楚，我马上于16日回到重庆，蒋‘总统’刚好在公馆。商谈之后，我即赴湖南省芷江，准备接收，当时日方曾派来今井武夫少将商量如何接收。”

“是的。那时，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何应钦先生是陆军总司令。我虽处于投降之将，但由于对方是何应钦先生，无形之中使我减少了很多忧虑……当签字前的9月7日，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地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

“您没带刀来。”

“是的。其次，使我不能忘怀的，也是您的宽容敦厚，本来预先排定我们进场的应向全体敬礼，何先生等不必还礼。可是，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献您的时候，您都站起来给他回礼。后来，外国

---

① 冈村宁次当时虽同意取消，但喜多诚一等幕僚均反对，这一“概”字仍在《塘沽协定》中保留下来，为日军扩大对华北的侵略遗患甚多。冈村是虚假表演，何应钦大为感激。

顾问团的没有抗议吗?”

“是的，他们略有说道。”

……

“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力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的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是的，是的。是采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多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那个派令，曾使您堂堂正正地发布命令。”

“我想这样破例的办法，一定是何应钦先生提案的。我后来听说：当时有美国顾问团在中国，问题并不简单，但您却考虑到日本国民性，认为让他们自己维持秩序，保有组织，较为妥当，由于您有这种意见才决定这种办法了。其次，中国曾准许我们各人可以带回行李30公斤，这一点在日本虽然很少提起，但实际上到过中国战线的人都非常感谢你们。”

“哪里哪里。日本受轰炸的情形，我们很明白，并且我看过了由飞机上摄下来的照片，所以当时我想，如果日本军民不带他们的行李回去，他们回到日本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数达200万的侨民及官兵回到日本，如果身无一物，他们必定很窘很苦，且要埋怨我们。一如冈村先生所说的：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到这里已宣告结束。今后是兄弟之邦，所以应该尽量促成和睦的关系。”

“战后日本人曾由南洋、中国、朝鲜等许多地方回到日本，一时大有人满为患。但从中国派遣军方面回国的人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驻日盟军指示陆军大臣发布减少行李的命令。我也接到同样命令，可是，我故作不知，未加理睬……”

“我们为派遣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 30 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 80% 。”

“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此，自 1945 年 11 月起至 1946 年 7 月止，在短短 10 个月内 200 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 40 多年。”

“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民党军队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关于这一点，根据我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 200 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后来，美国本身也有所觉悟，他们究竟是言论自由，所以国务院也曾经承认其失败。据我看，美国常常透视将来的眼光，他们缔结雅尔塔协定犯了一次错误。”

“我不想多提美国的问题……当时虽也有些反对那些做法，可是比较更重要的，照我的信念来说，认为日本是我们兄弟之邦，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苏俄，我们‘反共’人士，为遏制未来的苏俄侵略，日本与中国非提携不可。”

“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 200 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的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一件事，就是你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队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我在里面曾提及过去和日军打过仗的，中国军队最强，俄、英、美次之。"

"我在大正初年前留日四年……"

"到日本留学，如能找到一个女友，那个人对那个国家的语言，就会很快进步，可是何应钦先生没有女友，您的日语都能讲得这么好。"

"哪里，已经不行了。不过，以后我会常常到贵国来，自然日语也渐渐讲得好些。过去若没有战争，我相信我能讲得更好些。我是'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此次来贵国，承日本各方面朋友招待，使我得以旅行日本全国，参观名胜古迹，或是工厂等。"

"去了京都没有?"

"去了奈良。参观过正仓院……"

"正仓院很好。这地方平常是看不到的。"

"我运气好。"

"你看是不是在贵国文化里面已灭迹的东西，都能在日本正仓院看到?"

"是的。"

"例如五弦琵琶，这在中国是已经没有的了。还有，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姓'缬缬'的鹿儿岛，而在正仓院里有这种'缬缬'，听说是比更纱更早一代的更纱。这一点我对何先生和你们中国人倒是有些自负之感。如前所述，东洋文化现有存于奈良正仓院者，故今后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常向军队或是一般少年学生讲话，常把日本当做一个榜样。日本国民一般地说来都热爱勤勉，并且竞争意识很深。例如造船，虽然经过那么大的战争，现在已经复旧了。可是，日本人也真会学外国的坏处呢!"

"对的。现在的日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不管好的坏的，竟一味

去模仿苏俄或美国!"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可以说是由战争招来的。"

"今天我们见面，实在太好了，我把这10年间一直藏在心里的郁情都表泄出来了。关于日本军队从中国遣返的实现，关于由于中国方面的善良应该使日本人明白了解的，今天偶然能有此机会公开发表，使我了却一桩心事，心里感觉十分舒畅[①]!"

无论对何应钦个人，还是对台湾当局，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除政治上的影响外，也有感情上的收获。

老马识途堪驰驱　牵线搭桥膺重任

(一)

早在1951年何应钦第一次访问日本期间，他就利用战时与日本要人的交往和在日本政界、军界中的一贯亲善的形象，为缔结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而奔走呼号。

1951年1月19日，日本记者协会举行招待会，何应钦以《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体安全保障》为题，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主张日本应与台湾当局合作反共。他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在地理上及文化传统上无法隔离，过去由于日本一部分军阀以及野心政客领导的错误，以及造成中日两国八年的大战，结果两败俱伤。所以战争结束之后，'我国政府'便以蒋'总统'所主张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原则为今后对日外交准绳，希望以后和平如初，携手合作，小之共同解决两国间的困难，大之则为东亚建立和平，以挽救世界目前的危机。"

二是何应钦主张签订"远东公约"，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他说："当前世界大势，斯大林已整个统制了共产集团的行动与意志……斯大林的最终目的是奴役全球，称霸世界，但欲奴役全球，必须控制亚洲，因为亚洲漏洞最多。"为挽救亚洲所谓危机，他主张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应从速成立一项"远东公约"，"从军

---

① 日本《文艺春秋》1956年4月。

事、经济、文化进行合作，在美国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共同战斗体，以击溃共产集团的侵略”。

三是鼓吹“反攻大陆”。何应钦认为“中共已完全受了斯大林的操纵”，对内“施行暴政”；对外“发动对韩侵略战争”，“悉索敝赋，人民切齿痛恨，业已注定失败命运，我国民政府必将‘反攻大陆’，摧毁中共政权”①。

此后，何应钦这位用枪炮反共的败军之将，又试图用唇舌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相对抗。他先后在东京的“日华经济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中日关系之展望》的演讲；在“日华文化协会”欢迎会上发表《中日文化关系与太平洋之将来》的演讲；在日本“道德重整会”上发表《中日道德合作》的演讲；在大阪的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上发表《孙中山先生亚细亚主义真谛》的演讲；在《东京新闻》上发表《寄语日本有识之士》的文章；在东京的亚东俱乐部发表《东方文化的精神》的演讲；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韩国战局与远东局势》的文章；在“日华文化协会”上发表《东西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的演讲。这些讲词和文章，贯穿了以下的精神：一是提倡日本与台湾当局进一步合作，以建立东亚的反共包围圈；二是鼓吹台湾当局一定要“反攻”大陆，并且恳请日本的支援；三是阐述中日文化相对应的东方文化体系；四是宣扬蒋介石在处理日本战败以后主张保存日本天皇制，不派兵进驻日本本土及“以德报怨”的一系列“功德”；五是自我张扬他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的亲善、宽容与联日反共的一贯主张。

在这次访日期间，何应钦接见了日本政治评论家山浦贯一，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由山浦贯一整理后，全文发表在东京《帝王》杂志1951年5月号上。在这次长谈中，何应钦除了对山浦讲述他当年如何贯彻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外，企图通过山浦，警告日本政府和人民，不可再容忍共产主义。山浦与何应钦有这样的共识，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的机会而深感抱歉。何应钦自然表现了肚里能撑船的大度宽容。他说：“日本人今天能充分反省这一点，我们也不咎既往，愿意今后携手合作，以共谋亚洲的重建。”何应钦还危言耸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49～1050页。

听，告诫山浦：“共产集团究竟如何的可怕，这在我参与国共斗争 20 余年的经验中，知之甚详。一旦日本卸除一切防御，则亚洲对共产集团的防线，得陷于崩溃。”他还认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主张保持日本的天皇制度，其真意是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则实行共产革命，这种条件是再好不过的了”。而“日本如果真被赤化……落入苏俄手中，则世界上民主国家集团与共产集团的比重，势必发生极大的改变”。他要山浦对“共产集团”，“宁可神经过敏一些”。何应钦为了恐吓像山浦贯一这类对新中国真实情况知之不多的甚或一无所知的人，涂抹了一幅大陆的“地狱图”。造谣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民众 4 亿人中杀死 1 亿以上的人，以解决粮食问题”等。他同时还编造了一个台湾陆、海、空军精锐 70 万人，“正待机光荣的作本土登陆”的计划，并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自中共介入韩战以来，大陆上 160 余万反共游击军，也正开始积极的活动，农民反抗暴政，也日趋显著[①]。”他对山浦的讲述，目的是要山浦相信，并通过山浦去影响更多的人相信，只有日本与台湾当局携手反共，才是唯一的出路。山浦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对何应钦所说的一切，大约是疑信参半的。

在何应钦即将结束对日本“私人”访问之前，他露出了此行的庐山真面目，把早在 1947 年便有所酝酿的对日和约的问题重新提出。

（二）

1951 年 6 月，美国特使杜勒斯出访英国。美、英两国商议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对日作战有关国家的和平会议，以解决缔结对日和约问题。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不信任及美国一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所以美、英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都排除于和会之外，并声明听任日本在和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在签订多边条约的和会中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美、英此举自然遭到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于 6 月 18 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置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签约条件，均不接受[②]。”中华人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54 ~ 1063 页。

② 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第 37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

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企图排除中国对日媾和。何应钦获此信息后，在访日的最后几天里，抓紧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希望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缔结和约。

1951 年 7 月 2 日，何应钦偕夫人回到台北。他在机场接见记者时宣称：“日本大多数民众，均愿与蒋‘总统’领导之‘自由中国’政府签订和约，钦等并希望吾人能早日‘光复大陆’。”他说：“此行最大成就，在于中、日两国关系上，已开拓一条良好途径。”“对日和约，可望于本年 9 月签订”①。

返台次日，何应钦晋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访日观感及情况。蒋介石认真听取了何应钦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经过、日本各政党的情况、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中共在日本的宣传工作、日本朝野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以及“台湾当局”对日工作的重要性、缔结“台日和约”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汇报后，不住点头称赞，并留何应钦与他共进晚餐，祝贺他投石问路的成功。

1951 年 9 月 4 日至 8 日，美国不顾中国海峡两岸的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会。中国被排斥在外，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派代表与会，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英一手操纵的其他国家在和约上签了字。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宣称：日本当在和会以后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和约。台湾当局于气愤之余，又得到一点安慰，立即命“外交部长”叶公超会见美国记者，表示愿以多边条约的原则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但日本政府的态度冷漠，且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倾向。这可急坏了台湾当局，官方的、民间的各种关系全用上了，希望阻止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而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和约。何应钦函电频频，利用他在日本的各种关系促成台湾当局与日本签约。无论台湾当局是压、是拉，都没有让日本下决心。最后，由于美国施加压力，杜勒斯访日，向吉田茂首相陈述美国反共的立场，日本才同意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

1952 年 2 月，日本政府派遣以河田烈为首的议和代表团赴台签订和约。从 2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共举行了 3 次正式会议，18 次非正式会议，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068 ~ 1068 页。

终于炮制出一份“台日和约”。何应钦作为这一和约的主要牵线人之一，因不担任公职而不能参与正式谈判，但却与河田烈保持密切往来，被邀请出席4月28日的签字仪式。

“台日和约”的主要内容如下：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居民是“中华民国”之民众；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当局与日本相互间之关系，愿遵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之各项原则；台湾当局愿尽速商定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这一“和约”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又是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签订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何应钦对此却欣喜万分，认为他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目标实现了。更令他身心畅快的是，“台日和约”的签订，宣布了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与日本签订的《塘沽协定》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均归无效，似乎可减轻他多年的心病。在签字仪式后，何应钦发表讲话：

> 我素来主张中、日亲善的，早在我担任军政部长时，即曾忠告当时的日本政府，放弃武力侵略的政策。我认为中、日两国，必须互相忍让，密切合作，因为以我们两国在远东的关系，合则两利，如果不幸而出之一战，则鹬蚌相争，正是渔翁得利。后来我这话终于说中了，以致十几年战争的结果，不幸两败俱伤，而且坐使中国“共匪”长大，增长了苏俄所领导的国际共产集团的力量。今天，中、日两国正式双边和约，结束两国战争状态，重新奠定两国国民今后合作的基础，这实在是值得欣慰与庆贺的①。

次日，河田烈专门拜会何应钦，感激他在促进“台日和约”签订及发展“台日”关系方面的贡献。何应钦邀请河田烈乘车前往乌来风景区去参观游览。游览仙游峡谷时，何应钦面对“人在乱石丛中转，花在沸水浪中开”的壮美景观，大加感慨，谓“台日”关系，千回百转，“和约”的签

① 何应钦：《参加中日双边和约签字仪式的讲话》（1952年4月28日）。

订，终于走出了峡谷。在观赏高 82 米、宽 10 米的乌来瀑布时，何应钦感觉大陆失败以来心头郁结的烦闷，有如眼前的“飞来之龙”，一泄而空，兴奋不已地向河田烈介绍乌来风景的起因、特点及有关掌故。

“台日和约”签订以后，何应钦自以为台湾当局名存实亡的“法统”又多了一股维系的绳索。日本及美、英等国对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外交”承认，减轻了他本人被台湾当局的抛弃感和孤独感。他认为台湾当局既然能代表“中国”，他今后的对日活动也从私人资格向代表“国家”资格转变。



何应钦与访台日本友人在乌来瀑布前留影

（三）

1952 年 7 月 13 日，何应钦与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共同邀约邵毓麟、黄朝琴等人，商讨筹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这一组织产生的动因，是何应钦等人企图通过“民间外交”，进一步推进台日文化经济

的合作。还在"台日和约"谈判期间，何应钦就与对方代表团成员大竹、绪方也分别就加强日、台民间成立有关组织进行磋商，何应钦主张不必要将经济、文化分开，可合并一起，相辅相成，于是就孕育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构想。按照台湾当局"内政部"规定，必须有30人以上发起的组织，才能申请成立。何应钦认为"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仅有30人发起，显不出声势，决定征求150人左右的发起人。对于该会章程草案的拟定，则完全是依照台湾当局"内政部"社团组织"法规"，参考台湾的亚东协会、日本的"日华经济协会"等团体的组织章程来拟定，采取团体会员制度。协会下设文化、经济、财务三个委员会，设置一个研究所，作为将来的工作重心。该协会的经费，台湾当局起初并没有资助，而是通过团体会员缴纳常年会费的办法来维持。起初的会址，是借用台湾工矿公司陶业分公司的楼房开展活动。

7月29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张群当选为临时主席，何应钦当选为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该会的章程，规定该会的任务是："研究中日两国文化、教育、经济情形及人民生活状态"；"收集、交换、翻译与刊行关于学术理论、文艺创作及经济研究之图书刊物"；"介绍与交换教授及技术人员"；"举办旅行、考察、讲学"；"举办各种展览会、交谊会"；"其他有关沟通中、日文化及发展两国经济事项"[①]。从此以后，何应钦又多了一项社会兼职。几年后，他担任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主任理事。这一组织成了他毕生推进台日关系的工具，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以后，更是如此。当然，这一组织的许多非政治性或政治色彩不浓的活动，对于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确曾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它的成绩，自然也是何应钦晚年的慰藉和劳绩的一部分。

已经失去了权力的何应钦，原本就不愿卷入国民党内的权力纷争，但蒋介石常常要利用他的特殊地位、经历和身份，在权力争斗中替自己火中取栗。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何应钦曾充当了蒋介石消灭、兼并或收买"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工具。去台湾后，蒋介石偶尔也要使用一下这闲置起来的工具。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第1097页。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不久，依靠“美台协防条约”（即《与台湾关系法》）的庇护，蒋氏父子的统治基础似乎稳固了，于是一场“清理门户”的斗争又接踵而来。这一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搞掉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蒋氏父子一手炮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的处置中，蒋介石又企图让何应钦参与“调查”，以定孙立人“通匪”叛变罪。

孙立人在台湾当局国民党军界，是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之外的留美派的代表人物。孙有学识，也有战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蒋介石一直不让他进入野战军指挥作战。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何应钦起用孙立人作为远征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入缅作战，充分显示了孙立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官”。他脱颖而出，中外驰名，但同时也因他恃才傲物，被同僚视为“是位很坏的领袖”[①]。当时，孙立人与美国在华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对以何应钦为首的高级将领的平庸无能，持同样看法，且其指挥才干深获史迪威赏识，因而被蒋介石、何应钦所嫉恨，日益饱尝了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为了改善美、台关系，避免被美国抛弃，蒋介石才起用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恢复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更显示出孙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这种鹤立鸡群的优势，导致了孙与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高级将领矛盾重重。不仅如此，孙还敢于与正青云直上的蒋经国为敌，抵制蒋经国以政工系统挟制军队。何应钦身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对孙立人与蒋经国及各军将领间的闲隙充耳不闻，既不敢顾，也不敢问。

1954 年 6 月，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连任期届满后，调其为“总统府”参军，再度将其打入冷宫。孙释权以后，并没有像何应钦那样安分、驯顺，其孤傲、自信更胜于前。“他坚信，他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信存，私人谈及大陆之失，纯由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②]。”于是，蒋氏父子利用孙的部将郭廷亮“匪谍”案将孙逮捕。案发两个月后，始对外公布孙“辞职”。接着，蒋介石下令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何应钦被指定为调

① 邓维贤编：《孙立人冤案平反》第 212 页，台湾新梅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② 邓维贤编：《孙立人冤案平反》第 214 页。

查委员。令下之时，何应钦已偕妻子去了日本。何应钦接到电令，初颇震惊，继而于受宠之余体味出此中奥妙，他不愿卷入，遂以妻子复诊癌症为托词向蒋告假。待何应钦长达 8 个月的假期满后，孙案已"水落石出"，调查委员会确认孙与其部将郭廷亮的"匪谍"案无直接关系，得蒋介石"宽容"，在家读书自省，"由国防部随时考察"，成了被长期软禁的"张学良第二"。

1956 年 3 月 9 日，何应钦返回台北。几日后，他主动地向蒋递交了一份访问日本观感的"折呈"，明是报告在日本如何卖力地推进"国民外交"，实是解释未能参与调查孙立人事件的原委。何应钦的报告堂而皇之冠以"折呈"之名，足见其心目中视蒋犹如封建时代的帝王了。

何应钦在"折呈"中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在日期间与日本自民党、社会党领袖的会谈以及日政府人士对他的"非正式接待情形"。他说曾代表台湾当局向日方提出要求，希望给予台湾当局"精神与道义"上的援助，对日本国内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扩展贸易的势力予以遏制；同时，希望日本为台湾从事各种建设提供技术人才。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松野鹤平向他表示："绝对支持"台湾当局，对该党与台湾当局不友好的党员，"均设法使其不能入阁，或不提名为下届议员候选人"。日自民党出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还请他转告蒋介石，在其担任外务大臣期间，无论社会党或其他方面施加任何压力，他保证对"日台和约"信守不渝；对于台湾浪人在日本酝酿的"台湾独立运动"，他愿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尽量阻遏其活动。何应钦与日本社会党领袖铃木茂三郎谈话后，称铃木为"左派领袖"，"左派言论则颇为露骨"。

何应钦在"折呈"中还报告，日本全国商工会议会长藤山爱一郎、关西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崛新、原子力委员会主任石川一郎等，"均为反共之人士，对我政府均甚友好，唯认为我政府目前仍太偏重军事，而对工业生产、农业改良等……并无多大进步。并谓日本在两年内，曾去大陆之议员在 300 人以上，工商实业界去者近千人。彼等返日后，均谓中共甚重视农工建设及技术教育。最近且计划于 5 年内，培训 10 万名技术人员。因此渠等均建议，希望自由中国，对工业发展、农业改革与技术教育，须特加注重"。

在"折呈"的最后，何应钦写道："近两年来，日本民众受中共之宣

传，对‘自由中国’表示支持者甚少。各大报纸及杂志，对中共之遣送少数日本虏侨回国，表示感谢，并在显著地位登出，致对‘自由中国’友好之作家对此均表不平。”为了使日本朝野不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恩德”，他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将会谈内容整理成文，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其目的是希图对日本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舆论加以抵制①。

由于何应钦以台湾民间或官方的方式，在推动着台日关系发展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台湾当局把他当做对日关系中应打的一张王牌，连日本当局也对他另眼相看。1965 年 12 月 10 日，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书写赠勋文，颁赠何应钦一等旭日大绶勋章，以表彰他对“战后”增进日、台关系的巨大贡献。次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代表天皇，将一枚金光灿烂的旭日大勋章挂在何应钦的胸前。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枚勋章便成了何应钦替台湾当局推行“国民外交”、维持台日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句号。

“反攻大陆”惨败　“国民外交”雪崩

（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台湾当局为了稳定军心、人心，就开出了“反攻大陆”的空头支票。何应钦在每年的元旦、3 月 13 日棉湖战役纪念日、6 月 16 日黄埔军校校庆、双十节、10 月 30 日蒋介石的生日和其他场合的演讲、致词，都跟着蒋介石高唱“反攻大陆”。尤其是“台日和约”的签订，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当上总统，又以坚持反共的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使中断了几年的台、美关系得以改善之后更是这样。

1953 年，美国派蓝钦为驻台湾“大使”，并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声称坚决维持台湾的现实地位，防御澎湖地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所谓“共产主义颠覆和侵略”。台、美双方将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抵抗武装攻击”及“共产颠覆”。这个“条约”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123 ~ 1126 页。

对梦想“反攻大陆”的何应钦及台湾当局来说，不啻是兴奋剂和定心丸。然而台、美关系的“蜜月”却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和南麂山列岛的胜利破坏了。身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何应钦虽在作战上没有决策权和指挥权，但对制造舆论冲淡一江山岛等岛屿的丢失所造成的阴影，改变台湾民众“反攻无望”的情绪等方面，却是竭尽忠悃。何应钦率领他手下的顾问们前往金门、马祖视察、慰问，宣称“誓死保卫金门、马祖”，扬言中共无进攻金门的能力，以稳定惶恐不安的人心。然而，当国共两党军队发生激烈的金马之战的时候，何应钦却在周游列国，热衷于“道德重整”，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舆论方面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复国”计划。

当大陆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给经济造成巨大困难的时候，何应钦曾为此幸灾乐祸，以为共产党会就此一蹶不振，“反攻大陆”的神话似乎有了变成现实的一线希望。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武装骚扰、破坏，还是何应钦的意识形态反共，都丝毫无损于新中国，反倒使台湾当局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自己的错误，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新中国的顽强生命力和对国际社会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侧目。越是台湾“朝野”对“反攻大陆”的梦呓不屑一顾的时候，何应钦就越是要表现出对“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对蒋介石充满信赖。事实上，曾经作为国民党军事方面第二号人物的何应钦十分清楚，在他离开大陆时，除了被解放军歼灭者外，国民党军有 153 个整师、1000 多名将领、177 万官兵、43 架飞机、72 艘舰艇起义，投向人民阵营。退到台湾以后的十余年，虽然有了美国的援助和扶持，台湾国民党军的装备、给养和攻防实力有所增强，但要重新出现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相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要“反攻大陆”也只是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充其量只能当做那些反共的败将一种虚妄的精神寄托和渺茫的安慰。

1962 年 3 月，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紧接着，台湾当局紧锣密鼓地实行总动员，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决一死战，何应钦也与夫人一道去美国领导他的《龙》剧和国际部队，以意识形态的反共助蒋一臂之力。何应钦与夫人途经东京时，受到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人的欢迎。岸信介告诉

何应钦：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并预言这一年将是“维护世界自由与民主人士之决定年”。

何应钦返台后，蒋介石派他作为台湾当局“总统”特使，率领“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罗英德中将及联络局副局长温哈熊上校前往汉城，参加韩国独立十七周年庆典。

（二）

1962年8月12日，何应钦到达韩国的当天下午，韩国代大统领朴正熙及外交部长崔德新即接见了他。特别令何应钦兴奋的是，崔德新竟是他当年的部将，而崔的前任外交部长金弘一，则是他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的学生。这位金弘一是朝鲜族，1919年化名王雄，自称籍贯为奉天沈阳，因仰慕何应钦所办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辗转由上海到贵阳报考。经何应钦特许进入学兵营，然后升入讲武学校第三期。由于王雄华语甚差，何应钦曾特别派人为其补习中国语文。这个王雄，后来曾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所谓“大使”。何应钦做梦也想不到，当年的王雄，竟然会为他开展对韩国的“国民外交”起到特殊的作用。



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韩国时向朴正熙递交“国书”

何应钦在汉城金浦机场的讲话和欢迎晚宴的致词都宣称：台、韩两“国”乃兄弟之邦，“反共复国，休戚相关，自须加强合作，团结互助，庶期达成拯救两国被共产党所奴役的同胞之共同目标”。8月17日，韩国政

府向何应钦颁赠了文化勋章，朴正熙还设午宴欢迎何应钦。何应钦致答词时不仅称颂朴正熙的政治改革、经济复兴、国际交往中的功绩，以及他个人“至大至刚有人格，爱人如自己的精神”，还鼓动韩国朝野的反共情绪。他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积极在东南亚逞其奸计的今天，我们更要以溺人溺己的精神，发挥一切反共的潜力，消灭国际姑息思想，破除苟安图存的中立主义，使共产主义的毒素与爪牙不易渗入民主阵营，威胁我们共同的安全与自由，妨害我们的反共大业[①]。”何应钦以他坚定反共的信念，果然不辱蒋命，赢得了韩国反共势力的称颂。何应钦回台后，于9月7日向蒋介石呈递了书面访韩报告书，报告中称：“韩国一般有识之士，认为中、韩关系休戚与共，不可分割，此等人士如朴正熙本人，陆军参谋总长金钟五上将、现任外交部长崔德新、前任外交部长金弘一、前空军参谋总长金信等。他们认为‘中’、韩两国，除在历史、地理、文化上有密切关系外，目前‘中’、韩两国的处境，也极端相似，我国有中共‘窃踞’大陆，韩国有北韩傀儡政权，‘中韩两国’反共的目标完全一致，‘中韩两国’都接受外援，而‘两国’的反共行动，都受到外来的牵制。他们认为‘我国’是反共的先进国，对反共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应向我学习反共的经验，效法我国的反共体制与精神，大致言之，革命政府内的稳健人士，都持有这种看法[②]。”何应钦自知无权参与“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选择了在无形的反共战线表达自己的意志。台湾当局为了声明反攻在即，1963年5月中旬的一天，金门防卫司令刘安琪还特邀何应钦和“国防会议”秘书长顾祝同等，由台湾空军副总司令徐焕升陪同，在人民解放军停止炮击的时候，前往金门视察部队及防务。台湾当局对何应钦等老将视察金门大肆渲染。其实，这不过是制造一种烟幕。何应钦等人在金门走马观花一阵之后，当天晚上便悄然溜回台北。原来，他们害怕像台湾当局前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和章杰、赵家骧等将领一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下送命。

（三）

与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彻底失败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犹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262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265页。

如旭日东升。不少国家一直在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懈努力。台湾当局也预感到赖在联合国的日子不多了。1963 年 5 月 6 日，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经过台湾当局批准，由何应钦代替朱骝先为台湾当局“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该会的前身是 1919 年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在北平成立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联合国成立后，该会则是企图维持台湾所窃踞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机构。按照何应钦的解释，这个同志会“当前工作的重点，是配合国策运用国民外交途径，发动国际民间力量制裁共产侵略者，以期达成‘光复大陆’、建立永久和平的使命”①。

梧桐一叶落，愁人更畏秋。就在何应钦当上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后数月，8 月 20 日，日本政府批准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成套尼龙生产设备。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何应钦敏锐地感到，日本政府此举，“无异直接资助中共，势将严重危害自由世界之安全”，并以会长名义，奉劝日本要“重视道义”，积极采取步骤，以挽回对台湾当局造成的损失。并表示支持台湾当局对此事的“严正立场”。

好戏连台，祸不单行。紧跟着日本政府向恢复日中邦交试探性的迈步之后，11 月 10 日，联合国秘书长在美国联合国同志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他怀疑无限期地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时，是否明智，或甚至是否可能。何应钦闻讯后，立即发表声明，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此番言论是“公开袒共言论”，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原则和联大决议，而且是其个人服务国际公职的不忠实行为，他为此而“至感骇异”②。

自此之后，风声鹤唳，但凡国际上任何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发生，何应钦不是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的身份发表声明，便是以台湾当局“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主席团主席的资格讲话，大加反对。

1966 年，第 21 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前夕，鉴

---

① 何应钦：《在联合国同志会茶会上的讲话》（1963 年 5 月 16 日）。

② 1963 年 11 月 16 日台湾《中央日报》。

于此时非昔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呼声已经势不可当的形势，何应钦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大会“坚拒中共入会”。他耸人听闻地预言，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则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必为之破坏无遗”，“联合国组织必将会分崩瓦解”[①]。不过，在这份声明中，何应钦坚持台湾当局的一贯立场，坚持反对某些国家在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表明他认为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四）

当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时，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他预言“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将促成中共内部之全面混乱，而加速崩溃”。他忘形地在台北用电台直接向大陆广播，鼓吹“共军起义”，并信口允诺，如大陆沿海一带“起义”而请求“国军”援助，他们定可能在“六小时内，派遣大军驰援”。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应钦所主持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反常态，显得特别活跃，听取有关大陆的“匪情”报告，研究“国军”联合作战及训练、人事动员计划、后勤政策及计划、陆军作战与训练现状、海军训练与作战、空军训练与作战以及军需生产、治安与保防、中苏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共现状及未来发展等。举凡“反攻大陆”所需的国际条件及台湾自身的条件，都在何应钦的脑海里翻腾，都在他领导的委员会里争论。他天真地以为“反攻”在即，常常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兴奋中。

何应钦高兴得太早了，台湾当局赖以“反攻大陆”的后台美国开始改变它的对华政策。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打开和中国关系的大门，停止对华战争政策，转而寻求新的和平政策。尼克松入主白宫后，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传达他对改善美中关系的信号，如准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大陆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对美国的行动作出反应。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使白色的小球推动了“地球的旋转”。1971年夏，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26页。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后，宣布总统尼克松将访华，拉开了台湾当局“国民外交”大雪崩的序幕。

早在1970年召开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何应钦就为挽救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而唇焦舌燥，心力俱尽。他发表讲话，要求联大宣布中共多年来的所谓“侵略罪行”，“坚决摒拒其混入联合国并加以严厉制裁，以肃清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乱源”。他和妻子为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四方奔走，举行酒会，为联合国唱赞歌，并声称“中华民国”为联合国作了“重大贡献”。他于11月13日致电联大主席韩百乐及各会员国代表，呼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希望美国仍能采取一贯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立场。

然而，第25届联大的情形何应钦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以51票对49票第一次占了多数。但由于此前的第16届联大上通过了美国提出的，非经2/3多数票赞成，不得改变代表权的议案获得通过，第25届联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案仍未获解决。何应钦在起初的惊讶之后，又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外交”上的胜利和他呼吁的结果。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在纽约开幕，何应钦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当天，他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身份致电本届联大主席马立克及各会员国，除重弹老调外，认为“本届联大对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之辩论与决定，将为联合国前途安危关键之所系，呈请坚决阻止牵匪入会之阴谋”①。他已经为维持台湾当局窃踞中国在联大的席位而心力交瘁。10月24日晚，就在联合国即将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前一天，何应钦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盛大活动，台湾当局“副总统”严家淦、驻台的“外交使节”、美军驻台将领、联合国驻台人员及所谓“民意代表”千余人参加了酒会。在台北市艺术馆还同时举办“联合国创立经过展览”，介绍联合国发起与创立的经过及台湾当局对联合国的“贡献”、中共“破坏”联合国的“罪行”、台湾当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努力等，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企图影响联大表决的结果。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一周的辩论后，10月25日晚，联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90页。

大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同时决定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除出去。美国傻眼了，何应钦彻夜未眠。台湾当局参加联大的“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在辩论过程中已知大事不妙，在表决前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26日，蒋介石发表《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认为联合国已成为“罪恶的渊薮”，“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自己手中”，“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斗争，绝对不动摇、不妥协”[①]！

27日，紧随蒋介石之后，何应钦召开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的临时理监事会议，谴责联合国“排我纳匪”。他在声明中说：“联大此举无异引狼入室，自毁前途，势将导致此一世界组织的瓦解与世界局势的混乱。”他还引用蒋介石的“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却，不失望，不自欺，形势险恶，我们越坚强，越奋发”的话，自欺欺人地宣称台湾当局还能“突破难关，克服困厄，扭转形势，创造机运”[②]。然而，流水落花春去也，台湾当局“外交”大雪崩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蔓延开去。仅数月间，就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当局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返台。舆论界称台湾当局“外交部”为“绝交部”。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也公开哀叹自己对外几乎无“交”可“交”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最终不得不承认联大驱蒋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改变世界的一周”，2月28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签字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四次提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③]”何应钦“国民外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言论集》，转引自《台湾四十年》第135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92页。
③ 冬梅：《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第7页，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

交”的后台支柱已不复存在，这比台湾当局从联合国被驱逐更令人沮丧。

面对台湾当局“外交”的两大柱石——维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维持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都已折断的现实，何应钦采取了他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总能自我安慰、自我调适的办法，掩盖内心的痛苦。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公开场合的表演，真够得上蒋介石所标榜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他曾在台湾当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上说：联大驱蒋、尼克松访华，“表面上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受到挫折，但由于我们民族文化根基深厚，与夫六二年来的饱经忧患，特别是‘总统’洞烛机先，及时给予我们睿智而有力的指示，所以我们能在漫天阴霾的局势中，彻底觉悟，由此产生大无畏的精神……化险为夷，重开我们国家的新机运，及早完成我们的‘反攻复国’的任务”①。此刻的何应钦口里虽仍叫嚷着“反攻复国”，但心中未必没有想起蒋介石1950年就在《军人魂》的讲话中所许诺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空头支票，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他曾重复过多少遍的“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老调，已经是‘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其身待明年，万事皆已休’了！

往昔妥协巨头　今朝反日先锋

（一）

“台日和约”的签订与生效，并没有解决何应钦心中对日本有朝一日会抛弃台湾当局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忧虑。他虽然在“台日和约”生效后不止一次地宣称，这纸和约“已经在政治上为台、日两国今后经济文化的合作，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大道。是台、日新的合作关系进展的始基”。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何应钦的意愿为转移。众多的日本有识之士并没有因这项“和约”而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他们通过民间渠道，谋求与新中国接触。对此，何应钦十分敏感而又忧心忡忡。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98页。

1954年，他在接见日本赴台参加“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大会”观察团的渡边铁藏等人时，特别提醒日本注意：“在日本朝野方面还有人要讨好苏俄与中共，贪图现实小利，而昧于未来大祸。”他说：“共党国家的阵线是整齐划一的，我们自由世界要团结一致来和它对抗，自非有共信与互信不可。如果日本的反共立场不明确、不坚决，则在亚洲各国不能获得完全的信任，要收到紧密团结的效果，当然是困难的[①]。”

1954年12月，何应钦在《寄语日本朋友》的演讲中，散布中共“试图赤化日本”的谬论，以此提高日本人士的“警觉”。他说：“日本最大的危机，恐怕就在不能辨明敌友。”还说：“今日亚洲能够抵抗共产主义的，恐怕只有‘中华民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及泰国了[②]。”

然而，何应钦的“警告”并未能阻挡日中之间需要相互接触与了解的大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民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更趋密切。顺应这一趋势，1961年9月，周恩来外长以他超群的谈判艺术和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诚意，与日本自民党领袖松村谦三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曾经被严寒封冻的中日关系开始融化。对这一新的动向，何应钦只能故伎重施，诬蔑、恐吓再加淆乱视听。他说中共“一贯的以经济贸易为其政治渗透的手段，日本如一任与中共贸易继续扩大，则战后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将发生动摇”。“眼前日本国内若干组织为共产党渗透的情形，正和我们大陆撤退前夕一样”[③]。

1970年，正是台湾当局“外交”厄运降临之际，何应钦已嗅到了“山雨欲来”的风势。他以台湾当局“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与周至柔、谷正纲和该会的委员35人赴日本参加会议。日本方面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前首相岸信介及委员85人。会议的议长为日方的石井光次郎，台湾当局方面由谷正纲任副议长。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彭孟缉、日本外相爱知揆一、日众议院议长船田中，以及韩国的日韩合作策进会的代表与会。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何应钦在闭幕式的致词中说，台、日之间“国民外交”的任务，其重要性绝不低于政府的“外交”工作，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政府“外交”的先驱。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所达成的政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106页、1121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121页。

③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28页。

治与贸易的谅解原则，是“共产主义者国际阴谋的箭头，现在正对准中、日、韩三国合作的鼎足关系，开弓放矢。周恩来提出的四项原则，表面上只是贸易的条件，实质上却是一项政治的突袭，它不仅企图分化日本的工商界，破坏美日两国的合作，尤其要打击中、日、韩三国的合作”①。

1971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何应钦在其所主持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大会上声言：“如果日本朝野人士无视于他们国内媚共逆流滋长的情形，坠入中共威胁利诱、分化离间的陷阱，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希望日本有识之士……认清敌友，奋起消灭这股媚共的逆流②。”

正当何应钦张口“共匪邪说泛滥”，闭口“赤色暴力侵略”之时，台湾当局“外交”又面临中日恢复邦交的“地震”。

(二)

1972 年 5 月 30 日，蒋介石在一片“外交”颓势中连任台湾当局第五届“总统”，蒋又任命儿子蒋经国为“行政院长”，实现了台湾当局权力嬗替的关键的一着。为了冲淡笼罩全岛上空的政治阴云，台湾当局趁机大搞庆典，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纷纷派出代表团或特使赴台北，参加蒋介石的“就职”盛典。日本派出与台湾当局关系十分密切的岸信介为特使前往祝贺。

何应钦、张群这两位岸信介的老朋友被指派为日本特使的陪同人。何与岸信介私下谈及日本国内“亲共逆流”时慨叹“沉舟侧畔千帆过”。但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却表现得胸有成竹、气壮如牛，为蒋氏父子的权力游戏虚张声势。他在蒋介石“就职”这一天，发表《此时此地更需“总统”的领导》一文，文中称赞蒋介石“卓越的领导，坚定的支撑，睿智的判断和妥当的决策，一次次地扭转危局，转危为安，反败为胜……今后如何扭转世局，冲破难关，挽回不利的情势，都期待‘总统’明智的决策。故此时此地，更需要‘总统’的领导，才能满足全国同胞喁喁望治之情”③。何应钦心中也明白，他们对蒋介石的这种“喁喁望治之情”不过是望梅止渴。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274 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381 页。
③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401 页。



1973 年何应钦在台北接见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时合影。

台湾被昔日盟友接二连三抛弃的命运，有如陡滩上下泄的流水之难以阻遏。最令何应钦揪心般疼痛的，是他多年苦心奠筑起的台、日关系的“外交”堤防，已挡不住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滔滔洪流。当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即将组织新内阁时，何应钦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田中能洞烛当前国际风云中的“微妙关系”，坚持所谓“自由、民主、正义”的原则，维持“台日和约”所确立的关系。然而，何应钦的希望成了泡影。

田中首相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决定恢复日中邦交。他在自民党内特设了一个“日中正常化协议会”，与当时竭力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外交恳谈会”斗争，最终取得日本朝野的广泛支持。何应钦一反往日的亲日形象，置外交礼仪于不顾，大肆抨击日本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田中首相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要废除“台日和约”是受了中共的“诱使”。7 月 7 日，他借纪念抗战爆发著文攻击田中，他的这篇文章写成中、日文对照稿，分送各报刊登，并请台湾“新闻局”译成英、法文字向外广播，企图在关键时刻保住“台日和约”。田中角荣和日本政府并未理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步子正急速迈进。8 月 10 日，何应钦借“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 20 周年之际，发表了《忠告田中首相悬崖勒马》的演讲。他引述了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种种“恩德”，在“台日和约”签订前后日本政界要人关于加强日台合作的谈话，以证明田中首相谋求日中

关系正常化是“背信弃义”，是“牺牲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而上了中共“赤化日本”的当。这篇演讲发表后，在台北却也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台湾一些支持何应钦立场的人，还发起募捐，将何应钦这篇演讲稿改名《告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译成日文，印刷数万份，运往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及“领事馆”，以分送日本各新闻单位及公私机构，扩大影响，作最后的一搏。

这篇演讲稿，是何应钦去台后由亲日走向“反日”的标志。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日本应负一部分责任。其理由是：“国军因八年抗战疲惫不堪的时候，引起了大规模的叛乱，使之大陆沦陷，制造了今日亚洲动乱的祸根，其责任的一部分日本应该负责。”他还认为，按照《国际公法》的原理，“台日和约”的有效期应是无限的。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应一意孤行，单方面废止双边“和约”。他还攻击田中首相是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方式，公然巧妙地避开废弃“台日和约”和中共缔结友好条约，拿借款代替赔偿，在无形之中，让“日台和约”失败，想方设法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将受到“背信弃义”的指责，招来损“国格”及“中华民国”的一致反对，并失去世界的依赖[1]。

9月9日，何应钦借日本投降签字纪念日之机，对日本进行威吓，他说：“现在中共的统战工作，正在日本虎视眈眈。在日本和中共建立邦交之际，中共大摇大摆地进入日本……日本必将失掉前途，灾难将再次降临，落到悲惨的境地[2]。”

9月18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前往北京访问前夕，派特使椎名悦三郎去台北，向台湾当局通报。何应钦会见椎名悦三郎时，把日本国内一个被称为“联合红军派”的暴力团体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扯在一起，将《解放日本》的机密文件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这份秘密文件提出了“解放日本”分三个阶段：“第一期目标，和中国邦交正常化；第二期目标，形成民主联合政府；第三期目标，建立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国。”何应钦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在日本暗中流传的这份秘密文件与日中邦交正常化联系在一起。他煞有介事地对椎名悦三郎说：“中共叛乱革命工作人

---

① ［日］田中信一：《何应钦将军的对日观》，日本《海外事情》第25卷第12号，1977年12月出版。

② 何应钦：《在1972年9月9日受降纪日上的演讲》。

员，借口设立大使馆、领事馆、商务及文化机构等，何止千万地涌入日本，利用日本的过激分子、左派、青年学生、工人等，组织如像联合红军派的暴力团体，引起武装暴力革命。在其第一阶段，打倒田中内阁，想搞各派联合政府。第二阶段，用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方法，'破四旧，立四新'来破坏日本多年培育出来的好的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之成为共产的坏文化、坏制度、坏风俗、坏习惯。并且想彻底破坏日本的立国精神和高度繁荣的经济。第三阶段，搞一个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把日本搞成中共的附属国[①]。"何应钦编造的中国共产党"赤化"日本乃至"赤化"世界的妄语，椎名悦三郎自然不会相信。

1976年8月24日，随一个日本教育考察团到台北访问的田中信一会见何应钦时，何又向他谈起了上述中共"赤化"日本的三阶段。田中信一当时心想："何将军已经看了关于《解放日本》这种秘密文献，否则，中共'赤化'日本与'解放日本'的三阶段怎么大致和何将军的发言是一致的呢？"

(三)

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搭在弦上多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之箭终于射了出去。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经过双方多年努力终于变成现实。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样，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大施主，但为了谋求自身更远大的利益，美国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好，何应钦似乎想得通。可日本就不同了。何应钦认为，日本既与台湾同文同种、唇齿相依，他和蒋介石对日本都是有大恩大德的，日中建交对他们无异于"以怨报德"。更与他有切身利害的是，去台湾以后，何应钦"国民外交"的重点是日本。他不顾年迈，穿梭般地往返于台北与东京之间，为维持台日间的"外交"关系，可谓费尽移山心力，却只赢得：几个难友，半边相思，两方绝交，一腔哀怨。

---

① ［日］田中信一：《何应钦将军的对日观》。

何应钦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之有今日之独立、完整与经济发展，除了日本自身的努力之外，主要得助于蒋介石当年的“恩德”。他说：“日本战败后，由于蒋‘总统’以德报怨的宽大胸襟，日本方避免了分裂，使日本从战后的废墟能够迅速地复兴。如果日本当局真的对此恩德有感谢之念，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应同甘苦共患难[①]。”

何应钦所说的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恩德”概括起来有五点：一是日本战败后，蒋即发表“以德报怨”宣言，不把日本侵略者当敌人；二是他忠实执行蒋的宣言，对投降日军不以战俘对待，而以“徒手官兵”相待，并迅速将200万名日俘日侨遣送归国；三是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四是在开罗会议坚持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五是不派兵占领日本本土。

上述五点，前四点确有其事，第五点也不是无稽之谈，但却有一段故事：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战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应该以中国为主体，但蒋介石则提出应以美国为中心。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时，苏联要美、中、苏三国共同出兵，美军占领本州，苏军占领北海道，国民党军占领九州，后来，由于蒋介石拒绝派兵，苏联红军也就没能占领北海道，从而避免了日本战后如同朝鲜、越南、德国那样分裂。蒋介石未派兵占领日本，并非不想，而是不能。日本投降前，何应钦已在昆明装备、训练了一批美械精锐师，其中卢汉的一支部队拟战后出国，协助美军占领日本。日本投降后，这支中国占领军的先遣官也曾赴日联络。正当占领军准备出发之际，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而国民党军不敷分配，便令何应钦将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投入反共第一线，致令国民党占领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

中美、中日建交后，何应钦力持镇定，苦撑苦忍，幻想利用台湾当局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和日本的“亚东关系协会”，维持台日间的文化、经济联系。同时，他又常常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突然发起解放台湾的战争。他几次率领战略顾问们视察金门、澎湖防务。他也曾向蒋氏父子呼吁，要“加强国际宣传”，“实施反共精神教育”，放弃台湾一贯使用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提法，以免“民族”一词引发海峡两岸中国人同根同种的民族情绪。

---

① 何应钦：《在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第十一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1974年3月13日。

1975年4月，日本东京出现了少数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人所组织的“日本青年思想研究会”，主办了一个“恢复日台邦交国民大会”。何应钦闻讯后，像捕捉战机似的唯恐失之交臂，寄去书面讲话稿，主张“迅速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共同携手合作，完成反共、胜共、保卫亚洲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使命”①。

何应钦一直为拼凑世界性的“反共联盟”而奔走，结果总是劳而无功。1979年11月22日，他参加了陶希圣主持的台湾当局“中华战略学会”举办的东北亚地区战略情势研讨会，并在闭幕式上致词。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由前防卫厅长官、时任国会议员的金丸信率领，韩国代表团由前国防部长金用雨率领。会上，何应钦极力要求开拓区域性的反共战略合作，组成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北亚反共联盟”，但会上响应者寥寥，日本政府更不理睬。何应钦的过分执著，使他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仍抱着恢复台日“邦交”的幻想。1983年11月10日，他在日本《内外新闻》举办的会议上发表《中日关系与世界前途》的演讲，他说：“日本与中共继续交往，必将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只有与‘中华民国’恢复正常关系，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友人，开拓日本未来的前途。”他恳求日本不要再作“独善其身的战略构想”，必须与台湾携手合作，再联合全亚太地区的“自由国家”，才能确保亚洲安全及世界和平。

为了适应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形势，台湾当局提出了所谓“总体外交”政策。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台湾当局的“总体外交”政策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局部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势不两立”的立场，由原来坚持“一个中国，一个政府”转向追求对等地位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在具体策略上，采取了“变”与“不变”的弹性做法：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对外关系；在整体上不是依靠传统的“外交”方式，而是运用实质关系推动台湾的对外交往，以所谓“坚守民主阵营”为出发点，展开“多方位外交”。何应钦以往所坚守的“国民外交”虽因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大受挫折，但在新的形势下，他依然在台湾当局“总体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利用各种非官方的渠道，以“国民外交”推进台湾当局的“多方位外交”。在某种程度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442页。

上，可以说何应钦“国民外交”是台湾当局“多方位外交”策略的先导。

1987年7月6日，台湾各界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前夕，已经因病住进了医院的何应钦还发表讲话，发泄他被世界潮流所遗弃的愤懑。他在讲话中“正告中日两国人民，为了稳定亚洲局面及挽救亚洲危机，中日两国必须开诚合作，重整关系，共同承接下历史的新任务”。“中日两国经过八年血战，‘中华民国’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但结果徒使苏俄与中共乘机坐大，成为亚洲及世界的祸源”。纪念七七事变，何应钦耿耿于怀的当然还有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巨大贡献的田中角荣。称田中“一意孤行，撕毁中日和约，向中国再作出一次战败、两次投降的错误行为，不但引狼入室，更破坏了亚洲国家间的反共团结”[①]。

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分界，何应钦从昔日对日妥协甚至亲日的面目，一变而为台湾岛上反对日本谋求日中关系根本改善的带头人。有人说他成了“反日派”的头目。纵观何应钦对日观的发展变化轨迹，便会发现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既不是为了日本，也不是为了中国，甚至连为了台湾也说不上。以往，他曾甘心为蒋介石担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责，表现出对日妥协甚至亲日，而今又充当离间中日关系的说客，为了什么呢？不过是“反共”二字！

---

① 1987年7月7日台湾《联合报》。

四、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老兵

忙时常忆当年勇　闲来更感君恩深

（一）

蒋介石培植亲信时，常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作纽带，即非奉化人，也必出身于江浙，非血缘上的关系也得沾亲带故。然而，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却是以“学缘关系”，即同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培植出黄埔系而成为蒋的宠将。在国民党军中，要得到何应钦的重用，获得晋升，则必须是“穿着黄马褂，戴上绿帽子”，即出身于黄埔军校或毕业于陆军大学。

何应钦是权力崇拜的典型，他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求得功名利禄和维系主仆关系的平衡之术，曾令许多国民党官场中人为之折服。何应钦还有一个长处是别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望尘莫及的，那就是蒋介石给他什么位子他就掌什么权，一旦蒋收回这些权力，何应钦拍拍屁股就起身，连灰尘也不敢多带，更无需说结党营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也初衷不改。晚年的他，自知势单力薄，对蒋的依附性，对部属的谦和、对上下左右的礼貌周全，这些长期涵养出来的品性，更显得炉火纯青。

1950年的3月13日，是棉湖之战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总统”之名义“复行视事”的初始，亟须鼓舞士气，团结人心。这一天，何应钦举行酒会，招待当年参加过棉湖战役的袍泽，用回忆当年来给现实填补信心。陈诚、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等亲与是役的老将们都有口难言当年勇，何应钦发表《棉湖之战感言》的讲话，代表与会者表达醉翁之意。当时的何应钦是清楚的，美国几乎要抛弃台湾当局，国民党内部已经人心涣散，所谓“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据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本人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要维系人心，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把“反攻大陆”的歌一

直唱下去。蒋介石要唱，何应钦就得和。不过唱者自唱，和者自和，听者姑妄听之罢了。至于何应钦所说的冒险犯难的黄埔精神，早成过眼云烟，任你千呼万唤，再也不可能重回他们这批人身上了。

不知是何应钦自己的需要，还是蒋介石的需要，去台湾后的何应钦以其特殊的身份，经常在一些纪念性的场合，发表文章或演讲，俨然成了各种纪念日的“总发言人”。与其说是为自己寻找安慰，不如说是替蒋介石粉饰太平，抑或是双方愈合创伤的共同需要。除了台湾当局需要何应钦去装点门面的时候，他要说要写之外，每年的元旦献词、春节团拜、3 月 13 日棉湖之战纪念日、6 月 16 日黄埔军校校庆、7 月 7 日抗战纪念日、7 月 9 日北伐誓师纪念日、9 月 9 日受降纪念日、“双十节”、10 月 31 日蒋介石生日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会、茶会、招待会、各种团体的成立会、成立纪念会上，都能看到何应钦那老当益壮的身躯，听到他效忠蒋介石、坚持反共到底的旦旦信誓。他几乎成了“会议将军”、“礼仪总管”。被人称为“国民党陆军保姆”的何应钦，对台湾当局国民党军的军史文件展览陈列一向极为关注。每逢什么庆典时，“国军历史文物陈列馆”举行特展，何应钦都要亲临指导。展陈内容一旦有什么问题，他必不厌其烦地详为解说。何应钦在这些容易引起新闻界关注的场合频频露面和进行表演，除了表达自己对台湾当局的忠诚之外，也借此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持“党国”元老的尊荣。



1984 年 6 月 16 日在台北主持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60 周年酒会。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前后，台湾当局掀起了“效忠‘总统’运动”。何应钦一改过去的迂缓迟钝，敏感地意识到，他晚年的境遇，并不取决于他对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作用如何，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对他的好恶及信赖，或者说蒋介石对他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效忠‘总统’运动”中，何应钦是一个先行者，他似乎比别人对蒋介石的“英明伟大”有透彻的认识。姑且不论这认识出于理性加感情，还是情势所迫，他毕竟扮演了一个适合他身份的角色。

他经过几十年官场政坛的磨砺，又从反共的屡次失败之中，深信蒋介石曾说过的“没有我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是至理名言。蒋介石说此话时，是针对何应钦一时头脑糊涂，跟随桂系逼蒋下野而言，警告他既已委身，便不可朝秦暮楚。此话一出，当时令何应钦毛骨悚然，虚汗淋漓。20 多年过去了，再回味此话，却又甘甜无尽，成了何应钦 60 大寿时蒋介石所颁寿轴上的“甘苦共尝，安危同仗”八个字的注释了。何应钦的历史确也证明了“没有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反之，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作如是观：“没有何应钦，未必有蒋介石。”何、蒋之间这种微妙的机缘，实在难解难分。不过历史的聚光灯总是把它的明亮集中到蒋介石身上，何应钦只得了一点余光的辉映。对这种习以为常但并不公正的情况，何应钦视为天理。

（二）

如果说去台湾以前，何应钦主要是以他的实践活动来帮助蒋介石塑造形象的话，那么去台湾以后的何应钦，则主要是以他的语言文字在描绘蒋介石了。

1952 年 2 月 8 日，何应钦所发表的《“总统”行谊》的讲词，便是他描绘蒋介石形象浓墨重彩的开篇，也奠定了他在“效忠‘总统’运动”中充当信神与造神双重任务的基础。何应钦的这篇东西，发表在蒋介石宣布要在台湾实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四大总动员之时，目的诚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在这风雨飘摇、革命成败的关头，更要秉承领袖的意志，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挥，以进行艰厄困苦的奋斗”[1]。

---

[1]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231 ~ 233 页。

当然，要把蒋介石从一个败军之魁首塑造为决战决胜的神明，绝非优美动听的文词所能奏效，还必须从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践的种种方面，做好铺垫粉饰。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第二号人物的经历和身份，有的是这种机会。一年一度的黄埔军校校庆日，何应钦都可以毫无牵强之感，尽情挥洒地塑造蒋介石的神像。

1953 年 6 月 16 日，黄埔军校成立 29 周年，何应钦在《坚定革命军人信念完成反攻复国任务》的讲话中，把他对蒋介石的赞颂提高到系统的具有初步理论色彩的水平。他认为蒋介石不久前所说的“革命军人必要的信念，是主义、领袖、国家、责任和荣誉五者”，而这五者，便是黄埔军校建校的基础，是黄埔精神的源泉。何应钦将这五点作了具体阐释：

所谓“主义”，名义上仍然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台湾当局和何应钦等人在基本精神和本质的内容上作了改变。民族主义是为其“反共抗俄”服务；而民权主义，则是围绕台湾的“全民政治”、“法治主义”来实行；民生主义，则是围绕“合作互助的科学建设”来推进。

所谓“领袖”，何应钦认为是源于孙中山而传之蒋介石。这种承袭关系非偶然，也非世袭，而是由“主义”所决定的。“因为校长蒋‘总统’接受了国父首创的主义，继承了国父革命志业，所以我们便将这个领袖的责任，放到他的肩上”。

所谓“国家”，怎么冠冕堂皇，都脱离不了蒋家天下，但何应钦把蒋介石的“国家观念”附会成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事业。

所谓“责任”，何应钦认为便是“救国救民”的实践，也即是对蒋介石“国家观念”所应尽的义务。

所谓“荣誉”，何应钦解释为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先烈的荣誉所寄，也正是革命军和本校荣誉的根源”。

1953 年 10 月 31 日，蒋介石届满 67 岁。何应钦特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一文，除了叙述他与蒋介石共同参与并可引以为骄傲的东征、北伐、“统一”和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所表现的“伟大人格”外，何应钦还特别强调：“近几十年来，我们革命历史、民族精神、国家存亡，已与蒋‘总统’个人的人格，结合为一体”；“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而且具有政治远见”，尤其是他的“反共远见，远非世界政治家所

能企及”①。何应钦早已领教了蒋介石匪夷所思的“伟大的人格”，但他仍然像迷信法力无边的神灵一样迷信蒋介石，不，他害怕蒋介石才如此惶恐地奉蒋为神明。诚如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所说：“蒋介石却只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圣人的小人。……‘蒋介石的悲剧是这样，他想做不可能的事。”蒋介石的“动机完全从他自己出发。至于思想则必然剽窃别人的……他标榜过共产主义、英美的民主主义、基督教的精神，以及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粗暴的战略家、低劣的组织者，极糟的行政官”，“外国的奴隶”，一个具有“不稳定性格”的独裁者②。然而，对这么一个人，何应钦却拼命神化他，因为在为蒋介石贴金的过程中，何应钦也在为自己树碑评功。他常常借颂扬孙中山和黄埔精神、赞颂蒋介石时，顺理成章把自己捎带进去，不由得听者、看者不以嫡传正宗视之。

1965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百年诞辰，何应钦发表了《国父与本校》的长文，追述孙中山与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其深义更在引发他与蒋介石的亲密，称颂蒋在创办黄埔军校时的功绩。在这篇文章中，何应钦还将80年的“国民革命”划分为两个时期：前40年是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奋斗的时期；以黄埔军校创建为始的40年，则是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历届师生和国民革命军奋斗的时期。可见，在他心目中，蒋介石至少与孙中山处于并列地位，而他则是这两人的主要助手和追随者了。1981年4月5日，何应钦又发表《蒋公对唯物辩证法的真知灼见》一文。

何应钦身为蒋介石所倚重的老将，而不能在反共的第一线战死，已属不忠不烈了。他获得了国民党军的终身军籍，但其地位不文不武，又武又文，既不能去战死，也不会谏死，只得怀抱愚忠，专唱“赞美诗”去“纬武经文”了。

在何应钦一生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蒋介石让他主持了中国战区日本陆海空军投降的盛典，自谓是他“历史上无比光荣的一页”。在何应钦保存的照片中，有不少是他主持受降大典的。他最得意是的那张记录了伟大历史一瞬的冈村宁次向他递降书，而他起立接受降书的照片。照片上的何应钦双手平伸，接过由冈村宁次刚刚签字用印的降书。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250～251页。

② 《论蒋介石的成败》，台湾《自由时代系列丛书》第4号，第196～198页。

1969年4月，何应钦八十诞辰时，“副总统”严家淦等455人请画家林克恭绘制了一幅《何应钦将军代表蒋委员长接受日本降书图》的油画作为礼物相送，画面再现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日本降书时的情景。画家对何应钦与小林浅三郎的姿势作政治艺术的加工。何应钦矜持地站立，目光直视小林，微张两手；而小林则弯腰近80度，双手恭递降书，与当年的实况略有不同。送礼者为这幅画作了《图序》，序文除了应景的歌功庆寿及送画的缘由外，主要是追述了80年来何应钦的生平事迹。其中对抗日战争爆发至受降为止的一段是这样记述的：“……公以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民国）1927年晋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绾军政，翊赞枢机，划策帷幄，决胜算于疆场之间，转徭给赋，救危补敝，宵旰荩筹，而劳谦益著。欧美诸强，方抗德意，无暇东顾，任我独撑战局，而日军狃于东北之役，狂焰嚣举，潜师南进，爆发太平洋战争，侵入诸强，诸强始与我谋，连年抗战。公于（民国）1932年访问印度，配合盟军南救缅甸，击日军，大败之，以解英、美诸军之困。旋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柴戟昆明，部勒戎伍，反攻顽敌。（民国）1934年7月收复柳州、桂林诸地，设前进指挥所于南宁。8月向广州及雷州半岛进军而日本宣布投降。公转于芷江，主持受降事。9月8日节钺莅南京。9月9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公接受日本降书，扬汉官之威仪，苏亿万人民命，重复金瓯，贷遣降虏，光昭日月，猗欤盛哉[①]……”

1970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46周年纪念会，何应钦便把这幅油画转送给军校。当天，举行揭幕仪式。何应钦致词说，这幅签订降书的画，“是近百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总结算，也是我们军校同学牺牲奋斗的总代价，是我们‘总统’卓越领导的成功，是我们中华民族永不灭亡的象征，是我们‘中华民国’几百万三军将士和同胞们鲜血换来的光荣！我们要永远保存它，珍视它！”何应钦为什么要把别人送给自己的寿礼转送军校呢？他说：“面对这幅光荣的图片……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各位，要在这危疑重重的局面之中，重新振奋我们的黄埔精神，亦就是总统昭示的牺牲精神、团结精神和负责精神，才能在将来的反攻复国的战争中，重振我

① 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云龙契合集》第72～73页。

们国民革命军的声威，重新写下我们军校同学光荣的战史[1]！”

此后，年复一年的黄埔军校校庆，何应钦都要有所献词；年复一年的受降纪念日，他也会沉浸在往日辉煌的记忆之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别人早已听腻了的老调。天长日久，这类讲话，完全丧失了任何实际鼓舞人心的效用，只不过借纪念这些节日，使“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属好友得以聚聚。

对何应钦来说，他还有一个最高层次的社交场合，那就是例行不衰的国民党中央联合总理纪念周上。他只要不离开台北或住进医院，是从来不缺席的。特别是他轮值担任主席的时候，他除了对孙中山的崇敬外，更突出地表现他的名将威仪。1974 年，何应钦已是 86 岁高龄，在一次中山堂举行的国民党中央联合总理纪念周会上，他任主席。过去每次例会，都有一位政府的首脑人物作专题报告，时间均在 40 分钟以上，这次也不例外。何应钦端坐在主席位置上，神采奕奕，全神贯注，腰杆挺得比会场上任何人都要直，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年登耄耋。专题报告完毕之后，照例是由主席宣读党员守则。何应钦起立上前，底气十足、铿锵有力地宣读党员守则前言。由于他的腿部曾受过伤，再加上年老，不免有风寒宿疾，走路要靠手杖支撑。宣读党员守则时，手杖只能放置一旁。时间一久，渐感脚力不支，不免身体往一边倾斜摇晃。站在附近的司仪立刻上前准备搀扶，台下的听者也为他捏了一把汗。何应钦拒绝了司仪的搀扶，威严地说：“手杖拿来！”他从司仪手中接过手杖，立刻恢复了笔挺的立正姿势，带领出席纪念周的人员宣读党员的 12 条守则，犹如当年在黄埔军校领诵誓词一般。对早已熟读的党员守则，不少人不以为意，而对何应钦的表现，则人人动容，暗自敬佩。

怀旧主亦步亦趋 拥新君不越雷池

（一）

时间会改变某些积习，也会使某些积习日益顽固。在国民党统治时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518 页。

期，何应钦之于蒋介石，犹如总管之于主人，虽然不无猜忌嫌隙，但总体上却是信任放心的。到台湾以后，何应钦虽不能再充任当年的总管角色，以自己的心力、体能为蒋操劳，但礼多人不怪，香多神亦喜，何应钦便用自己的口和笔，为蒋介石重塑金身。每逢与蒋介石或与自己有关的具有纪念性的日子，何应钦几乎都要发表演讲或文章，忆往怀旧，阐释经义。天长日久，这种习惯便成了自然，时间渐长，他也增长了不少的“理论”功力。他已不再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实践蒋介石的理论，而是以自己的理论去弘扬蒋的精义。这一微妙的转变，始于去台之初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那些日子。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加强反共斗争，何应钦曾为蒋介石所写的《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等反共理论著作作过诠释，发表过心得体会加以宣传。为了使反共理论系统化，蒋介石“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和“怀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于1956年底完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30年经历纪要》一书的写作。1957年6月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现代史和对国民党统治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蒋介石采用全面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法，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并企图证明国共两党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能“和平共处”，抵制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抵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处理各种不同制度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何应钦为讨得蒋的欢心，出面请陶希圣、汪公纪主持译成日文，以台湾当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名义在日本出版。出版后，何应钦亲自将日本新闻社出版的报刊摘要呈送蒋介石审核。蒋阅后频频称是，认为还应译成别的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发行，以扩大其影响。

1977年，蒋介石已成故人，何应钦还著文称颂《苏俄在中国》“是一部揭穿共党军事、政治阴谋的宝库”。认为蒋在其手著的这部书中“详细列举共党军事战略的诀窍和统战策略，尤其批判共党‘和平共存’、‘议会斗争’和‘联合政府’等手段，直到现在，仍应为全世界反共人士共同研究的珍贵史料。尤其蒋公由经验累积而发出的名言，以及所作成的明确判断，更足资自由国家的注意与警惕”[①]！晚年的何应钦以口笔代刀枪，为蒋

---

① 何应钦：“‘总统’蒋公九秩晋一诞辰献词”，1977年10月31日。

介石的反共思想体系增砖添瓦，似乎想成为一个老有所成的“理论家”。其实，被认为“著述等身”的蒋介石，他的许多著作，如影响最大的《西安半月记》、《苏俄在中国》、《中国之命运》等，都是文学侍从之臣捉刀的。前者为陈布雷代笔，后二者为陶希圣捉刀。当然，其思想精髓自然是符合蒋之所思的。

何应钦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之能宠辱皆不惊，终能荣宠双全，在于他有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盲从乖巧。并非何应钦没有独立的思想判断能力，而在于他的“独立”，必须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在某些事情上，只要与蒋介石的主意不符，他心虽有异思而不发异词，欲有所举措而不敢动手足。更为高明的是，何应钦可以采取回避之法，以免招惹麻烦。

1962 年，原本对“反攻大陆”无信心的蒋介石，以为大陆迭遭天灾人祸，是“反攻大陆”的千载一时之机，且自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便先后派出 9 股武装特务或海上登陆，或空投，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何应钦却在此时率领《龙》剧到美国演出，“捷报”频传。10 月至 12 月间，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先遣队”的武装特务登陆后即被俘 172 人，其中包括所谓“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中校司令陈凤辉、中校副司令刘慕贤等；三纵队上校司令袁祖遂等；一纵队上尉副司令、电台台长黎明宗等。1963 年，蒋介石不死心，又派出武装特务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但均遭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或被歼灭，或被捕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遭到了沉重打击。为了重振国民党官兵“反攻”的决心与信心，台湾当局于 1963 年 11 月 12 日至 22 日召开国民党九大。会上研讨了“掌握‘反共复国’机势的方略”，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通过蒋介石连任国民党总裁，陈诚连任副总裁，何应钦等 144 位资深党员任评议委员，完成了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重组。

国民党九大以后，何应钦所承担的反共角色依然属于“动口不动手”。他深谙蒋介石在九大报告的精义而欲有所阐发。1964 年元旦，他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团拜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在‘总统’蒋公领导下一定能克敌制胜”，并声称九大的决议和提示，“是我们今后‘反攻复国’，争取最后胜利的指标”，给与会者打气。2 月 13 日，在台湾中央军校同学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何应钦又作为当然的主持人，把欢乐的联欢会变成政治的

鼓动会。他在致词中又说："我们在校长蒋公的领导之下，必能在十年之内完成复国建国任务，以达成国父在40年前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他并预言军校同学在今年之内，必"有一番特殊的成就"，为黄埔建校40周年献礼。然而，到6月16日黄埔建校40周年时，不唯军校，就是整个台湾当局在"反攻复国"方面都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实绩。"反攻"无望，反而更刺激了何应钦等人的乡情。就在这年，何应钦的老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逝世了。临终前，他写了诗句：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①]！

于右任也代何应钦等人抒发了"反攻大陆"无望后激起的思乡之情。

（二）

蒋介石毕竟反共有术，欺骗有方，于1964年12月发起一场"毋忘在莒"的运动，使沉湎于"复国"迷梦中的"志士"们去演出田单复齐的故事。这个"毋忘在莒"运动的由来，是1952年蒋介石为了鼓励金门前线的官兵，在金门大武山上题写了"毋忘在莒"4个字，以便作为日后"反攻"胜利的纪念。10多年过去了，诺言许下千千万，"反攻复国"的行动一再遭受沉重打击。金门、马祖前线的官兵，在台湾当局的鼓动下，效仿2000多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官兵，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终于恢复齐国的精神，借助蒋介石的题词，首先倡导了"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为了响应这一运动，何应钦在1965年中央军校的春节团拜会上强调："要确立战胜敌人的观念；不断充实战争的准备；奋发'毋忘在莒'的运动，并弘扬校训'亲爱精诚'的精神，团结一致，效忠领袖，确立新观念，开拓新机运[②]。"在这年的黄埔校庆纪念会上，又重弹"反攻"旧调，为"毋忘在莒"运动增加点声势。

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毋忘在莒"运动，响应者寥寥无几。与何应钦等

---

① 庞齐：《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294页。

的意愿相反，台湾当局军方的徐廷泽、黄天明等驾机飞返大陆，投入人民解放军空军阵营，使台湾当局十分尴尬，更令台湾当局和何应钦震惊的是前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于1965年7月18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何应钦与李宗仁曾经有过多年的交情，李宗仁归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全国人民的欢迎，对何应钦的身心不能不有所触动，他不理解李宗仁何以会投奔共产党。这些日子，烦闷焦躁的何应钦于公务、交际之余，回到家中，凝望着张静江书赠他的“长剑一杯酒，危楼万里心”的对联，忧思万种。他虽有许多闲职、闲事可消磨时间，却无法排遣心中的忧愁，他自饮失败的苦酒，在忍让与等待中去发现和开拓新的“机运”。

尽管何应钦忠实而卖力地为台湾当局“反攻复国”事业效劳，但人们对他的信任却不断下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对何应钦不信任的情绪，在1966年2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大会”选举主席团时，达到了奇迹般的高峰。2月5日选举主席团时，秘书处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共124名，然而却有15人临时声明放弃竞选。何应钦自信胜券稳操，且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选票。因为这次会议，不过是蒋介石选择过渡人物，为蒋经国的全面接班铺路、搭桥。所谓“国民大会”主席团，充其量是铺路搭桥时的工具，或许只是一种“民主”的摆设。就是在这种不起什么实质作用的主席团的选举中，既暴露了选举人对“万年国大”的戏弄，也反映出选举人对何应钦等失去信任。开票结果，主持选举的“国大秘书长”谷正纲得100票，而何应钦虽然当选，却只得25票，比张群、薛岳都少了13票，论资历、声望和为蒋介石立下的功劳，谷正纲、张群、薛岳都不能与何应钦相比。这种选票上的差距，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是台湾当局政治上层人心转移的某种反映。由此又引发一场会内会外的斗争，不少人替何应钦等抱屈，攻击谷正纲舞弊。何应钦却不愿卷入选票之争，向谷正纲祝贺，声称这也是旅台贵州籍同胞的光荣。这一插曲，因何应钦的虚怀大度而扭转了某些人对他的看法。人心的天平又再次向他倾斜。

（三）

1966年中国大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何应钦认为“反攻复国”的机运又来了。“文化大革命”10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以强化“反

攻复国”的信念。

1966 年 9 月 9 日，何应钦借受降 21 周年纪念，在台北中央电台的“中国自由之声”中发表对大陆军民同胞的广播讲话。他断定红卫兵运动是“使整个大陆面临一个新的毁灭性的斗争的开始”，为了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结为“全靠了中华民族 5000 年历久而愈新的民族文化”，并说：“由于我们这一文化的传统，使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人人都奋发忠恕的精神，不仅人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并且人人弘扬恕道，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共谋生存的发展。”他还鼓动中国大陆的军民同胞同他一道起来，维护“民族文化”[①]。

1966 年底，台湾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规定每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的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宣称：“实行三民主义，凭借传统人本精神与伦理观念，唤醒理性良知，消弭共产邪说，加强政治思想与经济反攻，再以全力进行致命打击[②]。”这一运动的发起，与何应钦多年所致力的“MRA”运动和“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活动在实质上接轨，何应钦好不得意，窃喜自己获风气之先，把“MRA”和“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工作纳入“文化复兴运动”的轨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既然是台湾官方发动的，何应钦当然不能执其牛耳，但何应钦在这一运动中绝不甘落于人后。1967 年 1 月，何应钦在“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员大会上讲话，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是“反攻复国”的有效途径。他说：“只有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才能消灭泛滥在中国大陆上的一股文化逆流，从而永绝亚洲赤祸的根源。”他还煽动日本朝野一致行动起来，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保卫东方的传统文化”，“以消除共产主义在亚洲的祸患”[③]。

1967 年 3 月 20 日，是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 50 周年的金婚纪念日，许多人事前曾张罗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何应钦却说要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说什么“国家”多难，个人之喜不足以庆祝，中国传统文化是讲求宁俭勿奢的。他只在家中以茶代酒，与夫人相互祝福。

---

① 何应钦：《对大陆军民同胞的广播讲话》，1966 年 9 月 9 日。
② 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第 107 页。
③ 何应钦：“在‘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八届一次会员大会的讲话”。

1967年7月28日，台湾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在岛上设立了许多推行“文化复兴”的机构，整理出版了许多古籍，既以反共为中心，同时又反对全盘西化的台湾世风。何应钦在这场运动中只能敲敲边鼓。

正值台湾全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喊得震天响，但应者寥若晨星，实绩无多之时，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又重提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案，获得蒋介石的赞赏。何应钦曾在1963年就提出过改建圆山“忠烈祠”的建议，但不为当局所理会，被委婉地以财力不济、难资兼顾为由挡了回去。现得蒋介石的赞同，何应钦大有知遇之感。

坐落在台北圆山公园内的“忠烈祠”，是台湾当局供奉为“党国”尽忠者享受牺牲香火之地，然而它却是日据时代的“护国神社”，建筑也还是日本式的，虽经改造，但显得不伦不类。加之年久失修，实在有改建之必要。一些外国访台者或旅游者到此游览时，无不以崇祀“国殇”之所，竟是日式建筑而诧异。

何应钦的改建议案一提，蒋介石认为此举是“复兴文化”的题中之义，十分重视，批示道：“何评议委员应钦建议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一节，应即行研究，迅予办理。”国民党中常会得了“御批”，也作出决定：“交‘行政院’主管同志切实研究办理。”有关方面研究的结果，认为圆山“忠烈祠”虽隶属台北地方管理，但事实上已代替“中央”的“忠烈祠”，实在有改建的必要。但工程浩大，经费需由“中央”、台湾省和台北市三方面共同筹措。如此一来，岂不又是1963年的结果？何应钦急了，又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郑重地陈述了必须改建的理由及其预为筹划的情况。此报告又转到蒋介石手中，蒋对“财政部”及“行政院”主计处之推诿搪塞极为不满，指示中常会：“类似国家宗庙之兴建，以其旨在激发军民精神，自亦不可忽视……此次何敬之同志建议改建台北市忠烈祠，以消除日人神社遗迹，表彰国民革命精神，确有必要。”“至其经费，可暂以三千万元为度”[1]。蒋介石的批示，由秘书长谷凤翔函转何应钦。于是，台湾“行政院”组成改建委员会，并聘请何应钦为主任委员，主持改建工作。于是，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27～1328页。

在喧腾一时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何应钦似乎有了一个名至实归的位子。

1969年3月15日，“忠烈祠”改建成功，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耗资实为5010万元台币。建筑物计有大门楼、钟楼、鼓楼、山门、回廊、烈士祠、先贤祠、国民革命忠烈祠等，堪称蔚为壮观。祠内供奉了自民国建立以后，在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共”、“讨逆”、抗战及所谓“戡乱”等役战死或所谓“成仁取义”者，其余非阵亡或殉职而有“功”者，则配祀附建的先贤祠内。这天，何应钦主持了竣工典礼，并率领参加典礼的文臣武将和台北各界代表，入祠向“忠烈”、“先贤”们敬礼致祭。自此以后，每年春秋二祭，定期举行，成为台湾的定制。

（四）

“忠烈祠”改建大功告竣，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却日渐冷落。这座庄严宏伟的“忠烈祠”，并没有起到原先预想的政治效果，倒是为美丽的圆山公园增添了一处新的景点。

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给何应钦的思想造成一些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因冷暖寒热需要更换衣装一样，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何应钦对蒋介石的称谓也需要改变。除官方通行的“总统”、“总裁”之外，有依黄埔系旧例，称“校长”或“蒋先生”的；有称“先知先觉的导师”、“光辉的太阳”、“无际的大海”、“国家永恒的重心”、“反共先知”、“中流砥柱”等的。为了适应“文化复兴”的需要，何应钦又把蒋介石称为“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

1967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80岁生日，何应钦发表了《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一文，称蒋为“三民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人”，蒋的思想“击溃了共产邪说”，蒋“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号召台湾军民在这位“导师”的统率下，向大陆进军。

1974年，蒋介石87岁。当10月31日这个习惯由何应钦发表专文祝寿的日子到来之际，他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名词给蒋介石编织桂冠了。但他并不放弃这种机会，不仅发表文章，还出版了专集为蒋祝寿。他把近年来替蒋歌功颂德的文章辑录成册，取名为《中国与世界前途》在台北出版。分赠有关人士，寓意蒋介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蒋是

决定中国命运和世界命运的“旷世伟人”。何应钦有感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花开已花落，“道德重整”更是黄昏的一抹残辉，“反攻大陆”的几度机运皆成泡影，为了重振反共的心理防线，于10月31日发表《加强心理建设为蒋“总统”寿》的文章，表明自己对蒋的信赖、拥戴至死不渝，并呼吁岛上的人们要牢记“当前加强心理建设的要点：第一，要坚定我们的主义信仰；第二，要复兴我们的文化传统；第三，军人、党员要率先倡导。如此，我们才能达成反共复国的使命，以为我们对‘总统’蒋公祝寿的献礼”[①]。

（五）

1975年4月5日，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人们都遵从祖宗流传下来的风俗，家人与亲朋好友约集一道，去祭扫祖墓，施舍新老亡灵。谁也料想不到，蒋介石这位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重要人物会在这天病情急剧恶化，于当夜11时50分离开了人世。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述：其时，“风云异色”，雷声激荡，大雨倾盆。何应钦已经入睡，忽被电话铃声吵醒，迷糊中得知蒋介石逝世这一预料之中但又觉得突然的消息。但他没有得到立即去士林官邸的通知，只好静候召唤。当何应钦应召去灵前时，一切均已安排就绪。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蒋经国、严家淦、倪文亚等打开了一星期前由国民党台湾当局副秘书长秦孝仪记下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②]……”宋美龄哽咽着，第一个在遗嘱上签了字。随后，蒋经国、台湾当局“副总统”严家淦、“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功亮、“监察院长”余俊贤等都颤抖着在遗嘱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次日上午7时，国民党台湾当局召开了紧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严家淦“依法”继任“总统”，并由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名流、宿耆组成治丧委员会。

4月16日，是蒋介石灵柩奉厝的日子。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堂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435页。
② 《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14册第203页

前，三军仪仗队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堂前，犹如雕塑一般纹丝不动，为蒋介石护灵。“国葬”仪式之后，何应钦木然地坐在送灵的车中，阵阵的哀乐和沿途送灵的人群，更搅乱了他早已杂乱的思绪。好不容易到了台北南部约60公里树荫蔽日的“慈湖”行馆。这座民居式的典雅建筑，是1949年6月从大陆撤退前夕，蒋介石去台巡视时落脚的地方，由于风景很像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所以蒋介石去台以后，便选择慈湖畔的这座院落改建行馆。蒋介石的灵柩被安放在行馆的正厅中。就像他生前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一样，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的大礼服，胸前佩戴着勋章，躺在黑色大理石的棺材中。何应钦等8位大员将国民党的党旗覆盖在灵柩上，表示这位国民党首脑统治的终结。

移灵仪式结束以后，何应钦步入行馆的厢房，蒋介石的寝室仍保持着生前的原貌。蒋生病住院前，何应钦不止一次在这里聆听过蒋的训示，也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在座椅间的茶几上，何应钦看见了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在便笺上以行书体写的“能屈能伸”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当时蒋介石无可奈何心理的写照，也道出了何应钦饱尝人世沧桑和幻灭后的沉痛。目睹此情此景，盈盈热泪不禁在何应钦眼里转动。他此刻忆起了移灵前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周联华牧师证道时所说的：“一位义人和信徒逝世之后，他的踪迹虽远，但人世的天空，仍有他的光所照耀。这种人，音容宛在，是永远不朽的，当他离去之时，他的身后还留下了许多代表他的人，来继续完成他的竟尽之志。”何应钦便是代表蒋介石的人之一。移灵的前一天，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一文。这篇文章，在4月6日至16日的“国丧期”中，台湾各报整版整版地发表的哀悼文章中，虽不显眼，但写法却有些与众不同。何应钦历述自1924年起追随蒋介石，始终如一，“并蒙指示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使其毕生受益怀念”。他“愿以有生之年，遵奉蒋公遗志，拥护政府，与我国同胞团结一致，相信蒋公的精神一定永远与我们常相左右，我们也终必能在蒋公的精神与我们政府的领导下，达成‘反攻复国’的最后胜利”①。这种既歌死者亦颂其继任者的一箭双雕之词，充分表现了何应钦“三代元戎”、“一门忠仆”的身份。

---

① 1975年4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

何应钦还撰写了一副挽联，敬献于蒋的灵前：

追随逾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家人，两语忆亲题，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弥感深知蒙重任；

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勉奋起，团结自强，中兴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一直沉浸在对死者的怀念与尊崇之中。在他的客厅中，悬挂着蒋介石生前亲笔题写有“敬之吾兄惠存”字样的照片。蒋介石在照片上笑容可掬，丝毫看不出那反复无常和装腔作势的性格。凝望着这帧照片，他的感觉似乎与宋美龄的感觉近似：“现在独对一帧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作静祷，室中沉寂，耳际如闻謦咳，余感觉伊乃健在，并觉随时在我身边[①]。”

何应钦在他追忆蒋介石的文章中提到，平生他引以为荣的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隆，信任之专，付托之重，关爱之殷”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任命他为军政部长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与日本关东军和特务机关周旋，签订了《塘沽协定》，又进行了人们俗称为“何梅协定”的谈判交涉，遭举国一致谴责时，蒋出面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和舆论压力；二是日军攻至贵州独山时，贵阳危急，重庆震动，蒋派他连夜赶赴贵阳，坐镇指挥；三是让他主持日军投降盛典，使他的军事生涯达到了辉煌的峰巅。遥想昔日的繁华，面对眼前的茫然和既不能再给他荣宠，也不会再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蒋介石的照片，何应钦心中涌起了基督教追思礼拜上通行的那句祷词：“蒙主恩召，愿你的灵魂平安到达天堂！”

作为孤臣之一的何应钦，谨记着国民党中常会的决定：灵柩暂厝慈湖行馆，“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而作为孝子的蒋经国在奉厝仪式后的答谢词，更使何应钦百感交集。蒋经国的谢词说：“先君崩逝，野祭巷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情，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

---

① 李恒：《宋美龄传》第298页，台北天元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我国同胞之至诚与愿望[①]。”何应钦想到自己没有亲生子女，百年之后，连孝子都没有，一种膝下凄凉的莫名忧惧涌动起来。

（六）

在蒋介石死后的23天里，蒋经国通过娴熟的政治手腕，事实上已将台湾当局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成了台湾岛上的头号人物。何应钦认为蒋经国头脑精明，气度超凡，其才智不逊于乃父，自然可子承父业，执掌中枢，他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转移到蒋经国身上。

1975年4月28日，在台湾当局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代“总统”严家淦顺风张帆，率先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主席，并不容反对者稍有余裕，以起立方式表决。会议修改了党章，宣布国民党党章中保留“总裁”一章，犹如“总理”的称谓是对孙中山的纪念一样，把“总裁”的名称，永远留给蒋介石独享。此议虽由别人先提，但正中何应钦下怀，他抢先附议：“在当前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关于本党领导人的职称问题……本席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本席拥护推荐蒋经国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案。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来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②]。何应钦的这番拥戴，使蒋经国对尊敬的“何敬公”的感情又增进了几分。

1975年7月17日，日本产经新闻社连载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一周年。该社社长松本龙二、常务董事兼出版局局长小野田政等4人专程赴台北举行纪念酒会。何应钦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身份接见了松本龙二一行，盛赞他们在《蒋“总统”秘录》中写出了蒋介石的“伟大

---

① 《蒋公崩逝丧厝纪实》，《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长新》1976年5月版。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444页。

精神”，“揭露”了俄共和中共的所谓“罪恶”真相。当时，正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大步迈进的时期，何应钦借机警告日本政府：“切勿迷人不归点”，应立即从中共的“迷惑”与“引诱”中“改邪归正”。

台湾当局因蒋介石遗志的核心是“反攻复国”，便将他的生日定为“莒光日”，纪念他“勿忘在莒”的苦心孤诣。10 月 30 日，为纪念第一个“莒光日”，何应钦在台湾“中央电视台”向国民党官兵发表讲话，要他们努力实现蒋介石遗嘱中的“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的“四大指标”。

1976 年 4 月 2 日，蒋介石逝世周年前夕，高雄澄清湖畔蒋介石的铜像落成，何应钦前往主持揭幕典礼。4 月 5 日，他发表《怀民族领袖，忆对日名言》的文章，追忆蒋的“功德”。从此以后，何应钦发表纪念文章或讲话，又增加了纪念蒋介石逝世的内容。

何应钦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自然会有回报。1977 年 1 月，日本产经新闻会董事长植村甲午郎和产经新闻社社长鹿内信雄率代表团到台北，为《产经新闻》连载《蒋“总统”秘录》完成举行祝贺会。植村会长和鹿内社长与何应钦等会面时，提出在日本兴建中正堂，作为对蒋介石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并展示了中正堂的设计模型。台湾当局与产经新闻社商谈的结果，选择在日本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下郡箱根町二之平“雕刻之森”美术馆境内建筑中正堂，以此表达日本方面对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深仁厚泽的永久怀念。何应钦被推举为台湾方面筹建中正堂的负责人。

蒋经国接班之初，何应钦身膺重任，忙完死人的纪念又操劳活人的继任。在 1978 年 2 月召开的台湾当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何应钦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了 3 月 2 日的第二次大会。他在当天的总结发言中为蒋经国当“总统”预为鼓吹，他强调“行政院长”蒋经国施政报告的要点，是在“以坚忍刚毅面对一切事实挑战”，是强调政府“保卫中华文化，贯彻民主政治，积极充实国防，继续努力发展民生建设”的四大决心。他认为：“蒋院长强调我们‘稳扎稳打，实事求是，慎谋能断，力行奋斗，打开出路，迈向光明’。这正是国家在对匪作战的重要关头，最平实而且最负责任的做法，使我们对政府增加了无比的信赖，确信在如此坚定、勇敢、负责的政府努力下，必定能号召结合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友

人的力量，获得自由、民主、正义的胜利[1]。”

3月21日台湾当局举行“总统”选举。到会的“国大代表”1203人，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第六届“总统”，谢东闵以941票当选“副总统”。

“国民大会”刚刚收场，何应钦对蒋“总统”经国先生的祝贺之声尚有余音，他又接到了鹿内信雄邀请他赴日，参加中正堂落成典礼并在揭幕式上主持剪彩。

（七）

箱根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那里的“雕刻之森”美术馆，是在一片风景优美的山坡上，集中了世界各国的雕塑精品，有金属的、石质的、木质的、石膏的，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著名的室外雕刻艺术馆。坐落在那里的中正堂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一、二层展出蒋介石的生平资料，三层是贵宾室，并备有日本天皇驾临参观时的起居处。

何应钦接到邀请后，与台湾有关方面一再磋商，并呈请蒋经国核准，决定把蒋介石的佩剑一柄、宋美龄的画册一套4本、蒋介石一生所留下的墨迹的全部复制品、蒋介石各时期的历史照片100幅、蒋介石的全部著作及各国文字译本送展。何应钦为了表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尊崇和怀念，以及对产经新闻社的感激，特别不假手幕僚，独自沉思默想，题写了“义无反顾，仁者无敌”的八尺中堂一幅，并在条幅上又加跋：“鹿内信雄先生，于箱根町二之平雕刻之森美术馆境内，兴建中正堂，纪念‘总统’蒋公崇仁尚义之盛德，实含有弘扬中日文化之重大意义，特缀此二语，以资景佩。”下款的署名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2]。何应钦还特别要求对方将这幅中堂悬挂在中正堂一楼大厅，以便参观者一进门，便看见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及他的职衔，以便在日本这个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重扬起“中华民国”的招魂幡，产生超出中正堂建立之外的政治意义。临行之前，何应钦又请中外驰名的画家张大千、蓝荫鼎、高逸鸿、黄君碧4位，各绘巨幅国画一帧，商请对方布置在三楼的贵宾室内，以增添中华文化的气氛。至于他所带去的展品，也要求对方将蒋介石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488页。

② 何应钦：《日本纪行》，《中外杂志》第24卷第2期第24～25页，1978年8月出版。

的佩剑和宋美龄的画册，永久性地陈列在二楼展品室，其余东西则轮番展出，以添新鲜感。何应钦所带去的展品，重达1000多公斤，他谓之“礼重情亲”。

4月3日，何应钦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日本参众两院部分亲台议员及有关人士500余人前往欢迎。何应钦在台日“绝交”后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感动，深信自己多年来所从事的“国民外交”并非徒劳。

中正堂的落成典礼分两部分进行：4月5日上午，以日本古代祭神仪式，举行“竣工修祓式”；下午才举行揭幕典礼。鹿内信雄首先致词，宣告中正堂的落成。然后由何应钦举行赠剑仪式。那柄曾经佩戴在蒋介石身上的利剑，经何应钦的双手捧上，递到了鹿内信雄手中；鹿内也如捧骨灰盒般地庄重，将它放到陈列室预留的展览处。然后，在500余人的鼓掌声中，何应钦剪彩，人们蜂拥入内，首先想争睹一下被何应钦称为“国宝”、鹿内信雄称为“仁者之剑”的蒋介石的佩剑。

在三楼的贵宾室里，何应钦这位被日本右翼势力称为“救命恩人”的老人被记者们围得喘不过气来，仅是供记者照相就花费了半个小时。特别令何应钦感兴趣的是，当天夜里在箱根“龙宫殿”旅舍举行晚宴时，何应钦便欣赏了当天中正堂揭幕典礼的电视新闻，目睹了自己的风采。新闻播出以后，不断有从日本各县、市打到“龙宫殿”的长途电话。这是当年那些受到何应钦“特殊优待”后回到日本的日俘、日侨打来的。他们得知这位“亲日老人”来到日本，便通过长途电话表示感激之情。最使何应钦动情的，是一位当年由上海遣返归国的日本老太太，特别自制了一根山藤手杖，送到旅社给何应钦，嘱咐他一定要使用，以免忘记了他的遣返者们。

（八）

何应钦此行的目的，虽说是参加中正堂的落成典礼，但台湾当局和他本人都有主题之外的内容，企图借此机会，拉拢日本反华亲台势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再度制造地区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连锁的“东北亚反共联盟”。在日本逗留的一周内，何应钦先后参加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在自民党总部举行的酒会、日本自民党副总裁船田中的午餐会，还到前首相岸信介家中晤谈。双方交谈的内容都紧紧围绕如

何加强台日关系，共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何应钦看来最为重要，而事实上是在国际惯例中表示他的访日“名不正、言不顺”的一次会面。

那是4月7日下午5时半，何应钦应邀参加老朋友日本前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夫妇的钻石婚纪念会。酒会中，由于中日邦交已经正常化，身为日本国首相的福田赳夫虽然是何应钦的老相识，但他不能违反国际惯例，单独接见何应钦。于是，选择了石井光次郎夫妇钻石婚纪念酒会，作为偶然巧合的私人会面。石井光次郎有意选择了何应钦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孔雀厅举行酒会。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酒会，日本政界及各界人士约2000多人参加。孔雀厅的中间台下，只安置了半圆形的餐桌和三个座位。何应钦的客位居中，福田首相主陪居左，福田夫人右陪。据何应钦自己说：“福田首相与我晤面交谈，非常自然亲切；当我入座之后，他十分客气，始终陪在我的座位的左方。”石井光次郎讲话以后，福田和何应钦先后致祝词。何应钦致词完毕后，福田即起身离去。

在酒会上，何应钦又抓住机会与日本众议院议长保久茂晤谈。当天晚上7时半，自民党元老11人代表自民党宴请何应钦，把何应钦的随行人员另外安排在别的房间，使他们能与何应钦在秘密状况下坦率地交换意见。何应钦向这些坚持反共的自民党元老们，重申了自己坚决反对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所谓“坚定立场”，希望这些保守的元老们在对台湾极为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对调整日本和中国台湾关系，保障日、中国、韩、台湾共同安全及亚洲反共事业充分发挥作用。

4月8日上午8时至10时半，何应钦屏去随员，单独与对方不愿透露姓名、何应钦也不公开其身份的两位在日本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见面。双方“从经济合作谈到共同安全”，对于中国台湾、日、韩“必须共同防卫的问题”，何应钦根据他的战略理论指出“日本绝不可能独行其是”，不能冀望以联合中共遏制苏联，须知联合中共可能增加日本的灾难。他又向这两位老朋友赠送了他的“警世箴言”，分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所谓“利害”，“希望他们了解自由国家共同的需要，停止对中共谈判签约”。

在与日本政界领袖的所有会谈中，何应钦都“本着个人应尽的责任，把握每次会谈，充分表达个人对世局、对中日两国实质关系、对东北亚与

亚洲的共同安全提供意见”①。

在日本期间，何应钦还应“亚东关系协会”的邀请，与东京、横滨的华侨会面。何应钦对旅日华侨鼓吹中日建交，台湾已面临严重危机，而台湾当局坚持反共、反对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还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当局“扼守台湾海峡，屏障西太平洋门户战略位置的重要”。吹嘘“此一战略基地，不仅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土的安全，更对日本形成侧翼防卫。大韩民国据守朝鲜半岛，不但足以阻遏北韩和中国大陆共党势力的南侵，更能牵制由千岛群岛经海道威胁日本右翼的共党势力。中国台湾、日、韩合则成犄角之势，以三国的互相策应，加上日本雄厚的后勤支援，足以粉碎国际共党的侵略，维护三国的共同安全；分则处处可予敌人乘隙而入的机会，必为共党势力各个击破”。他鼓动旅日侨胞与日本反共势力团结起来。“一致敦促美国放弃联匪制俄的幻想，重新考虑撤退驻韩美军的计划，并且发挥协调联系的功能”，使台、日、韩“基于共同安全的需要，在对抗国际共党暴力侵略威胁上，排除一切障碍，密切团结合作，维护亚洲的自由与安全②。

4月8日，在王山饭店举行的午宴上，何应钦不惮烦剧，又对赴宴的日本各界代表及旅日侨胞重申“台、日、韩应从速建立共同安全体系”，并且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违背世界潮流的所谓“新的国家观念”，“希望在当前多变的世局，各国的政治家，要从速培养‘国家安全重于国家经济利益’的新观念”。他希望以此“新观念”作桥梁，在各国与台湾当局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仍能经由第三者的协调，与双边防卫关系的联系，共同携手，对抗潜在的共同敌人。

4月8日，在日本“中华总会”与东京、横滨各侨团、台湾旅日同乡会联合举行的晚宴上，何应钦又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说，回顾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提出而主要由他具体执行的“以德报怨”的四项重要措施，强调其中放弃了总数达500多亿美元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日本对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赔款总数仅有15亿美元，从而使日本经济力量全部用于战后重建，日本才能有今日的繁荣。何应钦还编造了各种台湾当局必能

---

① 何应钦：《日本之行》，《中外杂志》第24卷第2期，第26页。
② 何应钦：《日本之行》，《中外杂志》第24卷第2期，第28页。

"光复大陆国土"的条件。说到兴奋处，他情绪激昂，仿佛这总攻的动员令即将由他发出似的。受了这位反共老将的感染，一位反共成瘾的先生由台下冲到台上，发疯一般扯起嗓门大声喊道："全体肃立!"并带头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制造了何应钦访日最富戏剧性的高潮。何应钦返台以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向台湾当局"总统"蒋经国呈具如下三条建议：

第一，台湾要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关键性地位，加强与台友好的日本政界人士的联络，尤其是要建立与日本青年国会议员的情谊，以促使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增进，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第二，台湾应增强与韩国的"邦交"，在对抗苏联与中共的共同需要下，强化台、韩间的双边防卫关系，进而促成东北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共同安全体系。

第三，台湾当局要敦促美国发挥协调联系的功能，以苏联和中共为目标，以实力排除来自苏联及大陆的威胁，为美国本身及亚太地区"自由国家"的共同利益，促成亚太地区自由国家对抗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何应钦通过此次访日的机会，既报答了蒋氏父子的知遇之恩，又以驾轻就熟的"国民外交"手段，推进台湾当局的"实质外交"，扩大了他企图建立东北亚及亚太地区反共联盟构想的影响。他的不少"反共战略"和"外交策略"为台湾当局所接受，他的"战略顾问"似乎名副其实了。1979 年，蒋经国发起成立"中华战略学会"，有鉴于世局之激变，"国步方艰"，希望能以战略研究达成"学术报国"目的。为了表示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尊重，蒋经国聘请何应钦担任学会的名誉副会长。

祝大寿欣慰元老　颁特勋安抚众心

（一）

在蒋介石时代，每逢何应钦的大寿，蒋均有所表示。此中的原因，除了蒋与何的特殊关系外，蒋要借给何应钦庆寿，鞭策他为自己更好地效劳，同时也激励他的同僚和部属，像他那样矢志尽忠。

1939 年 4 月 2 日，何应钦五十大寿，鉴于抗战吃紧，陪都新迁，百废

待举，何应钦不敢庆祝。但蒋介石没有忘记，挥毫写了一个“寿”字以示祝福。抬头是“敬之同志五十大庆”，落款是“蒋中正敬祝”。

1949年3月12日，何应钦届满花甲，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在溪口写下了“安危同仗，甘苦共尝”意味深长的寿轴，让何应钦至死难忘。

1959年3月21日，何应钦进入古稀，时值台湾政局渐趋稳定，经济也开始起步，“反攻大陆”的鼓噪也随之高涨。蒋介石写下了“同舟共济”四字祝贺，上款写上“敬之同志七十大庆”，下款署“蒋中正敬祝”。蒋介石虽期许“同舟共济”，但他却无所济于何应钦。大约有感于元老们被冷落，为何应钦七十大寿题诗作画者特别多，也各有旨趣和弦外之音。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素来钦佩何应钦，为何应钦的七十寿诞题诗一首相赠。诗中写道：

> 浩浩复肫肫，时贤莫比伦，
> 昔经北山下，道左一平民。
> 寿见降人祝，交因弟子亲。
> 中兴元老壮，乐道不忧贫。

附缀“敬之上将七十大庆于右任恭祝”。

以诗词祝寿者大有人在，但何应钦独偏爱这首，除了个人私交甚笃外，诗中道出了两桩鲜为人知的旧事。为了让别人明白此诗的旨趣，何应钦在事后作了一跋语，加以注释和谦谢：

> 钦既迁台之明年某日，自卓山返台北，而车不能进，乃策杖行于榛莽间，为三原老人见我而载之归。越数岁，七十初度，承惠瑶章，颈联即志此事。腹联以日韩之谊相饰。“交因弟子亲”之句，由于韩使金弘一为钦长贵州讲武学校时及门。其时化名王雄，人鲜知者，三原遇钦素厚，此诗奖许过甚。览之滋愧。夫乐道安贫，固所夙励；然浩浩肫肫，钦曷敢妄企先贤哉！ 己未春，应钦谨跋[①]

① 《云龙契合集》第90页。

作为何应钦的西南同乡和志同道合的良友，张群也写了两首诗，一祝何应钦七十初度，二祝何应钦、王文湘结婚五十二周年。

第一首写道：

浩荡盘江漱涤深，云腾溥作九州霖。
七旬上寿开新纪，二月当春惬好音。
辅国久知须柱石，收京重待启山林。
郊垌小队看行猎，省识平生射虎心。

这首诗的末联宜“正面文章反面读”。其中明是称赞何应钦去台以后，打猎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但时移境迁，当年打猎的乐趣在戎马倥偬之余寻求刺激和轻松，而去台以后的行猎，却是转移心中的烦忧，因厌苦党争政潮而寻求山林野趣的恬淡闲适。不过，论行猎的水平和实绩，在台湾的国民党要人中，何应钦的打猎队几乎可以与杨森的打猎队相伯仲。

张群的第二首诗写道：

结契苔岑笃不移，艰难军国共驱驰。
每缘雪虐风饕候，益显松贞竹劲姿。
同列又联鸳鸯侣，双栖相贺凤凰枝。
宾筵酬献多鸿藻，桃熟千年正此时①。

这首诗中，道出了王文湘之为人妻，克尽妇道，与何应钦反共志同道合，为何应钦在官场中排忧解难的情况，认为这是他俩“双星并耀”的基础。

与何应钦同为黄埔系“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自从军以来多在何应钦手下，无论内战外战、官场政坛、冷暖寒热都与何应钦感同身受。去台后同样被打入冷宫，成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陪伴何应钦坚守冷衙门，自然感慨良多，希冀何应钦东山再起，自己也可重新风光，所以他的祝寿诗述往与瞻前并重：

---

① 《云龙契合集》第94页。

黔灵瑞气自天申，五百年间诞哲人。
开国勋名光日月，匡时肝胆尚轮囷。
曾专节钺经千战，每系安危在一身。
今日中原犹板荡，待公筹策靖烟尘[①]。

一些致词祝贺者，更以何应钦不以功高而踌躇满志，而几渡重洋，讲求“道德重整”，学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基督“舍身救世”，学释迦牟尼“发大悲心拔众生苦”，何应钦几乎被捧为圣人。

1969年3月31日，何应钦八十大寿，蒋介石又写了一个“寿”字相贺，所不同的是抬头为“敬之主任委员八秩大庆”，署名“蒋中正”，并加盖了一方印，更显慎重恭谨。“副总统”严家淦与张群、孙科等455位军政要员，请画家林克恭绘制了何应钦接受日军降书的油画，并为之作序，不仅在旌表其功，更在激其奋发忠勇，为台湾的“中兴”再任驱驰。序的后部分写道：自大陆败退，“我政府越在东陬，日以光复大陆为务。公总领顾问，从容咨度，规划战略。今岁春二月中浣之吉，为公八旬悬弧之辰，牧野鹰扬，犹是尚父神采。朋旧宾僚及门弟子，谋为庆颂之宜，乃浼林克恭君绘公代表蒋公接受日本降书图，具姓名于次，籍介眉寿，且券中兴伟业之成。夫一图曷足以尽公生平，冀人人仰斯图也，缅想往烈盛德，穆然兴起。世人观斯图也，鉴于军旅艰难，而征得道多助，于以窥公寿身寿国寿世之义，以合于诗人戬谷九如之颂，公其笑而许之”[②]。

何应钦主持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推王家棐撰稿，由钱大钧撰书寿序。何应钦任会长的“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也撰写寿序相赠。似乎要对何应钦的八十寿诞有进一步的表示，在4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何应钦一生坚持不写自传，据他自己说，没什么好写。其实，可写和值得写的东西太多太多。八十大寿时，他写了《八十诞辰感言》，对外界关于他拒绝写自传的事儿谦虚至极地作了交代：“我个人极平凡，过去30

① 《云龙契合集》第103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51～1352页。

多年，对于党国有一些贡献者，不外下面三点：第一，得蒋‘总统’的信任；第二，将士用命，上下一心，精诚合作；第三，每担任一要职，必选优秀之幕僚相助①。”如照此三点写来，还有什么自传可写？不过，从上面总结的这三点中，可以看出“武甘草”的性味，上下左右、尊卑贵贱处处照应周全，无一遗漏。当然，何应钦坚持不写自传的原因，并非纯粹出于谦虚，而是有许多苦衷不能与外人道，不如身后任人评说。

（二）

1979年3月11日，是何应钦的90大寿，台湾当局专门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办理祝寿表功事宜。为了表彰这位对蒋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元老，这天上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正厅中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将台湾当局给军人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奖给何应钦。这是一枚金质的八角形勋章，中心圆环中以蓝天、白云为背景，岩石上兀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鹰。在勋章证书上，有如下文字：

> 兹以“总统府”战略顾问何陆军一级上将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五十余年来，凡北伐、“剿匪”、抗战迄今戡乱，无役不从，殚精竭虑，保国卫民，或戮力疆场，指挥决胜，或运筹帷幄，克壮勋猷。特颁国光勋章，以表国家崇酬功勋之至意②。

在这份证书上签名的有“总统”蒋经国、“行政院长”孙运璇、“国防部长”高魁元。

授勋之后，蒋经国亲自斟上半盏红色的香槟酒，向何应钦道贺。何应钦于受勋后发表声明：“这项殊荣，首应归之最高统帅先‘总统’蒋公的领导，次则应为我全军将士共享③。”

下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俱乐部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喜气洋洋。进门处高悬着“捍卫党国”的奖额。这幅长约3米，宽约1米的锦缎横幅，是何应钦参与指挥“龙潭

---

① 倪抟九：《何应钦上将传》，第66~67页。
② 《云龙契合集》第15页。
③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514页。

大捷”的奖赏。1927年9月，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共同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七等军，在龙潭之役中打败孙传芳的主力，既解了南京之围，又为后期北伐的全胜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特制了这幅奖额颁赠何应钦。



何应钦九十寿诞时获蒋经国颁授特勋后握手之情形

奖额之上，是仙鹤凌云的图案，衬托着“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门墙两侧均饰以鲜花彩绸，旁立一高约3米余的寿星像。大厅正面设置寿堂，堂上高悬红纸金字的“敬之先生九秩华诞”的巨型横幅；横幅下鲜花簇拥着“寿同金石”匾额；正中是一巨大的圆形“寿”字。寿台设在鲜花之前，台子正中旋转着何应钦所获“国光勋章”的证书，寿台左侧竖立着蒋经国所赠的寿轴，上书“松柏不凋于岁寒”，落款署名：“晚蒋经国”。寿台前饰以100个不同写法的“寿”字的“百寿图”。台前右侧的圆案上，高耸着宝塔一般，高约2米多的蛋糕；左侧是讲台。讲台左侧摆着2把太师椅，一为蒋经国席，次为何应钦位。

茶会开始前，蒋经国、严家淦、谢东闵、孙运璇、张群、谷正纲等率领台湾各界要人一齐步入寿堂；会场上的1000多人起立鼓掌，何应钦春风

满面地从座位上起立致敬。众人趋近何应钦面前，如众星捧月般地拱手道贺。何应钦身着崭新的戎装，胸前佩戴着当日上午所获得的勋章，笑容可掬地应接着盈耳绕梁的称颂。



何应钦九十寿诞时台湾画家所赠之受降图

蒋经国未执掌大权的那些年，因何应钦与他的老师、挚友陈诚有嫌隙，对何显得有些怠慢。时光流逝，何应钦失势而陈诚腾升，嫌隙渐消。当了党主席和“总统”的蒋经国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相会，对何应钦都执晚辈礼。也许，精明的蒋经国从何应钦待人处世中奉行的“礼多人不怪，尊己先敬人”的态度中学到了广结人缘、和睦左右的诀窍。

蒋经国主持茶会并率先致词。这篇祝词从台湾当局的立场出发，对何应钦的一生作了“隐恶扬善”的概括；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何应钦所起的作用虽奖誉过甚，但却能帮助人们了解何应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可窥视致词者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特殊心态。他说：

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欢欣。

敬公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敬公革命一生，实在和我们国民革命光荣奋斗的历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东征、北伐、“剿匪”、抗战、“戡乱”时期，如棉湖之役，惠州之战，龙潭之胜，独山之克，没有一次不是激烈艰难的战斗，也没有一次不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形势，但是敬公都能指挥若定，以寡击众，扭转战局，造成决定性的胜利。尤其是在本党清党的时候，敬公坚持反共，不稍妥协；而西安事变发生，敬公拥护领袖，号召忠义；日本侵华日急之际，敬公主持军务政务于华北，筹策肆应，完成抗日的战略政略部署；对日抗战期间，和胜利受降之后，出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整建军备，维持政务，可以说敬公都是受任于险恶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坚持原则，砥柱中流。敬公的清怀亮节，真如岁寒不凋的松柏，愈受风霜，愈见刚毅，愈经冰雪，愈加劲挺。今天我们更明白地看到，敬公一生奋斗的精神和方向——对于革命主义的实践笃行，对于革命责任的全力贯彻，对于革命艰难的无畏无惧，不成不已；敬公的伟大志事和风范，实在使我们大家向慕景仰。今天我们以欢欣的心情，祝贺敬公嵩寿松柏常青，我们也以无比的信念，祝我们的“国家”民族生机蓬勃，中兴再盛①。

作为寿星，何应钦随后致谢词。谢词中既突出了自己对蒋氏父子的无限忠诚，对上至“总统”下至士兵都有所照应，也恰如其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政见和情绪，又一次发挥了“武甘草”雅号所包含的调和百味的功能。他说：

……第一，应钦以为，“中华民国”建国大业的基础，确立于先“总统”蒋公的黄埔建军。从此国民革命不但有了真正的武力，而且在蒋公的英明领导之下，使这一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历经……各役，皆能克敌制胜，为历史写下一页页不朽的诗篇。因此，在国民革命光荣的过程中，一切成功，一切胜利，都应归之于先“总统”蒋公，任何后知后觉的革命同志，都难以望其涯际。

---

① 《云龙契合集》第8~9页。

第二，应钦认为，我国军全体将士，在历次革命战役中，皆能秉承先“总统”蒋公的睿智领导，英勇战斗，克尽革命军人天职。东征时期的棉湖之战，教导团大破十倍于我的精悍之敌，巩固了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时期的松口战役，东路军以寡击众，以迂回战击溃孙传芳的主力周荫入。龙潭战役，更在国家危难、中枢无主的险恶形势下，经七昼夜的浴血苦战，歼灭孙传芳渡江的七万之众，使我首都转危为安。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由蒋公亲自指挥，大破吴佩孚的主力，使所谓十四省联军彻底溃败。“共匪”倡乱时期，盘踞湘、赣、鄂、皖各省，“国军”五次“围剿”，犁庭扫穴，经过两万五千多里的追击，终使“残匪”数千人逃窜延安，几乎全部就歼。抗战期间，上海会战，三个月的炽烈保卫战，三十万国军健儿的奋斗牺牲，完成了我军战略部署，赢得了国际人士的一致崇敬。台儿庄、长沙、衡阳、随枣、常德各次会战，都能以强烈的黄埔精神和战斗意志，击败装备优良的日军，获得辉煌的胜利。政府迁台时期，金门古宁头之役，粉碎了“共匪”渡海进犯的迷梦；尤其是“八二三”金门炮战，先“总统”蒋公亲临战地，蒋“总统”经国先生躬自督策，造成了革命战史上的重大战果，巩固了台、澎、金、马复兴基地。这些英勇的事迹，都是我全体三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共同创造的伟大成就。

第三，基于以上事实，应钦要特别说明，个人五十年来所担任的各项军职，都是蒙先“总统”蒋公特达之知之所赐；凡所作所为，都是秉承领袖的英明指示；在指挥各次攸关国家安危的重大战役中所获的战果，都是我三军将士牺牲奋斗得来。因此，一切荣誉，首应归之于统帅，次则应为全体三军将士所分享。今天，“总统”颁授的国光勋章，事实上应钦是代表我全体三军将士共同接受；而由三军将士分享这一份殊荣。

应钦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在本党十届二中全会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蒋公在那次全会中说：“一个人的体气，不可能不随岁月而变易衰老，但一个人的精神识力，却当随着岁月而增长充沛，所以我年事虽高，却始终以行健自持，务令精神意志的光热不息，新学新知的源头活泼，而断不容其颓废滞钝……同志的年龄是自然增长的，但党的生

命，却必须使之春青鼎盛……因此，特别要年长的同志，皆能以其经验智慧，对年轻同志加以启迪接引；尤其需要年轻的同志，以其活力潜能，扩大国民革命的成就，而日新其德，日进有功。”应钦今天深感总统和各位的盛情，特别以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自勉，更希望各位能与应钦共同勉励[①]……

在茶会上，蒋经国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何应钦接过寿轴，当场展示，然后在一片掌声和祝福声中，举刀切开巨大的塔式的九层蛋糕，与众人分寿。

台湾前“总统”严家淦给何应钦的贺诗中写道：

南宫勋业世非常，石泐燕然字有光。
上相人争瞻潞国，元良福远过汾阳。
力扶道德期重整，功裨敦槊讵可量。
待得收京开画锦，年年此日共称觞。

送寿词、贺诗者数以百计，台湾的权贵和名流兴师动众，热闹空前。

（三）

当晚，何应钦参加了“国大代表”何天明以“何氏宗亲会”名义在家中举办的寿糕寿宴。台北市市长李登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余钟骥等也前往祝寿。在寿宴上，何应钦与李登辉谈笑风生，介绍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保持身心愉快的诀窍是知足，能知足便常乐，也就不会贪求无厌，患得患失。”他认为一般人的毛病，“就在不知足，这也正是养生的问题之所在”。这的确是何应钦的经验之谈，非但养生，而是对一切都要遵依“知足常乐”的古训。

何应钦的贵州老乡谷正纲，邀集“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的 83 人，赠送何应钦一寿文，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管仲相齐桓，太公佐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同事、老部属顾祝同

① 《云龙契合集》第 12 ~ 13 页。

等4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之于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王云五等81人，也作诗文相赠。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在台的黄杰等218人，送何应钦以签名的寿册。在台湾及在海外的书画家张大千等，各赠书画以表祝福。

“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在寿典之后，集资台币25万元，将何应钦所珍藏的委任状、书信、照片、书画及九十寿诞的图文编印成册，名之为《云龙契合集》，比喻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关系如“祥云护龙”。何应钦为这本书画集所作的序言称：“……于今九十年忽焉已至，时事尚艰，曷敢言寿？乃承中央集会致庆，复蒙蒋‘总统’经国先生授勋，颁赐祝词，荣光稠叠，如沐春风。回忆曩值生日，屡奉先‘总统’书赠题字，且有手函真迹指论国事，亦久所珍藏，此外尚有友好函札书画多件，兹谨裒为一集；以先‘总统’手函给三原老人题跋，有‘云龙契合’一语，爰取以名斯集。明明在上，济济云从，于以见与并世诸君子报国之踪也[①]……”

序中所言之“三原老人”，即于右任。他为蒋介石促何应钦出掌行政院的亲笔函所题跋语为：“敬之上将服膺主义，信仰领袖，当国家干城之寄，凡数十年来，未尝以私人得失为出处虑，拜命论道，义节弥彰。观此一函，益信云龙契合，事非偶然[②]！”

《云龙契合集》问世后，何应钦便将它视为自己的“传记”了。这本书画集中所收藏的最早的委任状，是1917年2月黎元洪、段祺瑞委任他为贵州陆军暂编第四团团长时的，同年由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任命他为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委任状，也收在其中。这些东西保存了半个多世纪，足见何应钦心性之精细。

蒋经国亲自为何应钦做寿，使他大受感动。他整理近年文稿时，以“蒋‘总统’经国先生既膺重任，不遗葑菲，以钦顽躯尚健，每以力之可及之事，来相任使，钦虽云迈，又曷敢辞。于是遂多机缘，发为浅论，积时既久，乃复成帙。爰思以九十初度，印赠友好，借作纪念。稿既成，正思将何以名此集”，因得蒋经国所赠“松柏不凋于岁寒”寿轴，大喜过望，便以《岁寒松柏集》名之[③]。

---

① 《云龙契合集·序》。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517页。
③ 何应钦《岁寒松柏集·自序》。

1984 年 4 月，何应钦九十晋五，台湾当局专门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配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辑了资料性丛书 11 种共 12 册，由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为其九五寿诞之厚礼。该丛书各册书名是：《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北平军分会三年》，《军政十五年》、《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与龙剧》、《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

如果说蒋介石时代所给予何应钦的最大荣誉，是主持中国战区受降大典，那么，蒋经国时代所给予他的最大的荣宠便是九十和九五寿诞的祝贺。



何应钦 95 岁时在寓所花园内留影

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吹鼓手

高唱“三民主义”　难舍“反攻复国”

（一）

三民主义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政治思想学说。即使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的含义和实质也是随着孙中山革命实践的深入而逐步深化和发展的，最终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何应钦1923年秋第一次晋见孙中山后，他的心里所崇奉的理想和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却是明确要为三民主义奋斗的。初入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里，他也算得上是身体力行实践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逝世之后，随着蒋介石的得势及其对中国统治的确立，国民党领导阶层仍然宣称继承总理遗志，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表面上继承、实践和发展三民主义，实则是在保持其基本形式及构架的幌子下，改变了它的基本精神和本质内容，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这种情况更甚。

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甚了解。到台湾以后，由于军事上无权，政治上失势，便有了较多的时间来研究“三民主义”。他经常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评议党政、“国政”及民政，经常在各种重要纪念日和公众场合发表演说，因应时势地对台湾当局所信奉和实践的“三民主义”作一些理论解释和宣传，使他对“三民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尽管台湾当局所宣扬的“三民主义”具有指导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这三种互相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含义，但在何应钦的思想里、语言中、文字上，却成了一种超阶级的、永恒的、超越历史的东西。尽管他也把“三民主义”说成是“最高原则”、“指导思想”，但最明白不过的

含义，便是时时处处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

1957 年 10 月 10 日，何应钦在台北出席台湾当局国民党七届八次中央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就提出了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议案。他说，"本党当前唯一任务，厥为争取反共救国之成功；但反共必须反攻，救国必须建国"，因此，"须一面充实反攻准备，一面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盖今日建设台湾，即为将来建国之楷模，抑且为当前反攻大陆之支柱"。何应钦既把台湾当成"国"，又同时把台湾当做中国的一个省；把早已成为历史的"中华民国"来涵盖大陆和台湾。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和颠倒，使他和台湾当局都陷入了难于解脱的矛盾之中。按照何应钦所宣称的"三民主义"，名义上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部分，但在他的议案中，却认为只需做到以下四点，台湾便可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了。第一，"加强社会中心教育"，"以求学校与社会融为一体，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期使学生除求知学习外，同时须负起改革社会、道德、文化、经济之责任"。第二，"发展现代国民生活"。他主张"由政府指定银行贷款，兴建现代居民住宅，由都市逐渐向农村扩展，筹制适合国民需用现代交通工具，以改善国民生活"。第三，"促进国际观光事业"，这将对"国家收入、国际宣传与国民经济之发展，均有莫大之裨益"。为促进此项新兴事业，他主张要"加强主管督导机构，扩大民族文化建设，同时简化旅客检查手续"。第四，"扩大台北都市建设"。何应钦说："台北市现为自由中国临时首都所在，更为国际观瞻所系，实有扩建之必要，以能容纳 150 万人口为远景，将接近台北郊区之乡镇划入台北市建设范围，同时并应设法根本解决违章建筑。"

何应钦所说的上述四点，即使全部实现，也只能算作实践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一部分。至于至关重要的三民主义所包含的政治内容，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和给予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等，则全然排除在外。于此可知，何应钦手绘的"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蓝图是何等的苍白和简单。

（二）

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当局确曾痛定思痛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总结了为什么失败的教训。其中，何应钦认识尤深刻者，在于没有解决农

民的土地问题，没有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一认识，萌生于1947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之时。

何应钦所产生的这种触及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兴衰根源——农民问题的认识，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台湾当局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时就曾说过：共产党借土地改革，引起农民“叛乱”，致使大陆失色。国民党去台初期，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如不及时解决，将成为台湾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缓和农民与地主、与台湾当局的矛盾，解决生存危机，国民党决定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政策的实行，何应钦既吹风于前，又积极支持于后。此后，何应钦便把他的这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福利问题的主张，当做他实行“三民主义”的一项创意。

国民党去台后，利用日据时代的工业基础和从大陆撤退前夕偷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美元，又借助美国的援助，加以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明智的决策，使台湾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政治上的反动和保守始终没有改变。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何应钦口中所表述的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政治口号，经历了一个从强硬、疯狂到较为冷静但仍顽固不化的过程。起初是叫嚷“反共抗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则从“反攻大陆”改变为“反共复国”。但是，这些无法兑现的政治空头支票再也吸引不了台湾民众的时候，适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调整对台政策，于是，便产生了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有了何应钦为之充当先锋和吹鼓手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左”的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及前苏联的背信弃义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内乱，曾经给何应钦提供过做“光复大陆”黄粱美梦的温床，燃起他“反攻”成功的一线希望。时间一年一年过去，那令他朝思暮想的大陆并没有自行崩溃，何应钦所参与策划、鼓吹的“反攻大陆”的行动，竟没有一次获得尝试性的成功，但他却没有放弃“反共复国”的希望。1978年12月18日，他在台北出席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还执意地宣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

立场绝不变更。”他还预言中共将无法收拾“文化大革命”的乱局①。

与何应钦的预言和意愿相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湾回归、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中共中央制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方针：一是采取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二是统一之后，台湾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政治制度。

1979 年元旦，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难以忘怀和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这天，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这给台湾国民党当局当头一棒。何应钦在 1979 年元旦这天团拜时不得不以《团结自强迎接国际逆流的挑战》为题，给情绪沮丧的与会者打气。他的这篇祝词，便是他日后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肇端。

在这篇新年祝词中，何应钦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党员，遵循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持续不变、事实基础、安全保障、妥订法律、政府关系”——维持台湾的存在。他说：1979 年是台湾“扭转形势的主要关头”，要“展开以下的战斗”：第一，争取美国友人及“国际正义人士”，趁美中建交各项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刻，展开维护台湾地位及权益的行动，“确保台湾海峡的安全，不受共产势力的侵犯”；第二，要培养一批“外交斗士”，以加强“外交阵容”；“展开与自由国家的实质关系，团结自由世界的正义力量”，揭穿中共“诱骗自由世界的诈术”，打击中共“赤化世界的狂妄野心”；第三，要积极扩大在大陆的活动，煽动大陆同胞“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向中共展开所谓“争自由、争人权、争取生活权利”的奋斗，从“内部突破”中共的组织；第四，要提高“民间警觉”，加强台湾防卫组织、训练与战斗机能，消灭中共的“地下统战组织”，粉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颠覆”；第五，“加强均富原则，贯彻民生主义的均富政策”，拆穿中共现代化的“谎言”，海内外一起，推翻中共政权；第六，“强化攻防战力，开创反攻大陆的新机”。最后，何应钦呼吁：“秉持基本国策，遵照蒋主席的指示，团结自强，迎接国际逆流的挑战②。”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510 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512 ~ 1513 页。

何元老当主席　大同盟枉费力

（一）

正当何应钦在台北骂不绝口之时，1979 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我们寄希望于 1700 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①。

这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性文件还指出，我们“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让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建议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结束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商、通航、通邮，以利两岸同胞的直接接触。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也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来自祖国母亲的呼唤，激荡起台湾同胞思念祖国大陆的热潮，赢得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响应，冲击着台湾当局，使何应钦的元旦献词成了他逆潮流而动的又一历史实证。

1979 年 1 月 30 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访华团时，首次公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②。”这一构想，使和平统一祖国的蓝图进一步具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湾当局的反应是：坚决不与中共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1 月 11

① 1979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17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

日，台湾当局“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称中共是在玩弄“统战阴谋”，停止炮击和提倡“三通”是“迷惑世人”，“松弛台湾的战志”，是30年前国共和谈的“故伎重演”。

自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和台湾当局都力求用立法关系来调整美台关系。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卡特总统签署的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正式出台。美国以立法的方式，作出了保证台湾安全的承诺，制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政策，规定了美台关系的“官方”性质。美国的这一做法，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违反了中美建交原则。在这一背景之下，台湾当局也立即做出反应。在这年召开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何应钦听了蒋经国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后，欣喜万分，在“中央评议委员会”发言，赞同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策进光复大陆”。

1981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明确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这在已经十分动荡的台湾岛上又激起了一阵阵冲击波，谈论统一的禁锢竟被国民党自己打破了。不少有识之士直截了当地要求台湾当局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号召，与中共进行谈判，并迅速实现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通邮、通航和通商。

但台湾当局被“中华民国”的“法统”束缚死了，难以正视现实，顺应潮流。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大上宣称：“本次大会的主题，在于肯定70年代乃是三民主义胜利的年代”，“因之大会的各个研究议题，都是环绕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宣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中国现代化和持久和平“唯一可行的道路”。并谓虽然谈论统一，但“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改变”，“国体绝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绝不改变”，与中共“绝不谈判，绝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也“绝无利用苏联束制中共的考虑”，同样反对任何“联匪制俄”的幻想①。蒋经国所定的调子，犹如当年蒋介石所定的各种反共调子一样，何应钦是绝对不折不扣地执行，有时他还会有所“发明创造”，其反共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也令台湾当局心悦诚服。

---

① 1981年3月30日台湾《中央日报》。

(二)

为了贯彻台湾当局国民党十二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何应钦邀约了台北各界知名人物20余人，筹商召开一次研讨会。1981年11月21日，研讨会在圆山大饭店举行，参加者有200余人。何应钦作为这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在会上致词。他首先对国民党的这一政治纲领作了大大超出其影响力所及范围的肯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号召，自提出以来，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认为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愿望的号召，在国际舆论上，也有不少的反映，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向。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一政党或某些方面的人士去推动，而是要所有中国人，共同来努力推动的工作。它不独是拯救大陆同胞苦难的一项重要任务。”紧接下去，何应钦便开始攻击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暴政”、“奴役”、“绝路”。何应钦绝不是闭目塞听造成极端的无知，而是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造成了极端的偏见。正当新中国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良好势头的时候，何应钦却向与会者声称：“中国人乃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大陆上的‘共产暴政’已走向绝路，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挽救大陆。”

当然，何应钦主持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国策，同时也想抑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刮起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之风，把海外的“统一”论和岛上的“党外运动”统统归入国民党十二大的政治纲领的轨道。对此，何应钦也强调了“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但如何去实现统一呢？他却又进入了台湾当局“法统”的怪圈，认为台湾的社会制度是“统一中国的蓝图”、“方向”，并自以为是地断言：“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救国途径。”他希望在此次的研讨会上，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免海内外被中共和平统一“混淆视听”，“扰乱我们的方向和信心”，防止台湾内部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分歧”[①]。

---

① 何应钦：《一个全民族反共统一历史性运动的兴起》。

在这次研讨会上，何应钦还特意请来台湾的“大陆问题专家”张式琦、李廉，请他俩向与会者作了有关大陆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报告。这次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何应钦等70人联名提出的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在人们的簇拥搀扶下，步出被誉为台湾“现代化的中国古典艺术厅”圆山国际大饭店，他的心境好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道德重整”、“国民外交”来效忠蒋介石；20世纪80年代，他终于找到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运动来效忠蒋经国。这是义务？信仰？或者只是像参加基督教礼拜仪式似的一种灵魂的皈依？抑或如同“反共复国”的多年空喊，仅仅是一种政治情绪的宣泄和心理的盲从，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

正当何应钦精心描画有如暮色、灯光、星海在圆山下剑潭中形成的美轮美奂的“剑潭幻影”似的“统一”蓝图时，大陆对台湾的政策调整震动了世界。1982年2月，邓小平正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概括为“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构想在1985年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明确为我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不移的国策。

（三）

国民党的十二大是台湾当局面临国际困境，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处于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台湾当局寄希望于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撑腰壮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来打破“反攻复国”的僵局和沉闷。然而，这种往“反共”的牛角尖里硬钻的决策，并没有摆脱蒋介石时代所奉行的一党独裁的路线，根本无法适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明显的和平、发展这世界性的两大潮流。何应钦所加以阐释和发挥的关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许多言论，表面看来气壮如牛，攻势凌厉，信心十足，似乎胜利在望，而实质上是偏见大，容量小；夸口大，能量小；攻势虚，守势实。他的言行，不过是以极度夸大了的政治宣传的新伎俩来掩饰其“反攻”无能、无望而企求保持台湾偏安现状的惶惑心态。对于何应钦个人来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纲的提出，毕竟为他在政治上又搭起了一座表演的舞台。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是依照官方意志而采取“民办”方式成立的团体，台湾当局自然支持不遗余力。至于发起者和参加者中，也不乏

真正相信和真诚拥护的人，但众多的人士，却是由渴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真情所驱动，管他什么主义、什么方式，只要统一就行，因而支持何应钦成立“大同盟”。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82 年 8 月 28 日，何应钦在台北的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筹备会。到会者 110 人，推举何应钦、郭为藩、李廉、沈君山、倪抟九、周应龙等为代表，向台湾当局“内政部”申请成立。10 月 13 日，台湾当局认为一切准备皆已就绪，便授意其“内政部”批准成立。

10 月 22 日，是何应钦在政治上失势以后又似乎得势的重要日子。这一天，在台湾最大最宏伟的阳明山公园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内，举行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大会。

金碧辉煌的“中华文化堂”主席台前两侧，悬挂着两朵巨大的台湾当局的“国花”梅花图案，梅花中绘有中国地图，地图正中是蓝色封面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的模型。这便是“大同盟”的盟徽。主席台上，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旁各竖立 6 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台沿鲜花簇拥，显得气派独特，热闹非凡。以何应钦为首的，有台湾各政要名流李璜、吴三连、陈立夫、谷正纲、蒋彦士、罗光、陈奇禄、陈茂榜、端木恺、张建邦、秦孝仪、吴大猷等 31 人组成的主席团端坐台上。台下是各界代表 1600 余人。何应钦以总主席的身份主持成立大会。他像当年主持各种阅兵式一样，精神抖擞，威仪堂堂，运足中气宣布：“应钦现在郑重宣告，由‘中华民国’各界人士发起，为全国同胞共同热烈响应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今天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正式成立。”台下台上一片掌声，何应钦陶醉了。毕竟是 93 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也借机平息一下心中汹涌的过分激动。他戴着使中国变成以台湾为中心的、早已被时代所否定了的“法统”的变色眼镜，忘记了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追随他的“台湾人士”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这一常识。何应钦神气十足地站在讲台上，不时挥动手臂，在阵阵掌声中飘飘然起来，仿佛令他心酸黯然的反共夙愿，随着这个虚声惊世骇俗的“大同盟”的成立，就立即可以实现似的。会上通过了纲领、盟章，声称要把台湾当局建成“独立、民主、平等、自由、均富、进步、开放、和平”的“中国”，并提出了“统一中国”的六点主张等。

蒋介石统治大陆22年，其所标榜的“三民主义”尚且没有使中国真正民主自由统一；而国民党偏处台湾海隅，也没有真正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招牌，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如果不是利令智昏的话，任何人也不会相信，凭何应钦站在阳明山上一阵扬旗摇幡，呼风唤雨，便会应者云集，梦想成真！

当然，这个大同盟的成立，何应钦也并非没有收获。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领导着31个常委及计划、研究、联络3个工作委员会。这也是慰藉孤独老人的权力荣誉，比起“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这座冷冷清清的衙门，更受当局重视，也为社会舆论所关注。这一天的台北各大报，“何应钦”三字所出现的频率，远比台湾当局“总统”、“行政院长”、“副总统”这些人高得多。这个大同盟，也比昔日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好得多，毕竟有了一座设在台北市的会所；不似前者，吵嚷了若干年，竟连在台湾建立一个中心的经费也没有。

（四）

何应钦自幼就养成了一种执著得可爱可怜又让人无可奈何的禀性。他办事认真勤谨，只要是他崇奉的人需要他干的事，就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碰了南墙也不回头。这次，他真是拼了老命，决心利用这个大同盟推动一次反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运动”。但没有人山人海、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场面，死水微澜何以能“壮阔”得起来？何应钦又想出了一个由官方暗中主持推进，由他亲自出面组织的运动民众的活动。

11月12日凌晨，在台北南区仁爱路、光复南路和基隆路三街交汇处的大型花园广场——中山公园“国父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何应钦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了一个有万余人参加的升旗典礼。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夫妇及台湾各机关首脑、各界名流都应邀前往助兴。何应钦像当年主持各种阅兵式那样，热情亢奋地主持了这场历时25分钟的升旗仪式。“国父纪念馆”前的喷泉周围和四方各长百米的阶陛上，都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上午6时整，何应钦等屏息注目，在台湾当局“国歌”的旋律中，一面特制的“青天白日”旗升上杆顶。随后，为了表示虔诚和祈祝，何应钦率领与会的各方要人，缓慢地迈上宫殿式的“国父纪念

馆”的层层台阶，步入长方形的纪念厅，集体向高达5.8米的孙中山坐姿铜像鞠躬致敬，以示他们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对这次规模空前的万人升旗仪式，台北各大报竞相报道。但了解内情和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这犹如台湾一年春秋两度到孔庙朝圣一样，主持者要借众人的香火和膜拜顶礼以示显赫和续接了“正统”、“正宗”，而参加者各有祈求，或借机到户外交朋会友，或观赏热闹，活动身躯。

尽管年岁已不饶人，何应钦仍勉为其难，撑持着这个大同盟的门面，不使它虚有其表。由于大同盟是号称“全民性”的，其日常工作的3个委员会虽然已经成立，但领衔者多难务实，迫切需要解决组织的健全与扩大编制等问题。11月18日，何应钦在“国父纪念馆”内主持了大同盟的第一次常委会，他提醒各位常委切记蒋介石生前所说的一句话：“一个组织的工作推行与功效发挥，必须从健全组织本身着手。”他建议要“网罗延揽各界硕彦，充实大同盟的基础，以加速工作的进行”[①]。

1983年2月4日，何应钦在大同盟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声称：大同盟成立3个月来，“在全世界各地区，已经正式成立了很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组织”，他相信今后类似的组织还会“像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他号召追随者们，要“积极从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学术理论的研究与行动”，“使在一元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下，不断设计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多元化的工作方法”。大约何应钦本人对他的“三民主义”能否统一中国也是胸中无数的，因此他又强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政治运动，大陆一日未‘光复’，此一运动决不中止[②]。”

何应钦确实抱定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决心。他在一次会见访台的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滩尾弘吉时发表了高见：“世界人口中国占有12亿之多，这些中国人信仰三民主义或偏向共产主义，是左右世界和平与混乱之关键，我就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终生使命[③]。”为了大同盟的生存和发展，何应钦真正是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同一天，他又主持了大同盟的咨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按他们的《盟章》规定，“为结合全国各地区、各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615~616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602~1603页。

③ 滩尾弘吉：《追悼何应钦先生》，《何应钦上将纪念集》，第225页。

民族、各党派、各宗教、各社团、各学术团体的智慧与力量”，要设立一个咨议委员会，聘请海内外的“名流硕彦”为咨议委员。第一批接受聘请的有王惕吾、沈昌焕、倪文亚、陈启天、钱思亮等51人。他对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所采取的某些反共产主义的措施，表示赞赏，并断言此后美国的反共反华政策必将强化；他对中苏关系开始和缓，认为是西方国家“联共制俄政策”走到尽头、“非要改弦更张不可”的标志。与其说他是盲目乐观，不如说他是幻想主宰了理智，以掩饰自己对前途的茫然。他抓住美国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某种改变，就向在座的这些头脑也许比他更清醒的咨议委员们预言：“这种形势的发展对我极为有利；我们外交上的孤立业已开始解冻，台湾海峡的战略价值重新受到重视，‘中华民国’反共的坚定立场受到鼓舞，而中共的衰退形势和外交的诈术也已揭穿。这正是我们不需要武力，而以三民主义政治攻势‘瓦解中共统治’的大好时机[①]。”何应钦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正视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已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他的“高见”不过是一种心虚者的自我解嘲。

1983年2月26日，由台湾当局“中华伦理教育学会”在台北体育馆举行一年一度的春季“全国联合祭祖大典”，鉴于何应钦在“复兴”中华文化上的努力和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中知名度大大提高，便请他担任总主祭。参加祭祖大典的为全台汉族各姓氏的代表及其他各族如满、蒙、藏、苗、瑶等族代表共5万人，主要原因正如《台湾风物志》中所说的那样：“近年创始的‘全国各族联合祭祖大典’等旧俗新风，也都在表达了台湾同胞对我河山的眷念之情[②]。”表明台湾同胞思乡回归心潮的涌动。但何应钦不能透视这类事物的本质，而是循着“反共”的惯性思维，设想着要在风光秀丽的阳明山筹建“中华民族大宗祠”，以便作为今后全台春秋祭祖盛典的固定场所。也许，何应钦在祭祖时所想的，便是那在祖国大陆可想而不可见的祖宗坟茔和亲人，并不全是支撑大同盟的繁琐事。

---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622页。
② 蔡郭祺：《台湾风物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身先士卒亘古未有　冷战心战效果全无

(一)

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成来，何应钦为了扩充“大同盟”的影响，在1981年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向大陆空飘反共宣传品”的方案。他估计两岸隔绝了30多年，大陆民众对台湾所实行的“三民主义”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他听说当时大陆某些人中曾一度流行过“经济学台湾”的论调，便认为这也是中共的“统战阴谋”，亟应对大陆人民进行“三民主义”的宣传普及，使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台湾的“三民主义”有切实具体的了解，从社会主义中“觉醒”过来，使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攻自破。因此，他计划邀请学者、专家参与设计、撰写及编印《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小册子100万册，由有关单位用飞机、气球等从1982年3月29日台湾的青年节这天起，分批向大陆空飘投放，企图蛊惑大陆的军心、民心。



1983年在台湾青年节茶会时与参会人员合影

这一计划乍看起来是一种便捷可行的宣传方式，但台湾当局却认为耗费人力、物力甚大，空飘又难以准确到达目的地，其效果未必如愿。有人甚至讥笑何应钦这种对“三民主义”的痴迷，是以己度人的臆想，且100

万册对于广袤的大陆，犹如飘洒几片雪花，能起什么作用？因而这一空飘计划夭折了，不过何应钦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一往情深，台湾当局是给予嘉勉的。

何应钦领导大同盟，“辛勤擘画，孜孜不倦……更复不惮繁剧，主持会议，发表演说及广播”。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的鼓动之下，据该同盟的副秘书长倪抟九的统计，从1982年10月至1984年9月，除台湾之外，这个大同盟在海外的分支组织已达71个，另有4个洲的华侨社团已成立洲际性的组织，甚而至于“大陆地区亦成立大同盟组织500余处”，不仅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已“形成巨大震撼，且赢得国际间普遍重视”[①]。轻信者自然对大同盟的前途充满希望；神经脆弱者，大约会被大陆成立500余处大同盟组织而惊讶失魄。虚张声势，无中生有，自我吹嘘，恐怕也算是何应钦领导大同盟进行“政治作战”的一种手段吧？

九十有四的何应钦，已是风烛残年，但他顽强地同命运和死亡抗争，希求获得“永恒”的生命。1983年2月，他因去台中不慎感冒，返回台北后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在病中自己决定，今后要摆脱其他一切琐事，全力推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不达成此一任务，绝不中止”[②]。何应钦住院治疗期间，虽有女儿和侄辈、随从侍奉左右，探视者亦络绎不绝。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病房里灯光昏暗，静得可怕。孤独的老人，聆听着窗外清风与树梢的私语，不由自主地勾引出对往事清晰的回忆。



何应钦之侄何绍周（曾任第八军军长）

① 倪抟九：《何应钦上将传》，第63～64页。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640页。

一天夜里，雨潇潇，风飒飒，何应钦突然心血来潮，产生了“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灵感，想到他领导的大同盟已有盟章、纲领、盟旗、盟徽，还应该有一首盟歌才五脏俱全，显示这一运动的健全与永恒性。他在病床上把一生中各个历史时期流行的带有政治鼓动性的歌曲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选择大革命时期最为流行的且一度成为北伐时代国民革命军军歌的《打倒列强歌》为模式，苦心孤诣地写成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歌》的歌词。

次日，何应钦吩咐秘书约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作战学校和“国立”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们分别为他的歌词谱曲以供选择，并限 3 月 12 日前将曲谱和试唱录音带送到医院。

不知是被约请的教授们不屑为这种政治口号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是因他的歌词实在难以谱曲，到了限期，只有“中国文化大学”的李中和教授送了曲谱和录音带，何应钦听后只好表示“非常满意”，决定采用。盟歌搞好后，他又叫人去组织合唱队演唱，录下音来，特别选择 3 月 23 日送去给大同盟推行委员会的常委们审听。他为什么要选择 3 月 23 日这一天审听盟歌呢？1927 年 3 月 23 日，是北伐军攻克南京的日子。何应钦当时担任北伐军的东路总指挥，但攻至南京外围时，为保存实力，逡巡不前，待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率先攻克雨花台，驱逐了城中的敌军后，何应钦的第一军才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城，抢占有利阵地和胜利果实。这一天在何应钦指挥作战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黄道吉日”吧。

3 月 23 日，何应钦感冒未痊愈，便到台北市民族东路 15 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总部去主持常委会首次临时会议，审听盟歌。他在致词中作了如下说明：“目前本大同盟的推行工作，正在依照计划，积极开展。应钦有鉴于推行工作，首先要加强号召的力量。上次常务委员会议中，通过了盟旗和盟徽，但还没有制定盟歌，现在本大同盟已定于本月 29 日在民族东路新址正式办公，并且要举行茶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使全国同胞对于本大同盟更有深刻的了解。因此，盟歌必须制订，借以用歌曲来结合民众的意志与精神……有鉴于盟歌的重要性，曾经一两夜不睡，亲自写了一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歌》，特地选定在今天光复南京纪念日提出临时会议，请各位听了录音之后，予以指教，并希望予以通

过，以便及时发表，公开演唱[1]。"

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审听尚未开始，何应钦关于盟歌歌词的立意也还未说明，他的思路便分了岔，横插进一段关于他与1927年3月24日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南京事件"无关的声明。这是借题发挥，更是在医治多年前留下的心病。他说："关于南京光复这一段史实，应钦还要说明一点。1927年的南京之役，是由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和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从东西两面分进合击。3月23日，江右军的第六军（军长由程潜自兼）先进入南京，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中共跨党分子，接受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指使，阴谋破坏我北伐大业，买通第六军一个旅长和他的部下，于第二天，24日，对居住南京的外国侨民，抢劫纵火，造成了南京事件……应钦所指挥的东路军，是于25日进入南京，与江右军会师，因此，南京事件发生时，东路军尚未进入南京，程潜的江右军，应负完全责任。"何应钦的这一插话，虽使人感到突兀，但又在情理之中，且万变不离其宗，与大同盟运动的反共目标是吻合的，并未离题。"南京事件"纯由帝国主义借口北伐军骚扰了侨民而蓄意挑起的，何应钦却要推给江右军，其深意也是推给共产党。但他却在无意中说漏了嘴，证明攻克南京是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第六军建立的首功，他何应钦只是配角。他接下去便又作解释："这一史实，如不澄清，深恐将来记载，有所出入，关系甚大，所以借此机会，向各位特别说明[2]。"古人有"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句子，而何应钦活了90多岁，"反共"50余年，却唯恐生前身后落骂名，无奈早已白发生，恐一朝身亡，许多历史悬案便只好任人评说了。这一小插曲，足见病中的何应钦背负了多少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忧虑啊！

审听之前，何应钦又不管在座的许多常委们也都是耄耋之人，是否耐得住性子，又对盟歌作了一番大可不必的说明。审听后，何应钦既然都"非常满意"，审听者何苦让这位老人再费周折呢？听罢录音之后，所有审听者都表示满意，予以认可。彼此释了重负，尽欢而散。此后，但凡大同盟开会，演唱这首盟歌时，何应钦都动容地为之击节。

1983年3月27日，是何应钦94岁的生日。由于连日来为大同盟的事

---

① 何应钦：《盟歌的历史渊源及其涵义》，1983年3月23日。

② 何应钦：《盟歌的历史渊源及其涵义》，1983年3月23日。

奔波劳累，身体尚未康复，他谢绝了各位显宦和各方宾客的祝贺，在病床上养神。中午时分，他在侍从们的护卫下，到天母寓所与家属亲友及旧属合影留念，然后又返回医院。3 月 29 日，大同盟推进委员会邀请各界人士在总部举行茶会，他又抱病前去主持并致词。他不无骄傲地说："应钦前天刚度过 94 岁生日，以 94 岁的老兵，仍然担负起为国家统一而战斗的重任，自信在中外古今历史上，包括武王伐纣的大将太公望在内，我还算是第一人。"在许多"党国"要人、各界代表和新闻界人士面前，一贯谦和谨慎的何应钦，如此得意地炫耀自己，这也是极少有的。这并非他老病后神志恍惚，倚老卖老，而是以惊人的出语作铺垫，歌颂蒋氏父子。"姜是老的辣"，何应钦办事的精明，于此又一露峥嵘，令听者叹服。他接下便说："应钦为什么以如此高龄，还敢担起这副担子，就是我要本着国父的遗教、先'总统'蒋公的知遇和遗志，尤其是蒋'总统'经国先生的殷切期望，和各界领导人士的厚爱，才使我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以有生之年，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光荣胜利而奋斗到底[1]。"茶会上演唱了他作词的盟歌。随着铿锵明快的旋律，何应钦仿佛又回到了大革命时代，精神上又焕发了一阵青春。

（二）

何应钦的大同盟在台湾岛上确曾掀起一阵阵热潮，奔走呼号者也不乏其人。要论"实绩"，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就是广播心战"。在何应钦的倡导下，台湾当局的"中央广播电台"，为了对大陆进行"广播心战"，"设备更新、电力加大……透过 27 个中波、短波的频率，作持续而密集的广播"。为配合大同盟的工作，台湾当局指示，将



何应钦在台湾电台发表对大陆同胞讲话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611 页。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为中心，制作特别节目，在各种节日及平时向大陆广播。何应钦滴水不漏地记下他们开展"广播心战"的实绩：共播出稿件5401篇，计4748200字，播出总时数43570分钟[①]。

在开展"广播心战"中，何应钦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1983年春节期间，他亲自前往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发表广播讲话。他俨然一个"救世主"向他的子民们传播"福音"，又像一个讲经说道的牧师向教徒说教，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并吹嘘台湾"复兴基地"如何地"弘扬中华文化"，如何地"实施民主宪政"，如何地"实施民生主义经济制度"，煽动大陆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里应外合，发动全面反共革命"去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黄粱美梦[②]。

何应钦率先打了头炮以后，他又组织了"代表"汉、满、蒙、回、藏各族、各政党、各宗教界的人士，以各种方言，向大陆轮番广播。何应钦等人根本无法想象或者压根儿不愿正视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令世界惊羡瞩目的变化。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大陆的春节，一年比一年热闹，当人们阖家坐在电视机旁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或是亲朋好友聚会一处，相互祝福国泰民安，共同企盼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之时，何应钦的广播讲话只好任它在太平洋上空飘然逝去。



1983年在台湾青年节茶会后与与会人员合影

①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633页。

② 何应钦：《我们需要自由民主繁荣统一的新中国》，1983年2月7日在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

1983 年 5 月，发生了卓长仁等 6 名罪犯劫持中国民航班机到台湾的事件，何应钦把这伙罪犯称为“反共义士”，把这种犯罪行径视作他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喜滋滋地等待着那个“全球性的反共运动”出现。

但是，代替“全球性的反共运动”出现的，是全球性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邓小平还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针对台湾当局和何应钦鼓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说道：“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①]。”

何应钦所标榜的“统一”，其要害是以解救“苦难深重”的大陆同胞为幌子，推翻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极欲达成的目标”。他说得很坦白，就是要“把今日台湾的制度与生活模式搬到整个大陆”，由台湾来吃掉大陆[②]。历史已经证明了任何企图由台湾来吃掉大陆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是使台湾走入历史的死胡同。

1984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祖国统一的问题，“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一国两制”的构想，“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后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将能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之后，大陆不派人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会，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无须到北京，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17～18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版。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645 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22 页。

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远见卓识和为民族利益捐弃前嫌的真诚！对比之下，何应钦及台湾当局始终想"吃掉"大陆，声称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不愿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多么不识时务。何应钦不仅幻想用台湾的政治、道德、伦理的力量来"和平统一"大陆，还鼓吹要"枕戈待旦"，除"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光复大陆'外，更重要的工作，是配合收复地区的社会建设与教育重建工作，复国与建国两项任务，必须配合进行，才能加速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①]。在台湾当局都实际上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奢望之时，何应钦还企图以武力摧毁大陆而实现"复国"，以"三民主义"吃掉大陆的社会主义而完成"建国"目的，足见他早已是时代的落伍者。按"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历史再一次提供给何应钦改写自己历史新篇的大好机遇，但他放弃了这一明智的选择，冥顽地在反共的迷途中走下去。

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都已领教了何应钦到台湾后所发动的反共反华的"两大战役"的荒谬。一个是周游列国"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另一个便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前者由于国际反共势力对中国的敌视、封锁，似乎热闹了好些年，波及了欧、亚、美三大洲，形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国际思潮，何应钦也一度成了他所到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人物。然而，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两大潮流，这种在国际间造谣生事、制造仇恨和民族分裂的极不道德的反共运动，逐渐失去市场，近于自生自灭了。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应钦效力于"道德重整"是反共的夙愿掺和着"上帝"的启示，因而获得既反共也笃信"上帝"的蒋介石曾表示过些许的支持的话，那么到了蒋经国时代，却表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蒋经国虽然也坚持反共，但深知"上帝"与"道德"的力量，既巩固不了统治，发展不了台湾的经济，更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他不甚理会。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则不然，是蒋经国本人钦定而由何应钦出头露面去贯彻执行的，曾一度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更被何应钦等人视作维系人心、巩固台湾现状的心理防线，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何应钦的大同盟是为蒋经国立言立德，似乎暂时所获得的支持远比"道德重整"运动大得多。因此，大同盟的

---

① 何应钦：《大陆光复后的教育重建工作》，1983年1月28日。

活动，使已经退出台湾政治舞台的何应钦又频频登台献技，更为人所瞩目。

但是，好景毕竟不长，坚持“三不主义”和反对“三通”对台湾是极为不利的。能够正视现实并讲求实际的蒋经国首先松动了自己对大陆的防线。在何应钦逝世前，台湾当局被迫调整大陆政策。1987 年 7 月 14 日，身患糖尿病而只能以轮椅代步的蒋经国宣布自 15 日 0 时起，解除自 1949 年 5 月 19 日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署名颁布的“戒严令”。紧接着，又酝酿开放对大陆探亲，全面开放学术机构、进口大陆出版物，并将准许出版业有选择地翻印；明里仍禁止“三通”，而暗中的“三通”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台湾的“立法委员”中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当局宣布积极主动的“统一政策”，以取代消极被动的“三不政策”①。在海内外所掀起的不可遏止的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潮冲击下，台湾当局开始了“两岸对峙 30 余年后突破性的转变”②。可悲的是，何应钦已经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他想阻挡这一转变，已无能为力；而要回心转意，推动这一转变，老天也不再假以时日了。执著、顽固反共，使他一误再误。

何应钦至死都坚持一厢情愿的、极不现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他始终是主张必须统一的，“中国必须统一”、“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国共两党应该而且能够谈论统一的共同基础。他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出现和一系列活动，尽管严重地阻碍两岸关系的改善，但对于遏制和反对台湾岛上和海外的“台独”、“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祖国的政治暗潮，客观上却又有一定作用。这也是历史对何应钦所开的又一次玩笑。

---

① 1987 年 10 月 2 日，台湾《联合报》第 2 版。
② 1987 年 10 月 15 日，台湾《联合报》第 2 版。

六、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参

推动岛内经济建设　寻求海外关系发展

（一）

素称宝岛的台湾，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间，为掠夺岛上的资源和劳动力，在工农业上投入了较多资金和技术，交通、码头、电力、冶炼、造船、金属、机械、纺织、造纸等基本工业虽在战时有所破坏，但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775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为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退保台湾时，从大陆正常或非正常移入台湾的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更为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也是何应钦相信台湾可以成为“反攻基地”的前提之一。

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中，是远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从1951年至1965年间，美国给予台湾的军援、经援共45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约13.72亿美元，主要用于电力、运输、通信等基本建设。美援占台湾全省每年投资的30%~50%左右。在相对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环境中，美国的这种“输血”，使台湾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一二十年。这也成了何应钦宣称可以“反攻大陆”的凭恃之一。

台湾当局为了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一到台湾后便开始经济的恢复和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如依农、轻、重为序的基本策略；进行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进行币制改革，抑制通货膨胀；采取高利率政策，减少货币的扩张对物价的影响；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平衡财政收支；发展替代进口工业，工业消费品的自

给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基础得以建立。经济发展速度确实较快。这便是何应钦叫嚷要把台湾的生活方式“搬到大陆去”的“理由”所在。

由于上述条件和措施，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经济出现了“黄金时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也暴露出其潜在、既在问题，如受制于或依附于国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技术劳力缺乏、竞争能力差；等等，从而导致了由于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面经济衰退。为了稳定和发展台湾经济，当局于1973年宣布进行“十项建设”。

“十项建设”的具体内容是：建立核能发电厂，兴建南北高速公路，建设北回铁路，西线铁路电气化，兴建台中港，兴建苏澳港，建设桃园国际机场，兴建高雄钢厂，兴建高雄造船厂，兴建林园第三套轻油裂解工厂。这“十项建设”从1974年1月开始实施，到1979年完成，总投资达52.32亿美元。在此期间，何应钦从台湾的“总体战略”考虑，对“十项建设”十分关注，多次视察，建议或陪同访台的外国人士前往参观。

“十项建设”的完成，对缓和台湾经济衰退，减少失业率，促进经济的复苏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台湾的“工业升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十项建设”即将完成的时候，1978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行政院长”孙运璇邀请台湾的“国军”一级上将组成“十项建设”参观团，由何应钦任团长，团员有顾祝同、高魁元、黄杰、王叔铭、彭孟缉、黎玉玺、赖名汤、刘安琪、刘玉章9人，再次进行考察参观。

参观考察结束之后，何应钦汇集了各个人的心得和建议，写成《参观国家十项建设成果建议书》，于12月11日呈交给蒋经国、孙运璇。

在这份建议书中，何应钦等人提出了12条建议，中心是维护或扩大现有设施及项目的利用率和成效，拓宽建设领域，以利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对外交往及战时需要。

在参观南北高速公路时，何应钦等人认为它是台湾的观瞻所系，对沿途的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十分可惜，又见沿途已竖起许多杂乱的广告牌，既有碍车辆行驶，又破坏了景观。尤其是听管理部门介绍，1978年1月至9月，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汽车抛锚者多达11000辆次，甚觉问题严重。于是建议：“高速公路沿线应合理限制广告牌设置，以维护自然景观，确保行

车安全；并应加强行车管理，禁止排气量不足、旧胎翻新的车辆，以及逾龄旧车、拼装汽车进入高速公路，以避免车辆抛锚及连环车祸的发生。”

对于桃园国际机场，何应钦等认为，应“配合桃园国际机场的营运量，亟应加辟国际航线，辅导民营事业充实其设备，汰换逾龄客机，以促进航空运输的整体发展，并充实航空工业的技术与设备，以强化高性能航空器的检修与维护功能”。

至于“台中港应从速开辟中日、中美定期航线，扩大港埠利用并促进其加速发展”。对于苏澳港，他们考察时深感“兰阳隧道宽度不足”，车辆双向行驶困难，“应于第三期工程中加辟第二隧道”；并策划在兰阳平原建立重工业及加工出口区，使此一港口的营运目标更为远大。

在西线电气化铁路的参观中，何应钦等乘坐在专列中，感到速度风驰电掣一般，车窗外的风景飞速晃过，确令老年人心悸神慌，为行车的安全担心。因而在他们的建议中强调要适当调节速度，以确保行车安全。北回铁路施工地段地质条件较差，路基的铺设较为困难，施工进度各段进展不一。他们希望尽快解决收尾工作中地质条件造成的困难，以保证如期全线通车。

在高雄钢厂参观时，何应钦等感觉到，应以该厂为龙头，带动一批民营企业从事加工工业，配合现代化钢厂的改革发展，发挥设备技术资源的整体功能。在参观台湾最大的高雄造船厂时，何应钦强调应贯彻台湾有关当局倡导的“国轮国造”的政策，加快大型客货轮的制造速度，使台湾的造船业有较快发展。

在参观林园第三套轻油裂解工厂后，何应钦等建议还应加速陆上及海上石油的勘探，并增加原油进口，在增加能源储备的同时，保证石化工业原料的供应充足。

面对全球性的能源紧缺，何应钦等建议应重新选址，增建核能发电厂。此外，建议书中还提出在西海岸增辟渔港三五处，形成环岛的渔港体系。一旦发生战争，稍加改造，西海岸的渔港即可作为军港使用；同时，在规划新建港口时，应注意公路交通及环境配套设施的整体规划，按照现代化城市的规格设计港埠城市建设，使之同时具备旅游观光的价值①。

---

① 何应钦等：《参观国家十项建设成果建议书》，《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5～10页。

收到何应钦等10位上将的建议书后，蒋经国十分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予以采纳。他们的上述建议，有的已在台湾当局的考虑之中，有的对台湾继续实施“十二项建设”计划不无积极的作用。

“十二项建设”于1978年开始实施，到1984年完成，历时近6年，总投资78.54亿美元。其中四项是何应钦等人的建议书所涉及的“十项建议”的继续，如环岛铁路网的建设；台中港第二期、第三期工程；高雄钢厂的扩建；核电厂第二厂、第三厂的建设等。其余八项是：新建东西横穿公路3条；延长南北高速公路；改善高雄、屏东地区交通条件；改善重要农田排水系统；修建台湾西岸海堤工程及全岛重要河川工程；设置农业机械化基金；开发新市镇及建立民居住宅；建立各县文化中心。其中有的项目，何应钦也曾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或其他单项建议中有所涉及。

(二)

何应钦名为一级上将战略顾问，他花在军事战略研究的精力，远不如他花在“道德战”、“心理战”上的多；他用在台湾经济社会建设上的心思，也比他用在军事上的多。他的确是一个闲不住的忙人，即使不在其位，也希望对其政有所谋。这并非是徒争虚名，实在是出于他干什么都希望有所作为，同时，也出于对蒋氏父子两代统治者的忠诚。当然，又可借劳动筋骨而转移失去权势和晚年失伴后的空虚。

晚年的何应钦，除去当局加封给他的“公职”之外，其社会兼职和荣誉头衔之多，恐怕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吧。他是台湾“中国童子军总会”的副会长兼总司令、“道德重整”联谊会的会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主任理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台湾观光协会名誉会长、贵州同乡会荣誉理事长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基金会、董事会、社团的负责人、大学的名誉博士等，还曾充当过“总统”特使、“陪同团团长”等角色。昔日军中的“武甘草”，似乎变成社会上的“文甘草”。什么人的婚礼，什么事情的剪彩，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只要请到他参加，无不增光添彩。就连台湾的“党国”要人死了，只要何应钦参加覆盖党旗、“国旗”，死者的哀荣也平添三分。

何应钦在履行“公务”和兼任社会职务中，大体公私一视同仁。所有

他经办的事，都能倾注心力，善始善终。他从事这些工作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无不与“反共”政治联系在一起。如他在参观考察台湾“十项建设”时，顺便参观了台湾国民党军的中正预备学校，发现该校的教育纲领中的“思想教育”部分，竟然未将“三民主义教育”与“反共思想教育”做必要的安排。事后他上书蒋经国，应在中正预备学校的“思想教育”中增设“三民主义教育”与“反共思想教育”两大主题，以加强军官后备队伍的思想训练。有鉴于中正预备学校实行封闭式的教育管理，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之不甚了解，故青年学生报考该校者不多。他因此又建议，最好能定期开放中正预备学校，让军、公、教人员参观，提高其知名度，吸引他们鼓励子女报考该校。

1970年10月25日至12月6日，何应钦肩负着台湾当局赋予的特殊使命，前往尚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南非共和国访问考察。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访问期间，何应钦发现台湾当局驻南非的“大使馆”和“总领事馆”都人少事繁，尽管工作人员夙夜辛劳，工作实难以开展。他还发现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西方国家对它也采取孤立政策。正是在这种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情势下，迫使南非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但南非又害怕与台湾当局仍保持“外交”关系，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强烈的反对。鉴于这种极其微妙的处境，何应钦返台后向当局汇报，建议对南非“应加强实际之工作，勿作过度之宣传，对于外电臆测有关‘两国’各种关系进展之报道，应予更正者，必须及时说明或纠正”。他认为南非地处要冲，控扼南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应防止共产党势力渗透。他建议台湾对南非“应提供其反共党统战之经验，以协助其打击共党渗透扩张之阴谋”。

在南非访问考察中，据台湾驻该国人员所提供的情况，何应钦对该国的经济状况有如下判断：南非的资源丰富，除石油外，均能自给，但其经济结构不健全，重工业亟待发展；出口的商品多为资源型产品，由外国加工后，再反输入该国以赚取高额利润。他建议台湾当局，应借助与南非多项互惠协定生效伊始的机会，积极加强与该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加台湾对南非的出口贸易。何应钦还建议台湾应争取在南非的华侨及其后裔，培养其亲台意识。他认为其人数虽少，但不可忽视。在南非的华侨及其后裔，许多人只会讲英语和当地语言，对“国语”已渐废弃。此种语言障碍极不利于台湾对南非政策的推进。他建议：应择优派遣文化、体育、戏剧

团体赴南非华侨居住地进行访问，激发他们对台湾的向往，并帮助当地华侨教育的复兴。何应钦还发现南非人酷爱橄榄球运动，一般华侨青年对此项运动的热情也极高。他认为台湾亦应尽快发展橄榄球运动，然后组队到南非进行访问比赛，以增进台湾与南非的关系。

何应钦的南非之行，最得意之处是获得南非总统接见了半小时。然而，最使他败兴和感到脸上无光者，是一些台湾游客到南非后，对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均不感兴趣，只热衷于抢购物品，似给当地人产生台湾生活困难、物资匮乏的不良印象。而南非为与台湾当局“建交”，曾派一摄制组赴台拍摄一部反映台湾情况的纪录片，由于台湾有关当局的指导不力，致使该片极为零乱，给观众印象不佳；更使何应钦看后啼笑皆非者，影片中将台湾一些重要官员的名字都弄错了。因此，他建议当局今后应注重台湾形象的塑造和宣传。

1979 年，已经 90 岁高龄的何应钦，获准赴瑞士柯峰，出席该年度的“世界道德重整”大会。他是怀着“最后的晚餐”那样的心情，前去与“MRA”的新老朋友告别。临行之前，蒋经国特别接见了何应钦，让他权作“总统”的“宣慰使”，替台湾当局去巡视驻外人员，会见所到地华侨社团领导人及各国有关人士，争取外界对台湾的支持与理解。

在出席会议前后，何应钦访问了雅典、西柏林、汉堡、维也纳、巴黎、伦敦及哥本哈根等这些他都曾经到过的地方。然而，今非昔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何应钦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已普遍被国际社会所否定，台湾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组成部分。所以何应钦访问这些城市时，都只能与非官方的人士接洽，会见的也只能是一些民间组织。但他每次会见华侨时，都没有忘记代表“总统”蒋经国向他们进行“宣慰”。

（三）

只要不涉及“反共”的事情，何应钦就不会那么激愤和极端的情绪化，有时会显得童心未泯和十分可爱。这次的欧洲之行，也有一件事表现了何应钦的另一面，并且被何应钦称为“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快事”！

事情是这样的：何应钦一行访问奥地利时，接待者特地安排他们到距维也纳约 40 分钟车程的维也纳森林山脚下的醉村去领略那里的音乐之乡的

风情。据陪同者之一的倪抟九回忆说：到达醉村，已是万家灯火。维也纳森林一片黝黑，非常安静。醉村内露天酒座可容纳 200 余人。何应钦叫他们 14 人将 3 张桌并起来对坐，呼酒小酌，纵谈天下事。其时，各国游客陆续入村，渐渐热闹。导游的张京德说：“此处有小型乐队，可供游客点奏名曲，或与客人伴奏。我们中国人，大都不愿表现，极少在如此陌生的公开场合引吭高歌，觉得有失庄重。维也纳为音乐王国，无论男女老幼，都能高歌一曲。”时近二更天，村内歌曲渐起。张京德向何应钦建议：“我们席中人是否可以参与唱歌？”何鼓掌称：“好！”张京德系维也纳大学文学博士，亦善歌唱，遂起立嘱乐队伴奏，先唱了一曲奥地利歌剧《中国人之恋》的主题曲，引得满院游客，击节称赞。何应钦问张唱的是什么歌曲？张答：“今晚酒客多为世界各国游客，如不唱《中国人之恋》，他们一定误会我们是日本人。”随后，张京德又唱了《卡门》中的三首歌曲。场内听众，已是欢声雷动，纷纷起身，围住何应钦一行的这 3 张桌子，鼓掌叫好。中国人的歌声如此打动外国人，令何应钦等人感到扬眉吐气，兴致更高。

此刻，院内各桌的西方游客都停止了歌唱，散立在这一群中国人的四周，希望再次欣赏中国人发大汉之天声。谁也没有料到，已 90 岁高龄的何应钦突然站了起来，整理一下西服领带，下达命令似地说：“看他们各国游客，对我们如此倾慕，我来破例唱一支歌，借以酬答他们的盛情。”张京德将何应钦的话向围观者们作了翻译，全场游客鼓掌，欢呼声四起。倪抟九等人猜想说：“敬公会唱什么歌？”这边正猜测时，沉重、严肃而洪亮的歌声已经响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原来，何应钦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歌声结束时，只见他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安详地就座。这时，四面八方的人头攒动在他们桌前，共同争睹这老当益壮的歌者，不少人啧啧称奇。

何应钦更豪兴大发，又请大家都站起来，一齐合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何应钦唱到最后的“朝天阙”三字时，更提高八度音阶，颇壮烈豪迈，直上青云。全体听者鼓掌叫好。张京德又将《满江红》和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简要作了翻译介绍，更引起一阵喝彩。何应钦更是激情高涨，愉悦万分。

醉村的四周是用一米高的短竹篱围绕。在何应钦等人唱歌时，篱外的游客，都将车子停下，站在篱外，静静地欣赏。突然，伏在竹篱顶端的一

位德国老人，向何应钦一行招手微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唱得不错，谁说中国人没有青年气概！"担任此行陪同的主人陆以正觉得此人出言有些孟浪，怕何应钦不高兴，遂站起来很礼貌地阻止他说："你不要误会，我们都已不是青年了，尤其是距你最近的这位老人家，今年业已九十高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我们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他曾经亲自接受日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是全球硕果仅存的世界名将，你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吧！"这位老者听了，立即向何应钦举手行军礼，貌甚恭谨，并说明他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少将军官，时年 79 岁，并一再向何应钦敬礼，连说："幸会，幸会！"然后才驱车离去①。

回到台湾以后，何应钦像当年给蒋介石写"折呈"一般恭谨，书面向蒋经国作情况汇报，并且还提出如下建议，供台湾当局参考：他建议仍应继续"运用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打击国际共产统战阴谋"；应注重"遴选娴熟共党理论及统战伎俩之爱国青年赴海外以增强反统战力量"；台湾的"驻外人员与侨社必须密切合作，政府对海外工作必须大力支持"；"文化交流工作要与观光旅游截然划分，以促进我海外文化工作之功能"；对"欧洲华商贸易应全力辅导，以提高欧洲侨胞之经济地位及向心力"②。

这次的欧洲之旅，是何应钦对蒋经国在他九十大寿时所给予的褒奖的回报，也表明台湾当局在海外进行"反共"政治宣传已进退维谷，从而企图在经济、文化领域寻找退步余地，利用"道德重整"运动开展所谓"实质外交"。无奈何应钦年事已高，不能再上第一线去叱咤风云之劳，只能"撰献具体建言，或呈当轴作策进之参考，或供省、市作施政指南针"③。

1979 年 12 月 3 日，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何应钦提出了《加速培养本党革命干部以应国家中兴大业需要案》。这项提案，缘于蒋经国在 11 月 24 日国民党建党八十五周年发表的讲话。蒋经国认为"一时的灾难是中兴事业一大考验"，要"中兴"需有"中兴的人才"；而"中兴人才"必须具备"中兴的气质与中兴的才识"。鉴于台湾岛上谈论"统一"

---

① 倪抟九：《何敬公威震维也纳森林》，《何应钦上将纪念集》，第 170～172 页。

② 《欧旅纪实——1979 年 9 月上"总统"书》。

③ 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序言》，1984 年 4 月。

之风渐起，蒋经国警告道："不要迷失自己的良知理性"，不要迷失对"党国"的"责任感"。这对"反共"之志老而弥坚的何应钦不啻是一种启示。因此，他在提案中建议：要健全国民党干部的培养制度；要更好地策定国民党的干部政策；要拟定培养国民党干部的计划；要改进国民党的用人制度及计划。使国民党的党员具备"才德、器识及牺牲精神"，使国民党的干部"适才适所"，"在反共复国的总目标下，发挥其才德器识"，以完成台湾的"中兴"大业①。

1981 年 6、7 月间，何应钦为扩展台湾民间在美国的关系，不顾年迈，到美国作了 40 天的旅行访问，此次访美的目的，除了旅游消闲外，是了解美国的潜力，借以判断它的前途，以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寻求一种特殊方式，保持和发展台、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何应钦在公开或正规场合，无论衣着仪表、言谈举止，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在生活中却平易近人，常常不经意地抖出些小幽默，表现他的人生历练与常人难有的风趣。访美期间，适值当年随他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工作的上尉参谋温哈熊在美国的一台湾机构供职，温便奉命全程陪同。纽约访问时，何应钦想看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话剧《小狐狸》。开演前，有两位女士坐在前座，其中一位转头向后，看着何应钦说："你一定是一位大官。"何反问道："你何以知道我是一位大官?"那女士说："我看你的仪态就是大官的样子。"何不置可否表示谢意。女士又问："请问你今年高寿!"何答道："三十九岁!"女士吃了一惊说："你一定是骗我!"何说："我实际是九十三岁。"女士说："你虽然不像三十九岁，但可真不像九十三岁。"引得近座者哈哈大笑。

何应钦访美归来后，对美国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希望台湾同仁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作新的估价。他在美国十几个重要城市参观访问后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供台湾决策者参考：

首先，从观念上来看，美国是一个国家安全至上的国家，它目前的国防潜力仍然领先于苏联。美国总统里根对共产党势力采取的强硬态度，使美国重新赢得了西方国家的信赖。

其次，美国立国时间虽短，却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凝结力量，当局又特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 21 ~ 22 页。

别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宣传，虽然时势更易，社会结构变迁，各种思想激荡，但美国的民族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仍然是传统的，有深厚的国家精神的潜力，值得台湾效法。

最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社会福利的推进却不遗余力，以此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用在国防安全上的经费太过庞大，经济复兴受到影响。美国许多失业者靠政府失业救济生活而日趋怠惰，此种社会福利流弊亦多。他认为台湾“似不宜贸然执行大规模的社会安全制度，必须以民生主义渐进的均富措施，来建立适合‘我国’财力的社会救助制度”①。

何应钦此次访美颇受蒋经国重视，请他在国民党中央联合纪念周上发表访美观感。何应钦介绍了美国的现实的一般情况后，向与会者建议：

（1）美国的国防科技潜力至为深厚，应善为运用，压制苏联，进而扭转美国“联中共以制苏俄”的态势，重振“反共”阵营。

（2）要学习美国注重民族力量的发展，以防止共产思想的渗透。

（3）美国经济财政上的潜力亦十分深厚，里根的经济政策调整一旦成功，便可节省更多经费投入军事需求。

（4）台湾应设法吸引在美华裔高科技专家回台效力，以加速台湾“国防”战备武器的自制能力。

（5）台湾应积极发展旅游观光事业，仿效美国利用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之长，充分发挥台湾自然景观的优势和文化色彩，吸引更多游客。

晚年的何应钦，自知时日不长，而他孜孜以求的仍是“反攻复国”，为此，先得保住台湾偏安一隅的格局；纵然“反攻复国”无望，也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移情山水寄雅兴　倡导旅游运匠心

（一）

何应钦的童年，是在贵州黔西南深山大箐的封闭状态中度过的。那种青山为伴、草木为友的生活，虽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智力的发展，但却涵养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38页。

了他热爱大自然的天性。

到台湾后，宝岛上的山水林木、苍山危崖，常常使他想起故乡那还保留着原始遗迹的风光。他频频地出洋考察访问、开会、旅游，使他意识到欧美、日本着力发展旅游观光事业，既可创汇又可借以宣传自身的双重效应。而台湾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当局却未着意加以利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何应钦就产生了利用台湾雄奇秀丽的风光、原始古朴的土著民风和祖国大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和历史瑰宝吸引外国观光客，既增加经济收入，又可收到一般宣传难以达到的使人们了解台湾的直观效果。但当时，旅游业作为现代社会强大的新兴产业的意识尚未引起国际间的广泛重视，何应钦的倡导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

1956年，随着赴台观光者日益增多，有关部门策划成立台湾观光协会，以开拓这一新兴产业。何应钦被聘请担任名誉会长。在该协会成立大会上，何应钦就发表了他对发展旅游观光事业重要性的见解。他认为观光事业不仅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影响重大，而且对建设台湾“反共基地”，吸引海外侨胞，树立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有重要关系。台湾观光协会应促进官方与民间合作，在旅游业上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于何应钦的努力奔走，发展观光旅游被列入“台湾省”政府的施政方针。

台湾观光协会成立以后，当局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在风景区道路的整建、旅馆的整顿及出入境手续的简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远远不够。20世纪50年代末期，台湾又面临美援逐年减少的严峻形势，要增加外汇收入，除了增加生产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大力发展旅游业势在必行。而且，美国政府在减少受援国家或地区美援的同时，也鼓励美国公民前往受援国家或地区去旅游，消费美元以代替政府的经济援助。何应钦认为争取美国人来台旅游，是弥补美援减少的一大良策。在他的策动下，台湾的观光协会加入菲律宾、日本、越南南方和中国香港联合举办的1961年“远东观光年”。

何应钦在《发展台湾观光事业》的文章中，表现了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鼓与呼的胆识。他说：“今天我们要谈观光事业，要赶上世界的新趋向，必须抛弃故步自封、各自为政的旧观念。目前我们的入出境手续、海关检查、山地入山管制等措施，在政策的制定或执行上是否需要及时修改和不断改进，这些问题都要加以检讨；同时政府对于观光事业，最低限度每年

应在预算中计列相当数目的经费，并从事长时期持续的投资。此外，所有观光事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由政府率先倡导并投下巨额资本，整建风景区及道路，向民间长期低息贷款，兴建观光旅馆，并从事国际宣传，进而保障民间的合法利润，然后才能激起民间投资观光事业的兴趣，朝野合作，相辅相成，以达成他们今天的局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他在文中还告诫政府和社会，对观光事业的合法利润应给予保障，不要“眼红”[①]。

何应钦对观光事业的许多见解和建议，都来自他出外旅游观光的切身感受和启示。何应钦曾到美国第50州的夏威夷岛访问，发现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当朋友陪他去参观海滨浴场观看土风舞时，那里只是一片广场，二三十个美丽的少女在那里身着民族盛装，轮番表演热情洋溢的呼啦舞。四周围着无数的观众，有的在尽情欣赏，有的在鼓掌欢呼，有的在拿着照相机争抢镜头。何应钦看得入了迷，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舞蹈的少女扭动腰板，晃动脑壳，而他的随员们都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些精彩的场景摄入镜头。这种土风舞的表演，既不出售门票，也没什么遮拦，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参观。何应钦心中十分纳闷，这群少女整天这么蹦跳，她们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询问陪同的友人，才知道这是美国柯达公司的活动广告，她们是由柯达公司雇佣的，专供游客免费欣赏，游客们为了拍下舞蹈的场面或与这些少女合影留念，他们在那里所消耗的胶卷，就柯达公司的收益来说，支付了她们的工资后还绰绰有余。由于有类似的观光项目的开展，夏威夷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旅游者络绎不绝，1955 年接待游客近 11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5500 万美元。这一收入在夏威夷的外汇收入中位居第三位，仅次于糖与凤梨出口的收入。何应钦认为台湾也可以开展土风舞之类的观光项目。

何应钦访问日本期间，了解到日本自 1956 年通过《发展观光事业五年计划》以来，旅游业逐年发展，到 1961 年，日本共接待外国游客达 30 多万人次；外汇收入可达到 1.2 亿美元。而日本为了执行这一五年计划，所投入的资金达 292 亿日元，其中由政府拨款 242.6 亿日元，各有关部门拨款 15.8 亿日元，其余由民间筹措。他认为台湾亦应采取此种办法，多渠

① 何应钦：《发展台湾观光事业》，《观光通讯》1959 年 12 月。

道、有计划地投入资金，开辟旅游资源。

1959年，何应钦接待了访问台湾的夏威夷参议员邝友良，邝对台湾观光事业发展前途十分乐观。他向何应钦分析了台湾的天时地利：台湾位于日本与香港之间，得地利之宜，加之风景优美，气候温和，花木终年盛开，实为发展观光事业的乐园；台湾的自然风光远胜于夏威夷，青翠的稻田、美丽的湖泊、碧绿的茶园，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情，实在令人向往。如能善加利用，力求发展，台湾观光事业的前途是十分远大的。何应钦对邝友良谈到如何发展台湾的观光事业时，认为尚有许多制约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全岛建立和健全发展观光事业的心理。“第一，要确立远大的眼光和计划”；“第二，要树立正常的观念与认识”；“第三，要倡导观光的兴趣和风气”；“第四，要保持特殊的趣味和风俗”[①]。何应钦反对台湾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在台湾应该以国家安全第一，不应该为了发展观光事业放宽入出境限制，疏忽了我们国家的安全。这种观念，其实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夏威夷的社会风气与一般旅游者的兴趣关系极大。他在夏威夷时，经常看见脖颈上套着花环的游客满街行走，人们对他们不仅不讪笑，反而以此表明他们是外来的旅游者，乐于为他们指点道路或充当导游，使游客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台湾则不然，如果有人在脖颈上套着花环满街走，必定招惹许多行人的围观、讪笑。何应钦认为台湾人缺乏外出旅游的情趣，尤其是青年学生，只知闭门读书，求升学。而在日本则不然，春秋两季，学校学生旅游的人几乎到处都是。据他估计，在日本的9000万人口中，每年外出旅游的不下于3000万人次。台湾由于学校提倡组织不力，社会上亦阻力重重，这不仅影响学生旅游观光的兴趣，阻滞观光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学生增长知识和提高身体素质都是不利的。

何应钦从国外的旅游业经验中受到诸多启示，他发表文章，主张观光事业的特色，是“重在使旅客每至一个地方皆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才能提高其兴趣，增强号召和吸引力。他反对那种“以为要招徕外国观光客，就一切都要外国化”的观点。他认为旅游业的“国际标准”，并不是指“国际化”而言，“其实只不过是要适应国际观光旅客的生活而已”。只有“保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有风格”，才能吸引游客的兴趣。他联系台湾的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137页。

实际建议："如嫌乌来或日月潭的高山族舞过于单调，尽可就其原有风格，加以充实和改良，再从增强人员、扩大场面等方面着手，决不可掺杂丝毫现代舞的格调，致使失原有高山族舞蹈的特殊风格，反而不为观光客所欢迎了。""在适当的风景区，建筑一些古色古香富有东方美的宫殿式的观光旅馆，这比建筑一个现代新式立体型建筑，也许要更为观光旅客所欣赏"[①]。他认为矗立在菲律宾马尼拉杜威士道上的台湾"大使馆"，由于是一座具有中国古典宫殿式的建筑，从而成为马尼拉湾上一个吸引游人的风景点，就是他上述观点的论证。

（二）

为了创建一个具有台湾风格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大型旅游胜地，1969 年 2 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会员上提出议案：辟建五指山为"国家公园"。

这一议案不是何应钦想当然提出来的，而是他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对五指山的旅游资源及条件进行综合考察之后才提出来的。1968 年夏天，已经年近八旬的何应钦，几次随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规划设计人员亲赴五指山下的汐止镇、碧山岩及五指山作实地勘察，认为五指山具有作为"国家公园"的有利条件。

五指山因五峰相连，耸立云端，形如五指伸开而得名。据《淡水厅志》载："（五指山）屹立云霄，环排秀峭，为厅治之祖山。"清代被列为全淡八景之一，名曰"五指凌霄"，又列为堑南八景之一，名"五指连云"；在日据时代，经全台投票，选为"十二胜"之一，名列第七位。游人由入口处登山，从低渐高，分别可揽"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五峰的奇丽风光。前人王友竹有诗咏五指山道：

> 五笏巍峨冠海东，巨灵伸手欲摩空。
> 夜来遥见峰头月，一颗明珠弄掌中。

云雾缭绕、神秘莫测的五指山顶端，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约 800 公顷

---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 143 页。

的平原，其中林木覆盖面积约281公顷，何应钦认为是公园各项建筑的理想基地。山顶附近的林地总面积约为3800公顷，几乎全为台湾官方所有，无征地搬迁居民之困难。何应钦通过考察，看到五指山区附近有天然的瀑布、佛教寺院，如久负盛名的拱北殿、碧山寺等；五指山区内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计划地植树造林，目前山区内的美国松、环球松和相思树等的树龄均在10年以上，苍翠挺秀，景色宜人，已初具欣赏价值。五指山区交通方便，由台北市、台北县、基隆市及阳明山等地乘车前往五指山边缘地带，车行只需一个小时左右。如将现行车路拓宽平整，即可畅行无阻。何应钦指出，如将五指山规划辟为“国家公园”，即可使附近的数百万居民有游息之所，使山区的居民利用旅游观光业增加收入，更可促进整个台湾旅游业的发展。何应钦认为，从政治上考虑，辟建这一“国家公园”，还可宣传台湾关注国民健康、保存历史文物、保护珍稀动植物，诚为一举数得之兴利要策。

何应钦列举出美国的黄石公园，中南美洲各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以及南非、肯尼亚等均有国家公园，其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都为世所公认。台湾现有的太鲁阁、日月潭、澄清湖、阳明山等虽已初具公园规模，但面积较小，应在充实扩大上述各旅游点设施的基础上，大力规划投资五指山“国家公园”的建设①。

何应钦的这一议案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函请“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研究办理。经蒋彦士与台北区区域委员会主任董文琦会商，同意五指山附近适于辟建公园，该会的区域规划业已采纳。但何应钦提案中的公园与该会规划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地域毗连，故一并予以考虑。批复虽肯定，但行动迟迟复迟迟，不见五指山区大兴土木，就是近在台北咫尺的阳明山也未按计划积极辟建。

1981年，何应钦又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提出《请辟阳明山国家公园案》。他援引当局颁布的“国家公园法”，认为辟建阳明山“国家公园”，其总面积为1万公顷，已涵盖五指山“国家公园”，故放弃原提案，而建议以阳明山公园为中心，连接附近山岳扩建为“阳明山国家公园”。

何应钦构想中的“阳明山国家公园”，以初具公园规模的阳明山为中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145～147页。

心，西至淡水镇，南至台北林区，东至台北县万里乡，北至三芝、石门及金山三乡，总面积约1万公顷。临近白沙湾及金山海水浴场，已有高尔夫球场数处。距桃园国际机场、基隆港及台北市均不过半小时车程。在“阳明山国家公园”中，包括七星山、大屯山、小观音山、面天山、磺嘴山、纱帽山及五指山、竹篙山、阳明山、七股山等山群，更有溪流潺潺，瀑布飞流，草原青青，湖泊悬镜，温泉涤尘，足以代表台湾的自然遗产。其中还有箭竹山、梦幻湖、火山口、竹子湖等名胜。山林中的野生孑遗植物千余种、野生杜鹃30余种，为世界所罕见。原阳明山公园内，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大屯山系于右任墓园所在地，也是建筑风格独特的“中国文化大学”的所在地。在这样的基础上辟建“国家公园”是可行的。

这一议案虽被采纳，但工程浩繁，耗资费时，何应钦生前，未能看见这一构想变成现实。

(三)

大约是他坚定的信仰使然，何应钦在考虑旅游景点的命名时，总是喜欢把“反共”的政治理念和对蒋介石的崇拜掺和其中。如1980年8月，他对台北中正纪念堂内景观的命名，便煞费了苦心。中正纪念堂是一座集纪念性与观赏性为一体的古典园林建筑，落成后，却有两池未命名。何应钦参观以后，建议在两个池中放置1.4万条大小不同的锦鲤供人观赏。此外，他还写成书面意见，建议将左边的池子命名为“景泰池”或“云汉池”，前者因蒋介石早年自署私名为“周泰”，故有景慕之义；同时可暗喻蒋介石使台湾“国泰民安”，渐趋均富社会之境界。后者的含义源于诗经中的“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云汉指天河，“以此比周文王之德，如天河在天也”。对于右边池子的命名，何应钦也提供了两个供选择：一为“怀清池”，因蒋介石留学日本时的学名为蒋志清，以“怀清”为池名，既颂蒋在“反共”方面“志节坚定，智虑清明”，又寓如能遵循蒋的教训，必可使台湾民众“思想清明，世界承平”；另一名为“光华池”，缘自虞舜所作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两池“有日月之象，并有重光中华之用意”①。

1981年11月30日，台湾观光协会成立25周年，台湾的旅游业也有

① 何应钦：《中正纪念堂水池命名建议》（1980年8月23日）。

了长足的发展，何应钦的许多建议和促进旅游业发展所做的工作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经何应钦统计，1956 年，到台湾旅游的人仅 1.4 万多人，而到 1981 年，已达 140 多万人，增加了 100 倍。25 年前，旅游业创汇 93 万多美元，到 1981 年可望超过 10 亿美元，增加 1070 多倍。他在纪念会上致词，他认为台湾仅把旅游业当做一项“综合性的产业”还不够，必须如韩国那样，把它当做“战略产业”来对待，再投入大量资金、资源和人力，并要扩大国际宣传，使台湾的“国家风景特定区”，除具备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功能外，还应大力整建观光旅游设施，使之成为发展旅游观光业的一大特色。他计划到 1986 年，台湾观光协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到台旅游者超过 250 万人次，旅游创汇能达到 30 亿美元。为达此目标，他提出了七条措施：



1981 年台湾观光协会成立 25 周年，何应钦向会长袁仲珊颁礼纪念

第一，采取美国发展旅游事业突出国家公园的优点，以我们的天然景观条件和特点，发展出我们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国家”风景特区。

第二，宽列国际宣传推广经费，深入海外宣传，借以揳入日、美及东南亚等观光市场，进而拓展纽（新）西兰、澳、中东及欧洲市场。

第三，改善风景区厕所卫生设备，以期达到国际水准，希望“交通部”观光局分期编列年度预算分批完成。

第四，风景区内广设现代化停车场，视地区性质加以规划，原则上以

能容纳200辆汽车为最低要求，似应由“行政院”辖市及各风景区所在地县市政府先期规划，必须预购土地，再分期编制预算逐步完成。

第五，规定旅游区域合理售价，以减轻消费负担，并建立商品标价及不二价制度，以维持良好信誉。

第六，规定公墓条例，参照美国夏威夷军人公墓标准，建立台湾公墓制度，以维护景观。

第七，改善交通秩序，加强汽车驾驶人员训练管理与罚则，以利观光事业的发展①。

1982年7月，应台湾当局“国防部长”宋长志、参谋总长郝柏村的邀请，何应钦与他们一道前往阿里山避暑消夏。在消闲之余，他留心体察阿里山的旅游资源及如何改善观光条件。何应钦他们的车队顺着阿里山的环山公路蜿蜒而行，在距离宾馆尚有相当距离时，则只得停车步行，因公路尚未通达宾馆。次日，何应钦、宋长志、郝柏村及随行人员天未明便启程，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山顶去观日出。毕竟年逾九十，腰腿乏力，精力不济，游兴大减，面对灿烂的旭日云海，何应钦在激动的同时又若有所虑。

回到台北后，他由自己推想到别的老年人或伤残人，形成了关于改善阿里山旅游条件的设想，认为为了照顾老年人、残疾人及负重者旅游，应将现有的汽车道路延伸至火车站、阿里山宾馆及观日出之大楼等游客必经之地，以减少游客上下台阶和避免日晒雨淋，应考虑老年人及残疾人以轮椅代步者的方便，在主要景区修整道路，使他们易于通达。他有感于住在阿里山宾馆中，吃一餐饭得上下三层楼梯，实在有苦难言，建议宾馆内应从速安装电梯。阿里山的风光，早已驰名中外，但在“旅游专家”何应钦挑剔的目光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阿里山除以樱花、神木、日出及云海取胜外，尚无其他足以使游客流连忘返的景观。他建议可按开花时序，有计划地大量培植和栽种适合于阿里山气候、土壤的樱花、石楠、剑兰、波斯菊、绣球、牡丹、芍药及百合、圣诞红及其他稀有花卉，使阿里山成为一具有地域特色的大花园及稀有品种的大花圃。如此一来，花海与云海辉映，必能吸引更多的游人。

---

① 何应钦：《台湾观光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致词》（1981年11月30日）。

何应钦此次阿里山之行，见常人所不见，虑常人所不虑，真可谓推己及人。作为旅游观光的倡导者和爱好者，何应钦常常被邀请参加各种风景名胜的命名、修竣典礼；台北有什么大型的花卉展览，也必请何应钦前去观赏。在各种花卉中，他对兰花有特殊的偏爱。因此，他对台湾的兰艺事业着意扶植，并极力倡导向产业化发展，使之走出台湾，打入国际市场。

晚年的何应钦寄情于山水林木，以老年人特有的精细及童心，对台湾旅游业发展的诸多构想和建议，确有一定价值。如果剔除其中自主或非自主地添加进去的“反共复国”的政治佐料，确实不乏合理的远见卓识。旅游业作为一项潜力雄厚的新兴产业在台湾的迅速发展，与何应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大力鼓吹提倡是有关系的。

针砭时弊说革新　挽救世风倡文明

(一)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在检讨为什么失去大陆时，公开承认教育的失败和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给他们的打击是沉重的。蒋介石曾说过：“最重要而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此次全国失败的主因[①]。”蒋介石所指的“教育的失败”，是特指他们在教育方针的制定和整个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而学校中则存在着“升学主义、形式主义和孤立主义三个缺点”[②]。蒋介石既然定了调，何应钦自然不会离谱。如果说他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从侧面加强台湾反共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的话，那么，他对于国民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则是直接以“反共复国”为目的，而他对于改进台湾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议及倡导文明世风等举措，既是贯彻蒋介石反共教育的纲领，又是针对台湾教育和社会风气上确实严重存在的种种弊端，希冀有所匡正补救。

---

① 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之教育》，转引自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第1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② 蒋介石，《救国教育》，见郭为藩：《“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第65页，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

随着迟暮之年的到来和对官场角逐的厌倦，何应钦与亲朋好友聚会时，谈话的主题就有所转移，对“国事”讳莫如深，对家事私事则细致入微。

一次，老友相聚，都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人，操心儿孙们的事比操心自己的事更甚。谈及孙子们上学读书的事，每个人都感慨良多。去台之初，何应钦唯一的养女考入台湾大学政治系，他的侄儿侄女们也可凭志愿进入自己想进的大学，他们似乎没花费多少心思。可随着台湾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要投考台大之类的名牌学校，其竞争之激烈，远非一般人能想象。而有地位或有远见的人家的子女，学文的多以考入台大为荣，学理工的，则以考入成功大学为荣。这种以升名牌大学为目的的教育，使许多天真烂漫的小孩也背上沉重的升学包袱。有位朋友向何应钦诉说，他的孙子才读五年级，同班同学中因学业过重，教科书上的字太小，尤其是注音符号非得凑近不能看清，成为近视的就有20多人。而另一个朋友的孙子读六年级，为了升入重点中学，每天都要攻读到夜里12点钟以后，而早晨五六点钟就得起床，弄得父母也陪伴他迟睡早起。这样的事儿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促使何应钦呼吁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关注教育的改进。

早在20世纪60年代，何应钦就对台湾教育状况表现了急切的忧思。他认为台湾的中小学教育问题，已“为今日社会人人所诟病，而又与我们人人休戚相关”。尽管台湾当局一直在加强对各级学校教育的控制，也进行了不少的改革，但左右着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升学主义”仍在作祟，带来的另一弊端是“恶性补习”。台湾当局虽已明令禁止“恶性补习”，但学生想补，学校要补，家长愿补，无法禁止。“家长们既然希望子弟个个能升学，学校也希望提高升学比率，于是只有不顾一切，采取恶性补习的方法，拼命加重学生的负担，弄得小学生视读书为苦差事，中学生往往深夜钻研，这样睡眠不足，妨害学生身体健康，后果的严重，真是不堪设想”！如此一来，资质好而以拼命苦读侥幸考取好学校的学生，不是弄得弯腰驼背，也是健康不良；而差一些的学生，考进了差的学校者，视读书为畏途；考不取学校者，流落社会，渐渐步入歧途，终于沦为不良少年，“这是眼前我们中小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①。

当然，何应钦是不能透彻了解造成“升学主义”成为台湾严重的社会

---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52～53页。

问题，乃至被人称作“教育之癌”的根本原因的。“升学主义”长期横流，是台湾社会传统观念的沿袭和现行人事、用人制度对学历过分强调的结果，也是台湾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前后所具有的特征。

应该承认，何应钦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某些认识是基本正确的。他说：“教育原来是国家建设的百年大计，而中小学教育则是一国教育的根本”；“通常说来，大学是一种专门教育，中学是一种知能教育，小学是一种基础教育，因此，中小学教育应该以教学生学做人学做事为基础，充实其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为目的，而不是只以升学为目的的升学主义”。他认为教育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与群育四者”，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台湾，几乎把智育当做整个教育，忽略了德育、体育与群育。何应钦所说的“德育”，自然是他所遵循的以“反共”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思想、伦理、道德的教育。

1964年1月，何应钦就主张“延长义务教育为九年”。在台湾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先从县市办初中做起，取消初级职业学校，一律改为初中，一面鼓励私人兴学，一面在同时要力求初级中学师资、设备的平均发展，使人人对于所办的学校有一个良好的印象，这样可以减少小学毕业后升学的竞争，恶性补习便自然不难消除。高中则应该尽量增设高级职业学校，使初中毕业除了升入高中外，另有一个学习谋生技能的机会，这样分头并进，也自然可以减少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的竞争”[①]。何应钦这一讲话发表四年之后，台湾当局才确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何应钦一贯鼓吹台湾应注重反共精神教育，以此来充实现阶段的教育政策，提高国民党官兵和台湾民众的“思想战力”。他认为台湾“当前反共战争之本质，实为一种思想文化斗争”。其所根据的理由是：中共“为求不战而屈人之兵，遂在军事战之外，爆发了思想战，尤以今后核子武器之威胁，思想战之比重，更超越军事战之上”[②]。他不满台湾现行的教育政策，认为其有关于思想方面者，不外乎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及民族精神教育，反共意识极为薄弱。据他所作的统计，1972年前后，台湾国民党士兵中，高中毕业者占35%，初中毕业者占28%，小学毕业者占27%，

---

① 何应钦：《我对中小学教育的看法》，1964年1月18日在台北西区扶轮社的讲演词。

②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64页。

文化素质较以前虽有提高，但反共的“思想素质”却十分薄弱。有一次，何应钦视察军营时，问一士兵道：三民主义是什么？士兵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倒可以约略说个梗概，但当问到什么是共产党时，士兵则不能作有条理的答复。他把台湾青年反共情绪的低落归咎于入营前的学校教育，认为中小学只注重智育而不注重反共精神教育。他说：“倘军人于入营前所受之教育，‘反共’意识不浓，则殊难望其人营后，具有强烈反共之概念。”而台湾不少留学生一出境，稍遇共产主义之“诱惑”，思想便发生变化，甚或竟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原因何在？何应钦的回答是：“皆因未受反共精神教育之训练所致[1]。”

有鉴于台湾青年对反共失去兴趣，何应钦建议国民党中央，责成台湾当局“行政院”和“教育部”，“确定反共精神教育，为今后教育政策之骨干”；“在各级学校中，普遍实施反共精神教育，养成现代青年反共的人生观，使人人均有反共的坚定立场”；“三民主义教学，应求朴实浅近，勿偏重哲学理论之阐发，以使青年得以充分接受”；“延聘专家，编纂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之浅近教材”，并利用学校之外的各种传播工具，扩大影响[2]。

（二）

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家的何应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军事思想与谋略也早已陈旧，但作为不乏经文之才的何应钦，耄耋之年，依然儒雅风流，不断地以其活跃的思想，孜孜不倦地发挥着余热。

他是台湾提倡简化汉字的人物之一。

1969 年 4 月 10 日，何应钦在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整理简笔字的议案。他认为汉字源远流长，由简到繁、由繁到简是汉字历史演化的必然趋势。他之所以倡行简笔字，既是顺应简笔字自然形成的趋势，也是“基于教育、社会及军事上的需要”。其所说的“军事上需要”，是特指所谓“大陆光复后文教设施上需要”。为了提出整理简笔字的议案，何应钦曾征求过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以及“中央研

---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 65 页。
②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 66 页。

究院”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支持。

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为了使用方便和规范，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含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然而，何应钦由于反共思想根深蒂固和超常的强烈，在建议整理简笔字时，也硬要加上他的“政治性”，要求“与大陆中共制造简体字的意义与目的，截然不同”，这的确使专家学者都不解。

他“整理简笔字”的具体主张是：“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将已经有的简笔进行研究整理，分类确定简化标准，去芜存菁，以资使用便捷；整理完竣的简笔字，应由“教育部”颁发至各学校，“行政院”颁令各机关施行，“文化局”应负责推广简笔字的宣传、提倡工作，以便在全岛上普及开来；“新闻局”应通饬各级报馆，首先倡导简笔字，并另铸简笔铜模，以备铸字之用。何应钦唯恐简笔以后与祖国大陆所使用的简化汉字相同，特别强调：“整理简笔字，应先研究中共之简体字，务使其无混淆不清之弊；在筹编光复大陆所准备用以再教育之教科书及其他宣传品中予以合作，以收教育宣传深入共区人民之效。”何应钦的这一提法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亲自批示：“本案至为重要，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应约集专家学者，组成专案小组，运用科学方法，审慎研究[①]。”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提案戴上了一顶“至为重要”的高帽子，究其用意，并非在于简化汉字本身，而在于何应钦每做一件事都牢记他的“反共”训示，借此提案从侧面说明他的“反攻大陆”并非空头支票。犹如“反攻大陆”永无兑现之日一样，何应钦所提倡的简笔字，虽说有实际意义，但却无法实行。原因就在于它不能与大陆的简化字“混淆不清”。这不难煞了那些专家学者吗？文字学既是科学，它有其规律性，同样的汉字，岂能因政治制度不同而另出现新的规律？大陆的简化汉字方案具有科学性、适用性，符合汉字造字和书写的规律，而何应钦不允许台湾的简笔字与之重复，岂不荒唐？虽有蒋介石的批示，但专家学者们反复研究，都无法使台湾通行的繁体汉字“简笔”以后，不与祖国大陆的简化汉字相“混淆”。于是，1970年年底，“教育部”对何应钦的提案作了否定。

这么多年过去了，台湾社会上倒有不少人关注何应钦所提倡的“简笔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358～1359页。

字”，希望台湾也能像祖国大陆一样使用简化字。何应钦至死也没有意识到他当年的提案最终被否定，是在于其所强调的“反共”目的，使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无法操作，即使仓颉再生，也难达到何应钦的要求。但何应钦生前却把提案被否定归咎于主管方面不重视，一气之下，干脆自己掏钱，把他有关“简笔字”的见解、议案汇辑成书，于1979年12月10日印刷成书，书名为《整理简笔字提案的回顾与前瞻》。书中内容分别为引言；提案原文；我对整理“简笔字”的构想；“立法委员”洪炎秋的质询；本案提出后学者专家的反应；本案提出后报章的评论；本案提出后各报访问纪要；整理简笔字的前途；后记等九部分。何应钦出这本书的目的，大约是寄希望有后来者，能将他这一以反科学的方法用来从事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利用台湾民众要求简化汉字的愿望，以推销“反共复国”货色。抑或只是以此对社会作一个交代，责任不在他，而在主管部门的否定。台湾一些学者认为与其叫“简笔字”，不如叫“俗字”，一则取“约定俗成”之意，再者也能与祖国大陆的简化字区别。从“简笔字”议案中，人们又看到何应钦再次陷入不能自拔的“反共”的泥沼中。

(三)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也随之泛滥，社会风气败坏。1979年，他90岁生日时，国际狮子会“中华民国总会”赠款100万元新台币作寿礼。何应钦将这笔款全部捐出，作专户储蓄，以其利息作为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他发起成立“拾金不昧，临财不苟义行奖励基金会”。基金会成立董事会时，何应钦被推举为会长。这一由何应钦所创建的奖励名为“金圣奖”。该奖励分三个等次：凡拾获财物价值新台币10万元以上者，经审核后可获金质孔子浮像的“金圣奖章”一枚；凡拾获财物价值新台币10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者，经审核后可获金质奖牌的“金质奖”；凡拾获财物价值在新台币1万元以下5000元以上者，经审核后颁给奖状。

1980年10月31日，是已死去的蒋介石93岁冥寿，何应钦选择这天举行首届“金圣奖”的颁奖典礼。何应钦亲自给30位拾金不昧、临财不苟的受奖人颁奖。他在致词中说：“拾金不昧、临财不苟，是中华民族最高贵的道德风范，数千年来，为国内外人士一致推崇。在当前工业社会里，能维持这一高贵情操而不堕，实在是由于中华文化所奠下的深厚根

基。”他把台湾社会拜金主义流行，归咎于所谓“共产思想流毒”；而“金圣奖”的设立，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以“掌握复兴中华文化的重点之一，表达我对中国道德的尊崇，和对‘总统’蒋公遗训的实践”[①]。

1981年11月1日，何应钦在第二届“金圣奖”颁奖典礼的致词中又说：“应钦创立‘金圣奖’颁发的目的，主要在于借孔圣学说的伟大思想——仁义忠恕，对各位义行者作精神上的鼓励，同时对社会上良好风气激励、发扬，以匡正工业社会所引发的幸得反常心理。希望这些义行，更加扩大，更能深入，作为发扬中华文化运动中一项具体的表现[②]。”

自此以后，何应钦便利用一年一度的“金圣奖”颁奖典礼，发表他关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反共复国”服务的高论，把一桩原本有助于社会风气净化的善举，蒙上“反共”色彩。

为了匡正世风，何应钦还积极支持台湾敬老基金会创立的梅花俱乐部的工作，希望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由梅花俱乐部推广至全台湾，给老年人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生活环境。

（四）

何应钦在政治上是极端顽固而守旧的，但作为台湾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亲历者，他的传统观念在非政治领域却又是较易吐故纳新，有时也能跟上人类文明的脚步。如他对人口问题和家庭问题的见解，颇能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符，且超越一般目光短浅者。

台湾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地区，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人口却过速增长，需求之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台湾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的问题。何应钦是较早主张计划生育、计划家庭的人物之一。

1965年，台湾“中国家庭计划协会”总干事舒子宽女士将出版《家庭计划特刊》，请何应钦写一篇短文。于是，何应钦写了《人口问题与计划家庭》，系统地陈述了他对控制台湾人口增长的见解。

---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555、1578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555、1578页。

他在文章中指出，人口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于人类生活逐渐改善，和医药卫生的日渐进步，使世界人口增加，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一个自然现象。”他援引了世界人口从1940年的25亿人增到1964年的32亿人的数据，预测若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100年后的世界人口，可能增加到192亿人以上。到那时，“人类经济生活也许会形成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还征引了欧美、日本、南美诸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数据，以及每个家庭的人口平均数来对照台湾的现状。他说：“反观我们台湾，人口增殖率之高，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据统计每年增殖率高达35‰，最低也在31.8‰以上，这个增殖的速率，对国民经济的成长，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而台湾农村、渔村生育率之高，大大超过城市。台湾“四健会”曾在宜兰县作过实地调查，宜兰农村每个家庭平均人口多在10人以上，每一农家平均有子女6人左右，而每户农民占有的耕地不过0.693公顷。因此，农村必须节制生育，以免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的增长速度。

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何应钦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当局应该及早确立人口政策，绝不能囿于“多子多孙多福”和“人多好种田”等旧观念，而因循不决，致使人口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今日世界各国已公认采取避孕方法以节制生育，是一种正当的手段，当局应该公开指导避孕方法；倡导扩大计划家庭运动。台湾的“计划家庭协会”成立几年后，其服务范围不仅是指导避孕，“同时对希望生育的男女给予指导，更帮助贫苦人民抚育婴儿，为贫苦妇女义务诊疗”，值得鼓励。何应钦寄希望于“计划家庭运动”的扩大，使台湾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得以控制，以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①。

为了进一步申述自己关于节制生育的观点和有效解决台湾人口问题，何应钦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形成议案，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提出。他在《为建设确立健全人口政策以奠定自由安全社会基础案》中，吁请台湾当局“及早确立健全人口政策，积极奖励节育，以谋此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政府在内政部设置人口问题主管机关，确立健全的人口政策”；“迅即制定奖励节育办法并宽筹经费”；

---

① 何应钦：《人口问题与计划家庭》，(台)《家庭计划特刊》1965年6月号。

“扩大农村及渔盐矿厂节育宣传”；“辅导并奖励推展计划家庭运动”[1]。

（五）

何应钦对台湾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政规划及建设也倾注了不少的心力。早在1956年，他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赴瑞士，在国外的76天里，他周游了18个国家，回台后便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游观感》发表，文中按他所见的北欧、西欧的城市状况，对台北市的改扩建问题提出了积极建议。

当时的台北市，规模基本上还是1934年日本殖民当局制定的，市区总面积仅66平方千米，早已不适应台北市发展的需要了。他认为应以此为基础和蓝本，重新制订大台北的建设计划。他认为制订这一计划，首先必须事前虑及长期而久远的都市规模，根据人口规模而划分若干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然后在每个区域里，划定政府机关、学校、公园或林木草地及教堂、体育场馆等；其次必须解决城市的下水管道、交通道路及水电设施。他构想的大台北蓝图，包括当时的台北市区和近郊的士林、三重、中和、景美、本栅、南港、内湖等地区，以10年内发展为200万人的大都市为远景。而他认为，目前有碍台北市区发展规划的问题，是违章建筑太多，亟须下大力气加以整治。

1968年9月27日，在国民党九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何应钦提出议案，建议台湾当局督饬台北市政府，积极计划，分期完成台北市区公园及绿场之建设，以实现台北市的现代化，并维护市民的健康。他在提案中陈述道：“公园与绿场之功能，重在调节人口密度，净化市区空气，美化市区环境，调节市民身心，故现代都市计划，无不注重公园与绿场之设置。”据他所知，在欧美的大都市中，公园与绿场面积最广者，首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有林木花草覆盖的大小绿场约500余处，人均占有面积约40平方米，因而空气清新，水质良好，人的精神亦为之振作；而日本东京现代化程度虽高，但人均占有绿地仅8平方米。台北市原规划的公园绿地占地仅41.7公顷，人均占有绿地面积不足0.4平方米，与国际现代都市的差距甚大。不仅如此，市区内的违章建筑或其他建筑不断侵占市区内的绿化地，人均占有

---

① 《历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汇辑》，第77页。

绿地面积会越来越少。应尽快清理拆除，以维护市民的健康。尤其是台北扩建的新市区，必须尽早规划，将绿化工作与市区扩建同步进行。

在公益福利事业方面。何应钦是心常系之。1971 年的一天，何应钦郊游时，见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小孩，一经询问，才知道都是因其父亲骑摩托车丧生者的孤儿。回私邸后，他就筹划如何救助这些孤儿。碰巧他的日本好友佐藤彦八来台，捐献了 700 万日元。何应钦便组成了“财团法人交通事故子女救助会”，扶助救济那些因交通事故丧生者的子女，每年至少有 3000 人获得救助。他还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建议，应规定骑摩托车的人必须戴安全帽，获得采纳，由交通部门颁布执行。台湾岛上骑摩托者均戴安全帽之肇端，实缘于何应钦的提案。

此外，对台湾的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台北青年公园、树林镇南宫图书馆、埔里老人区社改建等项目，他都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建议。为了节约土地、美化都市环境，他还建议当局迅速制定和实施公墓条例，使公墓公园化，以发扬中华文化慎终追远之精神。他认为台湾社会公益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方便老年人及残疾人。他还建议台北当局应尽早拓宽市区道路，全台城镇应普遍设置人行道，维护行人安全；汽车应普遍装置安全设置，确保乘客安全；等等。

晚年的何应钦，依然谨守着自己平生养成的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等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相对的廉洁崇俭，并由此赢得人们的尊重。但他对台湾社会风气的败坏，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官场中的权力纷争，社会上土著与客籍人之间的矛盾等，或抨击，或建言，或调和，或超然乃至视而不见，都不过是表明一个饱经沧桑者的处世态度而已。诚如他曾经身膺国民党军事重任而不能挽救国民党军的惨败一样，他晚年身兼各种社会要职，却无法使人们按照他的意志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不管何应钦刮的什么风，下的什么雨，生活在台湾岛上的各种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不由他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七、乡情煎熬中的魂归人

贤内助患绝症　好丈夫侃长寿

（一）

何应钦去台以后，凭借了追随蒋介石数十年所熬炼出的韧、忍二性，对于权力的得失、宦海的浮沉、名誉的褒贬以及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国民党的老将们大体都曾有过的遭遇尚能处之泰然。更凭着他对国民党的忠诚和性行的豁达，待人的谦和，办事的严慎，虽然没有权势可以操纵，但上自蒋介石、蒋经国，下至一般当权者，对这位蒋介石"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和"同舟共济"的老将军的尊崇，姑不论其内心的真意如何，却又是一般老将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说过：何应钦有大将才能，福将命运。这话颇受一般国民党官场中人所推崇。"大将"的历史早成明日黄花、过眼云烟，而"福将"的机运却依然频频光顾，令失势又失宠者眼红。局外人只见何应钦"福能双至"，却不解他祸不单行的苦衷。

是跟随何应钦提心吊胆地在"反共"战争中奔波和在官场上周旋而过分紧张？是从权力的巅峰一下跌落到低谷的愁烦？是惨败后蛰居海隅的绝望和悒郁？抑或是"上帝"不经意的赐予？1952 年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经李士伟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子宫癌。尽管他俩对这种病的后果都有确信无疑的恐惧，但仍一如对待任何宠辱祸福那样，显得冷静达观。何应钦十分清楚，相依为命的妻子患了绝症，远比失去权力对他晚年生活的影响更大。几十年来，他生命的航船在宦海的险风恶浪中出没，在各种战火的硝烟中颠簸，只要回到家中，总有一个温馨舒适的港湾让他停泊。诚笃深切的夫妻感情这才是完全属于他而别人无法夺去的。上帝为何对自己虔诚的信徒如此不公？偏在何应钦前途命运又一重大转折的时期雪上加霜，这使

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楚。

王文湘虽出身于富贵之家，但禀性平实简朴，较少以富贵娇人自居，且能吃苦耐劳，既可为何应钦主持家政，又协助他从事社会活动。当何应钦东征胜利后，率领蒋介石发家的老本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坐镇广东潮、梅、汕一带时，王文湘即联络当地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潮汕分会，并负责妇女工作，她“反对共产邪说……卓著绩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王文湘深感何应钦所负责任重大，“于是谢绝一切外务，专门操持家政，对于何上将的饮食起居，家中的琐屑事务，女儿和侄儿辈的抚育教导，亲戚故旧的应酬接济，部属的关切照顾，事无巨细，莫不亲自处理”[①]。何应钦之得人缘，确有王文湘斡旋之功，处理之当。由于何应钦害怕蒋介石怀疑他培植私人势力，故在用人上特别谨慎。但凡在贵州人或各种关系之人向他求职，而何又不便拒绝和推诿时，往往由王文湘出面，旁敲侧击予以挡驾，故一些贵州籍国民党官场中人，对何应钦印象颇好，但对王文湘却不乏微词，认为她“衣裳角也扇得死人”。



何应钦夫妇在替人祝寿会上切生日蛋糕

何应钦夫妇终身无出，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便将自己的爱女丽珠过继给哥嫂，使他俩不至在外表的轰轰烈烈之后感到膝下凄凉。

① 张志韩：《何夫人王文湘女士行谊》，载《黔人》季刊第1卷，第37页。

何应钦夫妇视女公子真如掌上明珠，关切疼爱备至。何丽珠生性聪慧。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奉派为台湾当局驻美国“领事馆”任副领事。毕竟双亲年迈，膝下无人，不由得何丽珠不起归思。她多次申请回台，均未获批准。何应钦又常以“恪尽职守”、“忠于党国”即为至孝相诫，不同意丽珠夫妇回台任职。每年假期，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回台省亲，何应钦夫妇便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直至何应钦年逾九旬，而王文湘早已病逝，台湾当局才恩准何丽珠回台，在“外交部”礼宾司任特权科科长。何丽珠夫妇在牯岭附近有私邸一座，离何庆钦的寓所不远，为尽孝道，晨昏必至父亲处请安问好，节假日亦携带子女并邀约上表姐妹前往何应钦处，让老父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

1951 年 1 月 4 日，何应钦向蒋介石请假，首次以私人名义赴日本访问，乘便偕夫人前往求医。蒋介石特别赐赠 1 万美元，作为医旅费。其时，癌肿已经扩散，无法施行手术，日本的肿瘤专家认为死期屈指可数。何应钦夫妇在日本逗留约两月后返台。一日，何应钦召来“战略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韩文源，谓蒋介石所赠旅费，只用去 3000 余元，余款要韩如数奉还。韩将约 7000 美元专程送至“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度转呈。黄当时笑起来了，对韩说：“此款系‘总统’所赠，并有账经立法院通过，敬公何必再退还?”韩回答奉何之命退还，不敢收回，黄才收下。


何应钦之四弟何辑五（曾任贵州省建设厅长、贵阳市第一任市长）

台湾当时正笼罩在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被美国所抛弃的气氛之中。蒋介石清理门户的计划已在悄然进行，何应钦政治上前途未卜，妻子又身患绝症，内忧外患濒临，情绪跌落到了谷底。王文湘自然体谅得到丈夫的心思，时常规劝何应钦道：自己福大命大，抗日战争时在重庆的防空洞，两次被日军投下的重磅炸弹炸中，

都安然无恙。现在已经多活了这么些年，死复何惧？即便死去，亦是“蒙主恩召”，何憾之有？所幸何应钦既有时间、亦有能力和金钱，让王文湘每年都到国外治疗，并用她自己的血液在日本制成抗体，再输回体内，以增强其抵抗能力，配合药物抑制癌细胞的继续扩散。王文湘病重时，何应钦也为家政而里外奔忙，亲奉汤水，侍候周全。

在国民党官场中，何应钦被称为“第一好丈夫”，确实并不仅讥诮他惧内，而是说他一生无女色之好。因王文湘不会生育，曾有人劝他纳妾，王文湘亦首肯，但反被何应钦怒斥。王文湘对他的深情，使他难以移情。王文湘一生中曾有一次对何应钦吃醋，闹了小小的误会。北伐时，何应钦的东路军抢先进占苏浙，声望大增，颇有苏东坡词中的“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之谓。当年何应钦也才 38 岁，仪表风度，战功军阶，令多少交际场中的“小乔”心生羡慕。在杭州、上海的各种欢迎宴会上、舞会上，何应钦出尽风头。而当时的报纸，不免浮夸炒作。一次何应钦的随从回南京办事，王文湘查问究竟，并亲自到沪杭明察暗访，方知为记者编排的花边绯闻所惑，深感负疚。

王文湘与何应钦同时皈依基督教。到台湾后，若不到外国，每星期四上午，必在牯岭街寓所举行家庭聚会，查经讲道，风雨无阻，带病亦不肯缺席。她常说：“世人多讲现实，唯有信主，时与教友相聚，才觉得人生另有一种清新的境界。”此话虽是对做礼拜的女教友们说，但却是暗中告喻何应钦，少为她的病体牵挂。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王文湘曾托人暗中变卖一些饰物，以应需要，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拮据。何应钦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要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更常与宋美龄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姐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王文湘六十大寿时，多才多艺的宋美龄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蒋介石



王文湘六十寿诞时宋美龄画兰、蒋介石题字的寿礼

于画幅左上写下“满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的题词[①]，赠给王文湘。这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能得“第一夫人”作画、蒋介石题词贺寿，亦是一种殊荣。

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条件，加之何应钦及亲戚们的悉心护理，王文湘本人精神上多能自我排解，她与癌症进行了 20 多年的抗争后，于 1978 年 4 月 23 日病逝，终年 82 岁。其时，何应钦已年近九旬，这对夫妻亦堪称“白首齐眉”。4 月 29 日，在台北市殡仪馆为王文湘举行了追思礼拜，曾为蒋介石等台湾国民党要人主持过追思礼拜的周联华牧师为其证道。台湾当局“总统”兼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及夫人蒋方良（芬娜）亲临祭奠，并送“淑德长昭”的挽联一袭。寓居美国的宋美龄惊悉噩耗，发来唁电，称颂王文湘：“何夫人数十年来热心赞助社会工作及军事福利事业，为人笃信和蔼，为众侪所向往与瞻仰，又为龄之益谊良友”等[②]，为王文湘的葬礼增色不少。台湾当局各类头面人物及其眷属、台北各界代表及何氏亲友千余人参加了追思礼拜，可谓备极荣宠了。何应钦老泪盈盈，心口两苦，在痛失老伴后，只能用基督徒的祈祝来缓解心中的悲恸，相信“夫人福慧双修，从此进入主内，自必含笑天国，了无遗憾”[③]。



何应钦夫人患病期间在家宴上留影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 1494 页。
② 张志韩：《何夫人王文湘女士行谊》。
③ 张志韩：《何夫人王文湘女士行谊》。

几年后的1980年1月30日，在台北市殡仪馆为王文湘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虽无亲生儿女，但视何丽珠如同己出，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五弟何纵炎两家三代人，亦都云集，护送她的灵柩，安葬在台北三芝乡北海墓的何氏墓园内。王文湘的灵魂如果有知的话，她也算得上孝子满堂，死后不孤了。

王文湘死后，为了便于何丽珠夫妇及秘书、参谋、侍从照顾何应钦，台湾当局“国防部”才在厦门街131巷3号地址兴建三层洋楼别墅一栋，供其使用，结束了何应钦30多年“租用”牯岭街寓所的历史。何应钦与何丽珠一家生活在一起，白日里热热闹闹、亲亲热热，深夜则孤枕难眠，妻子死前常萦回脑畔的“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愤懑情绪已荡然无存，而代之以苏轼悼亡妻词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的难言哀伤。

（二）

暮年的何应钦受此打击虽重，但毕竟久经磨炼，凭着他的豁达坚韧，终于很快地恢复常态，显得越发苍松劲挺了。有一次，何应钦应台湾健康长寿会的邀请，向人们介绍他的养生之道。他认为长寿的秘诀，不外是修养、生活和医药三个方面，而修养至德，培育生气，乃是首要的。何应钦早年与夫人一道皈依基督教，除了因蒋介石、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都信奉基督教外，还因为他相信《中庸》上所说的“大德必得其寿”。他认为虔信基督教与孔孟之道，以加强自己道德的修养，实在是长寿之道的唯一基础。他常说，要讲求道德的修养，莫过于“正思虑”，思虑不正，是最伤害身体的，所以不正的思虑是长寿的最大敌人。只有祛除不正的思虑，养成恬静的心境，才容易长寿。他主张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自己心中的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浮躁，才可能做到心直虑正。这可能是何应钦的切身经验之谈。随着年岁的增长，“何婆婆”的性格特征越发突出，给人一副慈祥忠厚长者的形象。他用“正思虑”来压抑自己心中诸多烦忧，并为自己安度余年造就良好的心理。何应钦是一个对公事、私事都“起而行多于坐而言”的人。当他心中有不可解之事时，绝不长时间郁结，而是散步或到园中剪花弄草，或出外打球郊游，甚或约好友打打桥牌，以解烦闷。

至于生活方面，何应钦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的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期的军旅劳顿和尊荣显贵，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规律。他不暴饮暴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即使因故熬夜以后，也要坚持早起散步。所以他认为，要想长寿，第一是生活要有规律，第二是要节嗜欲，第三是要有适度的运动。他 70 岁以后，仍坚持早起散步，时常打高尔夫球或是整理庭院里的花木，体气面色，无异于壮年。

至于现代医药的发达，对于人类健康的贡献，何应钦是深有体会的。王文湘的癌症，要不是常赴日本、欧美治疗，不可能延续生命这么长。但他对于医药的看法却有些与众不同。认为平常的保健重于医药，如果不生病，自然无需医生，也不要吃药；生了病，就要早请医生，少吃药为好。他认为自己对养生与医药的看法也是古人认同的。他特别欣赏古书《寿世新编》中的这段话："有人素不服药者，不为无见，但须知得病从何来，当从何去，便是药术。如饥则食，食即药也；不饥则不食，不食即药也；渴则饮，饮即为药；不渴则不饮，不饮即是药也；恶风知伤风，避风便是药；恶酒知伤酒，戒酒便是药。逸可治劳，静可治噪，处阴以却暑，就燠以胜寒，衰于精者寡于欲，耗于气者守以默，怯于神者绝以思，无非对病下药也，唯人不自知耳。"他认为人要长寿，就得如《中庸》上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何应钦的上述养生之道，仔细品味起来，未尝不是他一生处世待人之道，未尝不是他在官场中调和百味的人生体验。

作为国民党要人中的长寿者之一，何应钦的政治哲理中对长寿亦有政治与事业上的解说。他在谈长寿时又反过来要求人们不应只追求生理上的长寿，而应该追求一种"永恒的长寿"，即就人生的意义来说，"一个人仅是生命的延长，无论延长到多么高的年龄，终必有最后的一天"；"但如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运用卓越的智慧能力，为人群作最佳服务，促进人类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幸福，他的伟大和服务，将永远在后人心中，这便是永恒的长寿"[②]。如果撇开何应钦这番话中特定的政治含义，他主张人们应追求的这种"永恒的长寿"，自然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

① 参见《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420～422 页。

② 《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 422 页。

何应钦之所以长寿，与他能屈能伸，失之不悲，得之不喜，不以喜怒哀愁伤元气有关；另外，与他自幼喜爱体育运动，从军以后不以官位显赫养尊处优，始终保持适度的体力消耗和体育运动关系极大。晚年的何应钦，虽不能再像当年那样骑马游猎取乐，但对运动的热情仍不减当年。外出旅游，能够步行时，他必不坐车，以劳动筋骨而轻松身心。何应钦延年益寿的主要活动是“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何应钦学会打桥牌，据说在出使联合国军参团时，公余之暇，因住地在市郊，经费亦有限，只好与属员们待在住处学习英语或打桥牌消遣。打猎则是他平生一大爱好。他的猎队是台湾的三大著名猎队之一，不仅装备好，技术精，经验丰富，行猎成绩也为打猎爱好者所羡慕。至于跳舞，则是何应钦官场交际的工具。何应钦的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服装整洁，只求适合所要去的场合。家庭的陈设，与一般家庭无二，但充满书卷气。至于饮食，他想吃什么吃什么，从不挑剔。他的起居作息非常有规律，天明即起，早读英文，听英语录音带。早餐后看当天的报纸和杂志。上午会客或处理公务。尤其到了晚年，更喜欢侍弄花卉，休闲时总到园中观赏花木。他对兰花特别感兴趣，种有许多名品。由他倡导，还成立了“台湾国兰协会”。他也喜欢听音乐，认为可以陶冶身心。由于他的爱好广泛，喜欢与晚辈和年轻人接近，更喜与老友、部属聚首，所以人们说他“多老朋友而无私党”。



何应钦在台北与高尔夫球友合影

去台湾以后打高尔夫球可说是何应钦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了。这种运动在台湾也是上流社会的专利，是何应钦扩大或加强人际交往的媒介，甚至是他与外国访台要人交流感情、洽谈问题的助

兴之物。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是何应钦的老朋友，他访台时，何应钦特别安排他和随员们一起打高尔夫球。由于何应钦在台湾高尔夫球界有一定知名度，又有社会地位，台北成立高尔夫球俱乐部时，特意请他剪彩并开球。他在频繁的外出访问中，发现西方的旅游者，将旅游观光与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如夏威夷的冲浪、新西兰的赛马、西欧的高尔夫球、法国的汽车赛等，颇能吸引游客。因此，他早在1970年就上书台湾当局“教育部”、“国防部”及体育协会，建议扩建台北、新竹、丰原、花莲等4处9洞高尔夫球场为18洞球场，并在全岛有条件的地方兴建一批小型球场，既可供人们娱乐，也增加外国旅游者的乐趣。

由于何应钦对体育的爱好与重视，台北举行的不少体育运动会都请他主持开幕式，或者点燃圣火。这又是他晚年所获得的殊荣。

寂寞黄昏路　万种思乡情

（一）

何应钦去台后的个人生活，虽没有在大陆时那般显赫，令官场中人惊羡咋舌，但也不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同他一起到台湾的，除了他的两个弟弟及其家人外，还有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下了生死之交的一批难兄难弟。在蒋介石贬斥元老、奖掖新进的过程中，都先后释权赋闲，但优裕的生活、表面的尊荣，依然使他们沐浴到蒋氏家族的恩宠。同是天涯沦落人，灵犀相通，时常相聚，彼此关照劝勉，倒也是一种悠闲，但终究驱不散同在异乡为异客的零落感。何应钦更添了头白鸳鸯失伴飞的痛苦。他们四顾茫茫，触目多是陌生之面，盈耳多是难懂的他乡之音。由大陆去台的200万人中，在权势纷争和生存的危机过去之后，便需要寻求发展生计以外的思想寄托和相互扶助的联络。于是，认宗亲、联族谊就成了台湾岛上盛极一时的风气。

何应钦的地位、资望、人缘自然使他成了何姓之人景仰攀附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他就先后参与台中嘉义、基隆何氏宗亲会的活动及祭祖典礼。1953年，他到菲律宾访问时，马尼拉华侨社团中的福建晋江何氏宗族以有这位驰名中外的族戚而自豪，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介绍了他

们海外相互扶助，共谋发展的经历。何应钦深有感触，意识到孤悬海外之人，宗族间的亲爱精诚、扶贫济困实在必不可少。

在大陆时，由于蒋介石最忌讳别人在他周围培植自己的羽翼，故何应钦在军中尚少留意自己宗族世系的源流，更不敢轻易接纳族戚入仕。在官场中，他以“崇法务实，公正无私”八字自箴，“用人以才以德”，“不问省籍”派系[①]，哪敢想到去固结自己的何氏宗亲？去台以后，他逐渐感到族戚、旧属、门生之类的关系网，虽不能再给他的权势增威，但却能给予他精神上的安慰。因此，他也热心于对族谱世系的探幽发微，无意间竟弄清了自己所宗的庐江何氏的源头。

据何应钦自己考订，庐江何氏原来是周武王的宗支，受封于韩。平王东迁后，韩为晋所并。其后因有功，复受封于韩原，号武子，赐姬姓。到战国时代，韩为七雄之一，后为秦灭。韩国宗族奔窜隐伏以避秦。韩厘王之子名臧，逃遁至庐江，隐姓埋名，买船摆渡为生。秦始皇出巡到博浪沙，为人椎击，疑为六国公子所为，便派人微服潜访缉捕六国宗族之后，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由此引出何应钦所津津乐道的有关他姓“何”的掌故：

一日，秦吏微服秘密探询居民姓氏，以追捕六国宗族之后。当时韩臧正在庐江上撑船，秦吏将自己的船驶近韩臧的渡船，问道：“艄公贵姓？”韩并不知是秦国捕快，适值天寒地冻，河边也结有薄冰，便戏指河水而答道：“此为吾姓。”意以水寒而谐韩。秦吏不解其喻，追问道：“你果真是姓‘河’？”韩臧笑其无知，解说道：“姓氏必从人，岂有从水者？”秦吏便记下“何”字而去。韩臧系舟登岸，邻里告之刚才在江中盘诘他的人是秦朝官吏，韩臧骇异失色，良久窃叹：“吾家得免刀锯者，‘何’一字也！这不是老天保佑韩国宗室之后吗？”于是便正式以“何”为姓。待秦为汉所灭，韩臧便构室营屋，以立世业，子孙承袭繁衍，遂有了庐江何氏世系。自此以后2000余年，何氏支脉遍迁于大陆及海外，渐为望族而常有高官显宦出世。

这一掌故的真实性虽无从稽考，但台湾何氏各族都确信不疑，并视何应钦为当世何氏之显宦，从而更尊之敬之。

---

① 倪抟九：《何应钦上将传》，第66页。

1965 年 5 月 30 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何应钦作为何氏一门的尊者应邀出席并致词。因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因荣获终生军籍，故不能加入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此为憾。何应钦在致词中说："就我所知，我们何氏宗亲远绍庐江，源出一系，所以无论在大陆各省和台湾，及至海外地方，凡有我们姓何的人家，逢年过节，门口所题，甚或灯笼上所写的，都是'庐江'两字，真是我们俗语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此外，我听说我们台湾何氏宗族，大多数是从闽浙两省迁移来台的……而我的曾祖原来也是由福建光泽迁至江西临川，然后迁到贵州兴义的，所以我虽是贵州兴义人，说起来与我们台湾何氏宗亲，宗支应该是很近的，因此，更使我有一种分外亲切之感……在今天的宗亲会中，不期而然会怀想到我们在大陆的何氏宗亲和我们的祖宗庐墓。"讲着讲着，那惯性思维的缰绳便把他原来极富人情味的思路牵引向反共的歧途。他的"国"仇"家"恨又激荡起来，借机攻击大陆如何"六亲不认"，如何要人们相互争斗并鼓动台湾的何氏宗亲应全力支持当局的"反共抗俄"，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何氏宗亲。

何应钦毕竟是深深眷恋着大陆故乡的，他强烈的"反共"意识与绵绵的思乡情结往往十分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他在这篇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中，却又有透露出真实心声的另一面。他说：每每"遥望大陆"，希望"与大陆的亲友互通消息"，甚至有朝一日能回大陆"祭扫祖墓"①。

台湾各地成立的何氏宗亲会都把何应钦奉为何氏荣光的象征，请他拨冗出席各种聚会，或为他的生日举行庆祝。何应钦也把这些在海岛上翘首遥望大陆的何姓之人，当做自己的族人，以减轻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乡愁。

(二)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之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团结乡友的一面旗帜。一贯谨小慎微的何应钦却不敢对贵州同乡有过多的关照。贵州同乡会自 1953 年 11 月成立以来，以张法乾为理事长，推何应钦为荣誉理

---

① 何应钦：《台北何氏宗亲成立大会致词》（1956 年 5 月 30 日）。

事长，后又增加谷正纲为荣誉理事长。但30多年间，贵州同乡会却没有一座会馆供大家聚会联谊，组织也远较他省松散。外省人有讥诮贵州人“自私”、“孤独”和“不团结”者；贵州旅台同乡对台北同乡会亦啧有烦言。1984年1月，台湾贵州同乡会创办了《黔人》季刊，但经费拮据，订购者亦少，只能靠捐助印刷后分赠有关乡友。1985年11月，台北市贵州同乡会开会的会刊资料显示，有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联络得上者，仅1270人；有姓名、无籍贯、无地址者约550人，合计在会注册人数仅1820人。而当时台湾的四川同乡会在籍会员已达37万之多。相形之下，既显出贵州同乡会的工作殊少实绩，也令旅台贵州同乡汗颜。至于贵州散居台北以外的同乡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台湾的贵州同乡会，其宗旨在为同乡扶危济困，联络感情，但既乏经费，又无固定会馆，也没有收容所、互济会之类的组织。每年春节举行团拜，要么借“立法院”或“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或台北商业专科学校礼堂。到会者也总是那些熟悉的老面孔。会一开完，把“贵州同乡会”那几个字一撤掉，贵州同乡会似乎就摸不着，看不见了。这种情况，旅台贵州同乡不满，何应钦也深引为憾。于是，决定由理事长张法乾发起，募款购买贵州同乡会会馆。1985年6月9日，经同乡会七届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认可，并在《黔人》季刊上发出倡议函，请求各位乡友慷慨解囊。不久，即募足购屋款270万元。不知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别有原因，何应钦并未捐款。



1985年何应钦与贵州同乡会会长张法乾为台北贵州同乡会馆落成典礼剪彩。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馆举行启用典礼。会馆坐落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56号及第大厦四楼。这一天，数百名旅台同乡，“怀着一种游子还乡和教徒朝圣的心情”[1]，既喜悦又庄重，前往参加这一盼望多年的盛典。会场设在及第大厦底楼大厅；会场内外摆满了花篮、花环，张灯结彩。这是旅台同乡的欢聚，也是他们瞻仰96岁高龄的荣誉理事长何应钦的难得机会。但凡参加会议者，进门签到后，便可获得一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副秘书长倪抟九所著的《何应钦上将传》。上午9时50分，何应钦到会，全体与会者蜂拥出门夹道鼓掌欢迎。从何应钦的专车到达之时起，几十部照相机、电视台的摄像机、电影摄影机都对准何应钦。在镁光灯的闪亮中，身着藏青色西装的何应钦由其侍从参谋和理事长张法乾搀扶，在新闻记者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会场签名留念。

10时整，何应钦与张法乾主持了剪彩后，何应钦被人们扶到主席台的红绒太师椅上。许多同乡拥到何应钦身边，希望借机与这位老将军合影，致使会场秩序混乱。司仪好不容易借助麦克风大声嚷叫，人们才安静下来。张法乾致词后，何应钦以浓重的贵州乡音致词道：

各位乡亲：

今天应钦前来参加贵州同乡会会馆落成的启用仪式，感到非常欣慰！

应钦借此机会与各位提出三点：

第一，此一会馆的落成，是我们贵州在台乡亲们群策群力共同的捐献，也是同乡会办事同仁长久以来的努力结果。不仅表示出热烈爱乡情感，更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是乡亲们大家的光荣，应钦要在此表示特别的赞许。

第二，今天全国各省市地区的同胞，在复兴基地台湾，多年来过着同舟共济的生活，因此我们应将“爱乡”的精神，从“省族”的范围，扩大为“国族”的范围，与其他省市的同胞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第三，今日全国军民同胞，在政府的领导下，无不为“三民主义

---

① 《黔人》第3卷第1期第41页，1986年1月出版。

> 统一中国”的总目标而努力，而此一号召已扩展到海外及大陆地区，并获得热烈的响应与支持。应钦希望我贵州同乡人人都要为此一历史性运动贡献力量，拥护政府，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神圣使命[①]！

这篇短短的致词，充分反映了何应钦既想祖国统一，却又死抱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既与大陆去台的同胞一样思念故土，但却又坚持阻挠和平统一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

致词完毕，何应钦举起那本红漆布烫金的《何应钦上将传》说：这本书虽是他个人的传记，但与贵州的历史有关，所以赠送给各位乡亲。但由于到会人数太多，预为准备的不够分发，他表示抱歉。随后，何应钦向此次筹建会馆捐赠积极或工作成绩卓著者颁发奖状或感谢状。

何应钦作为台湾贵州同乡会的荣誉理事长，对于贵州同乡会的工作所给予的实质性的支持是不多的，这荣誉理事长，不过是因同乡会尊重他而奉送给他的荣誉罢了。他除了在同乡会有什么团拜、庆典之类的大事时应景点缀似的出席之外，并没有尽他的影响力所及，为贵州同乡多办实事。但贵州同乡会对他的尊崇却是至上的。《黔人》季刊的刊名由何应钦题写，该杂志创刊前几期刊登了不少有关他生平事迹及赞颂之词的文章。何应钦95岁时，《黔人》季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他祝寿。《黔人》的主编李永久撰写的寿文中，用贵州省的兴义、余庆、天柱、望谟、遵义、仁怀、兴仁、普定、威宁、独山、息烽、大定（今大方）、安顺等14个市、县名组成一副对联，既颂扬何应钦，也表达了全体黔籍旅台同乡的思乡情愫：

> 兴义纳余庆，一柱擎天，天下望谟，遵义而行，抱仁怀以兴仁，仁者无敌，仁者必寿；
>
> 普定显威宁，独山退日，日本息烽，大定以往，遂安顺而普安，安之有方，安之若恒。

每年何应钦做寿时，贵州同乡会欲设宴祝贺，大都被何应钦婉言拒

① 《黔人》第3卷第1期，1986年1月出版。

绝；实在情不可却时，也千叮咛万嘱咐，不可铺张奢靡，并且亲自携酒赴宴，以减轻同乡会的负担。宴会上，何应钦虽是长者、上者、主宾，但他畅说家乡掌故和自己的生平趣事，平易随和，没有架子，故深得贵州同乡的尊敬。



晚年在寓所与亲属合影

在何应钦的五弟兄中，四弟何辑五、五弟何纵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何辑五是何应钦主持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时考入该校的，毕业后在黔军中任职，曾随谷正伦入广西参加孙中山讨伐陆荣廷之役，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成员。何应钦在黄埔军校发迹后，何辑五便投奔其门下，辅佐乃兄。何应钦率领东路军北伐入闽作战，何辑五担任汕头警备司令兼第一补充师师长。国民政府建立后，何应钦曾呈请蒋介石，希望在中央为四弟谋一要职。但蒋介石猜疑太多，担心何应钦手足亲信一多，必有尾大不掉之虞，故对何辑五的差遣事搁置不议，使何应钦打消为其弟在中央谋职的希望。过了一段时间，蒋才委任何辑五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滇黔特派员等或非要害、或非长远可踞的职务。时间稍长，职务屡变，不能安居，何谈乐业？于是，何应钦兄弟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良苦。何应钦原无意去触蒋之大忌，便劝其弟放弃在京供职的捷径，于1934年投考陆军大学将官班，走“戴绿穿黄”的仕途正道。1936年，何辑五在陆大毕业后，蒋介石却不

委任何辑五军职，而是让他回贵州担任“贵州省政府委员”，负责筹备大西南后方建设的重任，并增强南京对不甚听指挥的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牵制。于是，何辑五只得远离炙手可热的三哥，回到贵州，先后担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贵阳市首任市长”兼“贵州军管区参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辑五携家去台湾，寓居台北银河新村，不再过问政事，以种橘为乐，赋闲林下，写作《贵州政坛忆往》之类的回忆录，替自己的人生做些记录，并为何应钦补嫌隙和网罗人望。节假日，何辑五一家与何应钦之间亦相互走动，情亲手足，备感亲切。

何应钦的五弟何纵炎，北伐时在何应钦手下任总指挥部经理部中校副处长。国民政府建立后，亦有何辑五所遭遇到的不能在“天子”脚下久留的坎坷，便离开军界，前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攻经济货币银行学。返国后，任国民政府储金汇业局副局长、局长。他是何氏家族的财神爷，有了他这条渠道生财，何应钦便少有敛物聚财之行，博得清廉之名。何纵炎去台湾后，担任台湾邮政总局局长。在任内，捐资创办大夏大学，以光大其嫂兄王伯群之志。退休后，又参与创办亚东工业专科学校，并任该校校长。自1969年至1980年间，苦心经营，使这所学校成绩昭著。他还捐资设立明伦医疗救助基金于亚东医院，救助那些无钱医治伤病的人，以纪念其父何明伦。故台湾有人言，何应钦的钱，均由何纵炎所经管，存在美国，故何氏兄弟并无经济拮据之事。

三兄弟能在台湾相依为命，亦是何应钦晚年的一大幸事。但继王文湘死后，何辑五于1984年病逝，何纵炎1985年也跟着亡故，余年不多的何应钦顾影自怜，不禁悲从中来。丧妻丧弟的打击接踵而至，何应钦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更添一层。

风云百年忌讳多　丹青一幅遗恨长

（一）

何应钦是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统治由弱到强，由盛而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蒋介石集团中几乎所有的核心人物，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同何应钦发生过关系。何应钦一生中尽管对蒋介石趋奉逢迎，唯唯诺诺，对上

下左右宽厚礼让，虽身膺“党国”干城之任，却不敢自行其是、不敢有丝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胆气，但在处理复杂的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或处理蒋介石权力核心各层次转换地位的纠葛中，又难免得罪或负疚于周围的人。在所有“反共”的关键时刻，何应钦都坚决站在蒋介石一边，为蒋的“剿共”、“反共”虽九死而不辞，但结果总不能遂蒋的愿，终以惨败而结束；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日关系中，何应钦是蒋介石集团得心应手的一个筹码，他的对日妥协和联日反共，无一不是贯彻执行蒋的决策，断无独树一帜、我行我素的余地，有时不免代蒋“分谤受过”。在上述影响整部“中华民国”史的各个方面，何应钦都有些不敢或不愿为外人道的苦衷。他被蒋介石猜忌和惩罚过，被陈诚等人排挤过，被亲英美的宋氏、孔氏家族误解过，被国民党左派反对过，被曾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嫉恨过，当然，更被人民群众所唾骂，被历史所鞭笞。其中的是非真相并不全如史家笔下或口碑舆论所载。

人们常说：“盖棺定论”，其实未必。何应钦的棺已盖，而论未定者何止一二！何应钦生前由他自己或由别人所编织的历史死结，无论祖国大陆还是台湾，向来认识并不一致。他塑造自己形象的材料，有些是自己造的，有些是别人给的，有些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他晚年曾几次试图解开一些有关他个人历史的死结，对某些似成定论但确有探究必要的、他曾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的隐秘有所披露，但因主客观条件制约而未能如愿。行将就木的何应钦有谁也医治不好的一块心病。

何应钦曾不只一次地声明他不写自传，更不写回忆录传世。这并非他的由衷之言。他不仅想，而且也曾有所行动，由于为蒋介石所不容而中辍。

“知我者莫过于自己”。蒋介石在世时，何应钦在冗繁的公干之余，曾动笔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想记录下来。经多年搜索枯肠，渐有积累，近乎有了一部传记的初稿。经过幕僚推敲修改，反复斟酌，终以极其委婉曲折的方式，想替自己与蒋介石集团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有所交代，也希望在有人可佐证时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公诸于世。他将书稿送请蒋介石审阅，更希图蒋能给他写个序或题写几个字，使那些令人扑朔迷离的公案从自己的角度有所了结。不料蒋介石欣然收下，仔细翻阅后，便束之高阁，却不提及此事，也不将书稿退回。外人自然猜不透蒋介石是何用心，或以为是“贵人多忘事”，但何应钦在外表的愚钝后却有超人的精明，他由此

事而彻悟，从此再不提写回忆录之事，当然更不敢去索回那些已成形的稿子，权当向蒋作了一次彻底的“思想汇报”。

何应钦的这种欲说不能的苦衷，亲近者是不难窥破的。鉴于蒋介石的亲信和蒋经国的情治系统无孔不入，何应钦内心的隐秘绝不轻易示人。贵州同乡会的乡亲们，既以何应钦为荣，自然少不了在《黔人》杂志或别的适于刊登颂赞何应钦的文章的地方，撰文献词，但流于片断鳞爪，难成系统，更无法道及何应钦的隐衷。在庆祝何应钦九五寿诞时，台湾当局批准“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整理印行《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一套，但全是资料分类汇编，缺少一部贯串生平的东西，就是堪称巨著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也有许多重要的史事或略或删或缺。《丛书》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卒读之人，对何应钦其人其事的认识，实无法脱逸毕生反共，“从一而终”，隐“恶”扬“善”的旧辙。稍换一个角度，就不难发现何应钦这位《丛书》的主角，不过是以其耿耿忠心做了蒋介石“英明伟大”的陪衬。何应钦感激涕零之余，心中的丘壑依然如故，所幸他主持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倪抟九，大胆破除了传统的“生不立传”的禁例，按照蒋介石、蒋经国所定下的一脉相承的调子，撰写了《何应钦上将传》，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出资精印，分赠有关人士，并不作公开出版物在世面发行。这本小册子虽可作总领《何应钦将军九五寿诞丛书》的纲要，但太简太略，除去照片，总字数不过2.8万余字，有蒋记钦定的骨架而无详述史事的血肉，严格地说，只可作生平简介，而成不了“传”。自然无法解开何应钦心中的隐秘。

正步步逼近人生终点的何应钦，虽有其他元老望尘莫及的诸多荣衔虚位和社会活动，但却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他出门忙忙碌碌，进家却空空荡荡；在与人相处或应酬时欢欢喜喜，而独处静卧时却忧忧愁愁，有时难免悲悲戚戚。他关于自己历史的诸多隐秘，既然无可宣泄，只好自己吞咽了，但那煎熬着他的切切的思乡之情、那绵绵的落叶归根的企盼，却是大陆去台者所共有、共尝、共鸣的，既可相互舒缓，又可彼此激扬，且形式万千。台湾当局的禁令再多再严，也禁不胜禁，止不能止，甚至连蒋介石也盼魂归溪口，身葬金陵。宋美龄和蒋经国在蒋介石逝世后，也不打算让他长眠海隅，期待有朝一日将其灵柩送回南京安葬。至于蒋经国本

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口里虽说“以不变应万变”，其实也在暗中渐变，调整自己对大陆的政策。

（二）

老人最怕的是孤独和寂寞。何应钦的地位，使一般人不能与他亲近。他同所有老年人一样，对往事的记忆特别清晰，对眼下的事情却难以记住或不愿记住。凡有人去看望他，特别是贵州同乡去看望他，谈及家乡之事，他便眉飞色舞，恨不得在彼此的忆往述旧中建构起对家乡的令人神往的形象。“乡音不改鬓毛衰”的老人们，对何应钦脑海中还储存有这么多关于贵州历史、掌故、风物、俗谚，无不惊叹其记忆的超人。当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和平统一祖国成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的愿望，希望国共两党为了中华的振兴，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当局也适时地允许台胞回大陆探亲。何应钦的亲戚、旧属和贵州籍的旅台人士不断有人回贵州，回兴义探亲。他不止一次地直接拜托或请人转托回贵州、回兴义探亲的人，打听兴义泥凼故乡的情况，何氏旧居是否安然无恙？何氏祖宗的庐墓是否还在？他在大陆的亲人还有哪些，近况如何？但他却又叮嘱回大陆的人，千万不能提及是受他之托代为打听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何应钦祖辈在泥凼风波湾的老屋，在棒乍的祖茔以及在大陆的亲属，不同程度遭到“左”的政治风雨的冲击。唯有坐落在泥凼街上何应钦出生时居住的何氏旧居，由于一直为当地人民政府所驻，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泥凼何应钦出生时的故居和风波湾的何氏老屋，经当地政府维修，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何氏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经何应钦的幺妹何应相亲自指导加以修葺。何应钦在大陆的亲属，也都得到各级政府的特殊照顾，安居乐业。昔日山深林密人烟稀少的泥凼，也以崭新的面貌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雄踞在南盘江畔。回兴义探亲的台胞、侨胞，把兴义及泥凼的新姿、何氏故居及何氏祖茔的情况，拍成彩色照片，托人辗转带给了何应钦。亲人们寄给他的或托人带去的信件，大约也都到了他手中。兴义人民和当地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并托人转达，欢迎何应钦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欢迎他回兴义探亲。何应钦还可以从大陆对台湾的广播中，听到来自家乡和来自亲人的呼唤。但是，何应钦已经无法在“反共”的悬崖上刹住自己老朽

的车，他不管内心如何痛苦，口头上还一如既往，把大陆传递过去的一切信息当做“中共统战阴谋”，不敢逾越台湾当局所规定的“大陆政策”一步，甚至比别人更顽固地坚持“三不”政策，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声明他在大陆的亲人“背叛”和“出卖”了他。

何应钦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参与制造了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悲剧，临终前他也要暗中吞咽这杯苦酒。但是，何应钦反共的政治理智的闸门再坚固，也挡不住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的感情洪流。每当他驱车经过号称台湾八景之一的太鲁峡谷时，自然会想起家乡泥凼的达力河谷；当他陪伴友人或海外来客去观赏台北市南郊的乌来瀑布的仙游峡谷时，他又会联想起兴义城边的滴水飞瀑和马岭河峡谷万练飞瀑的绮丽风光；当他艰难地漫步在基隆西北有“陆上龙宫”之称的野柳岬峥嵘怪石之间时，又想起儿时曾嬉戏其间的泥凼石林；当他观赏阿里山变幻莫测的云海时，又感觉到像秋高气爽时节，站在自家故居门前，纵目云腾雾卷的南盘江畔的千峦万嶂……何应钦不知多少次地摩挲着那些有关家乡的照片，追寻着那似水的流年。

贵阳堪称何应钦的第二故乡。他对贵阳的回忆虽有酸甜苦辣，最终都成为美好的画图。在他编辑《岁寒松柏集》时，特意将1941年关山月所画的《花溪图》长卷附于自己的近照前，似乎是将他在贵州的历史，浓缩在这山水之中。



1941年何应钦与二兄何应禄在故居正门前合影

著名画家张大千与何应钦早年便是至交挚友。在何应钦就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期间，特别理解他身不由己的苦衷。何应钦曾代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周旋，特别是《塘沽协定》签订后到进行“何梅协定”交涉前后，何应钦备受国人诟骂。作为老友的张大

千为排解何内心的郁闷，特意画了一幅《背插金钗图》送给何。画中是一美丽仕女用手在背后，抚摸刺进脊背的金钗，却故作笑脸迎人。比喻何应钦当时的忍辱负重。画上还题诗一首：

细柳桥边深半春，缬衣帘里动香尘。
无端有寄闲消息，背插金钗笑向人。



1979 年何应钦九十寿诞时张大千先生赠送的《泥荡山水图》

去台湾以后，由于何应钦不止一次地向张大千描绘过故乡泥凼的山川形胜，不时还用手势加以比划。天长日久，在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脑海里，便形成了一幅壮美而神秘的泥凼山水图。

1979 年 3 月 11 日，何应钦九十大寿，台北军政界为他举行祝寿茶会，盛况空前。张大千将心目中的泥凼风光，精心绘制了一幅《何上将故里泥荡（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这幅画可谓大师的神来之笔，他从未到过泥凼，仅凭何应钦的描绘，便有了惟妙惟肖的意念。画面上有云蒸雾锁的犹如椅背一般的观音岩绝壁，有掩映在林莽岚烟中的泥凼小镇，那蛇行般飘进深山更深处的小径，更有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的确得泥凼风光之神韵。

不知有多少次，何应钦凝望着这幅画，想象自己沿着那如烟如帛的小路，走进那掩映在林荫中的故居，与那些已故的或尚健在的亲人相会，或是伫立在那酷似椅面的观音岩的绝壁之下，眺望云烟迷离、青峦叠翠的达力河谷，重温自己从深山大箐中只身离家投考县立高小，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经历……

一幅山水图，万种思乡情，其中所包含的岂止是何应钦一人对大陆故乡的神往！

（三）

自 1986 年起，何应钦的身体状况便日渐不佳。5 月 1 日，终因脑中风不得不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负责为他治疗，用尽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世界一流的监控仪器，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何丽珠及何应钦的侄儿侄女们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百岁。

一日，韩文源去医院探视他，见其面色红润，态度安详，便心有所感：中国五千年历史，乱世多于治世。在乱世之中，自然产生了不少能征惯战的将领，但未见有享年百岁者。即便如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者，安史之乱时在河北击败史思明，功居第一，后又联合回纥酋长，大破吐蕃。罢兵权后尊为尚父，也仅活了 80 多岁。便对何应钦说：“汉唐以来尚未见有百岁高龄之将军。”何笑着说：“我够了！”的确，当年黄埔教官中仅存者，只何应钦一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美、英、苏、中四国的高级将领中，也是何应钦活得最长。



98 岁之何应钦

然而，无论是天赐还是自炼的长寿都是有限的。何应钦的生命力在昏迷中慢慢地耗竭。

1987 年 3 月，他自感余日无多，遂令家人将他历年所珍藏的墨迹、照片、勋章、奖额等与国民党军军史有关的文物 40 种约 200 余件，全部交给“国军历史文物馆”，既为国民党军，也为他戎马宦迹一生留下见证。该馆专门为他辟一展室，名曰“应钦堂”，一语双关地展示这些上自黄埔建军，下至赴台以来所获得的荣耀。

1987 年 10 月 20 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经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他的呼吸，延至 21 日上午 7 时 30 分，终因心肺衰竭而不能复振，结束了他整整 99 个春秋的一生。

迄今为止，未闻他立有什么遗嘱。或许，他自知赢得了生前名，却难料身后事，他内心的隐秘、痛楚、遗憾、后悔太多、太多，难以形诸文字吧？或许，那遗嘱无须公布，也根本不能公布，只可在极亲近的人中间传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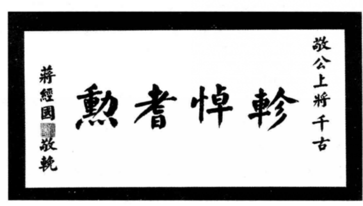
何应钦逝世的消息惊动了“荣民总医院”上下，那些随同国民党一道退至台湾的“荣民”们，为这位虽有军籍但却属特殊“荣民”的老人去世而惋惜。何应钦生前曾为这些退伍的老兵们的福利向台湾当局呼吁，这“荣民总医院”的建立，既是蒋经国的功劳，也有何应钦倡言之力。

何应钦逝世的消息传到士林台湾当局“总统府”，身患糖尿病已不能

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

> “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殳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干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庙议。及至长缨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而于赤寝日深之际，出任“行政院长”，渊谟默运，靖献尤多。方期寿迈期颐，亲观复旦，以主义统一中国，以道德重整人心。忽闻殂谢，轸悼良深。特派李登辉、薛岳、谷正纲、俞国华、沈昌焕、李焕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示崇褒[1]。

何应钦逝世的消息迅速传到大陆。22 日下午，他家乡所在地的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委统战部、州政协及州对台办有关负责人，约见何应钦在兴义的侄儿何绍明、侄女何绍琼等 14 人，向他们表示慰问。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向何应钦的幺妹何应相表示慰问。何应钦在兴义的亲属联名向台北的何丽珠发去唁电，电称：惊闻何应钦逝世，“举族垂泪，盼灵归桑梓”[2]。



何应钦逝世后蒋经国颁赠之挽额

在重庆的何应相亦遥寄《悼哀应钦三哥》的挽词。词中写道：“……四十载生离成死别，恨苍天，曷有极。漫漫云天，鱼沉两岸。思骨肉，泪

① 1987 年 10 月 21 日，台湾《联合报》。
② 1987 年 10 月 29 日，《黔西南报》。

已枯，柔肠寸断；怅海岸愁云，杜鹃啼血，黯然销魂者，岂止小妹一人？吁嗟呼，人孰无亲，咫尺天涯，相见何难？抱恨终天……自别后，妹茕守故里，今数典不忘宗，对祖茔扫祭而无间，朝夕盼与兄相见。到如今，黄泉渺渺，何处觅兄颜？我哭兄不闻，我奠兄无言。更值期颐寿临，亲友咸庆。小妹已备薄礼，欲表敬意，岂知竟成永诀！惟冀年来山河统一，扶灵归葬有期，魂兮归来①。"

12 月 1 日，台北各界在大直三军大学礼堂举行公祭何应钦仪式。从上午 7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30 分，大直地区主要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总统府"的仪仗队为他的灵堂护灵。蒋经国因行动不便，未能亲往祭吊，特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灵柩上方悬挂着何应钦着陆军一级上将戎装的遗像；周围环绕着鲜花和苍松翠柏；前方放置着宋美龄敬献的十字花架；灵柩两旁摆设着何应钦一生所获得的各种勋章。

公祭仪式开始前，按照基督教的礼仪，治丧委员会特别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曾为蒋介石、王文湘证道的牧师周联华，在杭立武夫人弹奏的徐缓而哀怨的琴声中，为何应钦的灵魂祈祷祝福。

上午 8 时 30 分，"国葬"规格的公祭仪式开始。"副总统"李登辉、"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行政院长"俞国华、"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焕等台湾当局首脑人物，都向何应钦的遗体行礼致敬。与何应钦有挚友之交的日本前国会议长滩尾弘吉、日本富士产经集团最高顾问鹿内信雄夫妇等，专程赶来祭吊，与台湾当局尚维持"外交"关系及有经济、文化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驻台"使节"或代表，也到灵前鞠躬致悼。

大殓前，由陈立夫、谷正纲、张宝树、李焕为何应钦的灵柩覆盖国民党党旗；由李登辉、薛岳、俞国华、沈昌焕覆盖"国旗"。

台湾迅雷报导社记者吕宝尧在《挥泪痛悼将星沉》一文中，对何应钦的葬礼有如下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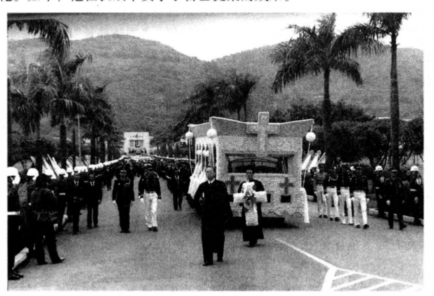
> 是日大直交通管制，三军大学一片庄严肃穆，入门两排三军仪仗队警卫，更布满各式大小花圈花篮甚为隆重威武。礼堂大门口更是警卫森

① 原稿影印件。

> 严，校园边外停满各式各样大小车辆……中央正上方高挂何故一级上将四星戎装军服遗照……灵柩下由蒋夫人致赠的两支显著黄色素菊缀成的十字架，两旁陈列"总统"颁发的旌忠状、褒扬令，及何故一级上将生前获颁之青天白日、国光等勋章。灵柩前中央上方高挂"总统"蒋经国先生致颁挽额"轸悼耆勋"，及严前"总统"家淦先生"勋隆德懋"、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勋德永彰"三大横挽。两旁壁面上布满各级长官白布挽联。"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副参谋总长郑汝霖、陈坚高、总政战部主任言百谦等上将，以及各军总司令等国军高级将领，自昨晚起轮流担任守灵，何故一级上将灵前两旁也分别由陆海空军官学校学生及政战学校学生担任护灵[①]……

丧礼之后，灵柩在台湾各要人及何应钦亲属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何应钦生前曾提出议案，辟建五指山为"国家"公园，还建议公墓公园化。如今，他在长眠中安享了自己提案的成果。



何应钦灵柩出殡之情形

① 《何应钦上将纪念集》，第266页。

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风雨沧桑的何应钦走了。他那饱尝了近一个世纪荣辱功罪的身躯，在台湾当局所覆盖的“国丧”的哀荣之下，承受着巨大历史重负，郁结了千丝万缕的乡愁离恨，凝固着“反共复国”烟消云散的痛苦。他的身躯虽然不复在人间重现，但他过去的存在，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深沉的足迹和斑驳的身影。作为基督徒，他也许升入天堂，回到主的身边，夜以继日地忏悔赎罪；作为冥顽不化的“反共”败军之将，他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人评说是非功罪。如果何应钦的灵魂不死，无论他上了天堂，还是入了地狱，都能听到来自中国大陆亲人那深切而哀婉的呼唤：“魂兮归来！”



现已修缮一新的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泥凼镇的何应钦故居

后　　记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何应钦的晚年岁月》，虽然与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何应钦晚年》和同样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的《晚年何应钦——最后岁月》是一个模块的产物。同时，它又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的《何应钦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2版精装版的《何应钦传》（上、下册）（前者为正版，后者为盗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1998年5月改封面第2次印刷的《何应钦的宦海沉浮》以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次印刷、11月第2次印刷的《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上、下册）中何应钦晚年部分的改写。

上述的罗列，已足以说明现在的《何应钦晚年》一书，是改头换面的“炒冷饭”之作。但“冷饭”的每次热炒，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的增加和“炒”法的不同，总有点新味。即便是原封不动地将“冷饭”炒热后端出，此前未吃过者，依然是全新的感觉。犹如许多旧闻，只要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或听到，它依然可以算作“新闻”。

作为有国际影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他早已成为历史人物，本可以毫无禁忌地进行研究，写出一个更加真实的他来。但事实上由于许多档案资料未解密，更由于他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历史场景，他个人的所思所为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法复制，再现出来的何应钦也不完全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何应钦。因此，本书描摹出的何应钦晚年，不过是笔者基于史料、学术认知和学术环境所写出来的何应钦晚年，它与历史的真实尚有多大距离，我也难以说清。历史的真实和魅力，在于细节和过程的再现，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即便全部有关何应钦其人其事的档案史料都能公诸于世，所有今天的禁忌都不复存在，我们也无法还原完全真实的晚年何应钦。原因是我们所知道的构成何应钦晚年生活的条

件、过程与结果以及他的思想言行都只是概略，而非全部。

于是，不相同条件下，不同作者笔下的何应钦的晚年也是不同的。也正是上述种种不确定性、差异性与假设，让何应钦这一复杂历史人物的晚年乃至一生，都会有人继续关注，有人想继续研究，有读者想了解，才使我炒的“冷饭”有市场。假如有一天，笔者或者别人所炒的何应钦的“冷饭”没有了读者，没有了市场，那恰好说明研究这个历史人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已达到让人走近历史的真实了。这正是笔者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为了追求这一天，只要思想依然，笔者对何应钦的研究也就不会终止。

在本书付梓之前，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研究何应钦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也要感谢所有由于不同原因反对、批判和误读、误解我和我的何应钦研究成果的人，没有这正向和逆向的推动，我的学术之路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些从正面鼓励、支持、帮助过我的人们，几乎在以前出版的不同书的《后记》中有所提及，此处虽不再赘述，但我已将他们铭刻在心。而那些从反面推助我把何应钦的研究坚持下去的人，但愿他们也如同我一般，把那些历史的误会当作亲切的回忆。

熊宗仁

2011 年 9 月 4 日